

## 目 录

- 席尼喇嘛及其所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伊盟政协文史委（ 1 ）
- 旺丹尼玛事略……宝音图（ 36 ）
- 陈长捷杀害奇国贤之我所见……奇世勋（ 44 ）
- 奇恩诚传略……金牡丹整理（ 49 ）
- 绥远都统马福祥……关钟麟（ 55 ）
- 马福祥祸绥的一段回忆……常斌魁（ 63 ）
- 马福祥在绥轶事……刘映元（ 65 ）
- 四十一军进攻宁夏的经过……刘映元（ 85 ）
- 四十一军进军青海途中在秦川被困覆灭经过……张 型（ 92 ）
- 阎锡山、马鸿逵解决孙殿英部四十一军的经过……王福田（ 97 ）
- 马鸿逵在宁夏统治时期的见闻……杨毓瑞（ 102 ）
- 傅作义将军主绥期间，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
- 新闻报纸出版简况……杨令德（ 113 ）
- “五州”时期绥远学生爱国反帝运动……马映光（ 120 ）
- 伪内蒙自治军始末……正珠尔扎布（ 124 ）
- 东蒙“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成立
- 与其活动……达瓦敖斯尔（ 132 ）

蒙古旅京学生会和它的刊物《蒙古》	达瓦敖斯尔 那木海扎布	( 134 )
伪满成立的喇嘛宗团是怎么回事	那木海扎布	( 136 )
诺门汗事件回忆片段	正珠尔扎布	( 150 )
色布精额匪帮侵入海拉尔始末	阿·恩克巴图	( 175 )
查干葛根活佛生平事迹简介	苏尼特左旗政协文史组	( 182 )
清末民初五当召札萨克大喇嘛		
——雅仁匹勒	巴靖远	( 190 )
章嘉活佛与山西的关系		
……………张子和提供材料	辛补堂整理	( 197 )
绥远的烟土行	吴应禄口述 贾汉卿整理	( 201 )

# 席尼喇嘛及其领导的 “独贵龙”运动

伊盟政协文史委

席尼喇嘛，原名乌力吉杰尔格勒，同治五年夏历九月二十九日（1866年11月6日）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壕莱汀札拉干柴登村（今属陕西省榆林县壕莱图公社）穷苦牧民瓦其尔的家  
里。

瓦其尔有四男一女：长子布仁杰尔格勒、次子乌力吉杰尔格勒、三子索瓦迪、四子苏勒瑞木和女儿查干胡肯。

乌力吉杰尔格勒，家境贫寒，其父租种富人的土地，其母给富户放牧牲畜，全家就靠他们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乌力吉杰尔格勒，从小就跟母亲逐水草，赶牲畜，过着游牧生活。七岁开始给富人放牧牛犊和羊羔。

乌力吉杰尔格勒自幼聪慧，他父亲渴望他能读点书，长大做个对百姓有益的人。然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穷人的孩子怎能踏进学堂的门槛呢？其父无奈只能在偶尔碰上识字人的时候，恳求人家给儿子教几个蒙文字母。小乌力吉杰尔格勒刻苦好学，稍有空闲，就如饥似渴地温习自己学过的字母，即使在野外放牧，也经常的沙丘上写写划划。这样，当他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

那时，哈然苏木制度规定：丁男长到十岁，就由参、佐领支配差役。佐领还规定：属民的男婚女嫁，都由佐领决定。佐领让哪个姑娘跟谁家的小子结婚，她就得照办；佐领让哪个小子娶谁家的姑娘，他也得照办。因此，乌力吉杰尔格勒刚到十三岁，就由佐领做主，同该佐的一家富户的闺女娜仁其其格成亲，被迫成了人家的“顶门女婿”。

从此，乌力吉杰尔格勒在这家不但没明没夜地劳动，饱尝了岳母的虐待，还受尽了佐领的压迫。当熬到第五个年头时，娜仁其其格突然病故，于是他岳母就把他撵回父亲家里。回家后的第二年，他家的邻居沙木腾大娘把自己的独生女乌珠木索娃许配给他。也是叫他作“顶门女婿，延续香火”。但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乌珠木索娃也不幸去世。善良的沙木腾大娘说：我虽然失去了女儿，但决不离开我的女婿！她把一个亲戚家的姑娘旺钦梅图克过继过来，和乌力吉杰尔格勒成亲，让他们继承了自己的家业。

乌力吉杰尔格勒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可是佐领又逼着他给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苏荣服劳役，成了王府的伙夫。

伙夫是个苦差事。乌力吉杰尔格勒来到衙门后，就从事背柴、担水、烧茶、做饭、喂马、扫院、推碾子等繁重劳动，一天忙到晚，只能吃到一顿饭。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他身上穿的只是一件破烂不堪的皮袄。衙门里的官吏们还任意凌辱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他整整熬了四年。然而，沉重的劳役，非人的生活，并未能消磨掉他那好学上进的刚强意志。夜深人静，他在炉灶前，借着微弱的火光，孜孜不倦地读书写字，白天他到野外背柴，也以沙滩当纸，柴棍做笔，书写学得的字句。

经过顽强地学习，他学会了写作诗歌，开始写一些揭露残酷

的封建制度和王公贵族的罪恶的诗篇。天长日久，他写的诗传到了乌审旗王爷的耳朵里。以奸诈狠毒闻名的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苏荣听到之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想出了一个妄图叫乌力吉杰尔格勒终生为他效劳的毒计，破格提拔他当了衙门里的笔帖式。

乌力吉杰尔格勒虽然当了笔帖式，但他从未想过如何效忠王爷，对衙署里的工作只是敷衍塞责了事。

这时，正是清政府日益腐朽没落，向帝国主义列强出卖国土，屈膝投降的时代。中国各族人民奋起反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鄂尔多斯高原上也接二连三地掀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王公贵族压迫、剥削的“独贵龙”运动。察格都尔苏荣，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统治，勾结伊克昭盟盟长、杭锦旗王爷、绥远将军以及神木统领等反动头目，对“独贵龙”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牧民的斗争烈火烧遍了整个乌审旗。这个革命浪潮，深刻地影响了乌力吉杰尔格勒，他秘密地参加了“独贵龙”运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察格都尔苏荣秘密派遣他的心腹旺吉勒诺尔布台吉和莫尔根朝克图之流，以三千两银子为代价，偷偷地卖掉了阿鲁德尔苏、嘎鲁特河以西，直至纳林河边的一片牧场。他又派遣绰号叫“依尔巴盖”烂眼的图布新梅林和官吏乌力吉赴西安将这些银子献给逃亡中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企图借此升任伊克昭盟盟长。图布新梅林等人的活动毫无结果，察格都尔苏荣只好又派乌力吉杰尔格勒，到西安向满清政府六部衙门上书纳贿。当乌力吉杰尔格勒到达西安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离开西安返回北京。

图布新梅林在西安，整日吃喝嫖赌，把卖地的几千两银子花

得一干二净。图布新准备向西安城内的豪商巨贾借高利贷巨额款项,前往北京进行活动。乌力吉杰尔格勒坚决反对这样做。因此,图布新怀恨在心,图谋报复,就命令乌力吉杰尔格勒去北京,给王爷活动个副盟长的官衔。乌力吉杰尔格勒明白图布新梅林的用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于当年九月到达了北京。由于他无钱向满清政府行贿,别说买盟长的官衔,连进见朝廷衙署的大小官员,都难以办到。他知道如果完不成使命,必将受到察格都尔苏荣和图布新的进一步迫害。当他听说由于连年战乱,乌审旗王爷几年的俸禄一直没有领取。他就找熟人,托朋友,想方设法向满清政府领出了王爷的三年俸禄。他用这笔钱买通了六部衙门里的各级官员,于当年腊月,拿到了任命察格都尔苏荣为伊克昭盟副盟长的“委任状”,返回了乌审旗。

北京之行,大大开阔了乌力吉杰尔格勒的眼界,看到了当时全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局势。他回家之后,就把这些向家乡民众作了广泛的宣传。

乌力吉杰尔格勒虽然从北京给王爷弄到了副盟长的职衔,但却花掉了王爷三年的俸禄。察格都尔苏荣对此十分不满。尤其是王爷的老婆,绰号叫做“黄脸福晋”的娜仁格日勒,本来对乌力吉杰尔格勒就恨之入骨,便欲藉此机会暗害乌力吉杰尔格勒。对此,乌力吉杰尔格勒已有觉察,便“告病”回家,才使“黄脸福晋”的阴谋未能得逞。

宣统元年(1909年)乌力吉杰尔格勒回家以后,便秘密发动群众,组织领导“独贵龙”运动,控告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和“黄脸福晋”娜仁格日勒勾结汉族地主、奸商,出卖牧场,开垦草地,擅自增加苛捐杂税的罪行。这件事被王爷知道后,又巧施伎俩给了乌力吉杰尔格勒“参领”的职衔,企图把乌力吉杰

尔格勒拉到自己身边来。按照规定，宗教人士不能承担任何官职，于是乌力吉杰尔格勒就披上袈裟，削发为僧当了喇嘛。从此，穷苦牧民都亲切地称他为“席尼喇嘛”（蒙语，意为新喇嘛）。这样，察格都尔苏荣王爷的阴谋，又变成了泡影。

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对乌力吉杰尔格勒更加怀恨在心，便以“违抗王爷命令”的罪名，要把他逮捕法办，查抄没收他的全部家产，让他的子女到王府去充当终身奴隶。但是王爷的决定，更激起了乌力吉杰尔格勒和广大牧民的无比义愤，就把那些奉命前来捉拿席尼喇嘛的走卒们捆绑起来。此后，席尼喇嘛领导的十一个“独贵龙”，如同燎原烈火，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察格都尔苏荣王爷的宝座，也震撼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虽然受到王爷的多次镇压，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鼓舞和支持下，终于推翻了乌审旗王爷的反动政权。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建立了第一个贫苦牧民的政权。当时在鄂尔多斯的广大牧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充满激情的赞歌——《红旗之歌》：

把我们的红旗高高举起，  
保卫我们鄂尔多斯土地。  
要把那些反叛的奸贼们，  
统统扔进燃烧的火堆里。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同反动势力的反复较量，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组织更加严密，斗争更加坚决。其标志有如下几点：

一、参加“独贵龙”的牧民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乌审旗王爷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加强了乌审旗的反动武装，席尼喇嘛就针锋相对地把“独贵龙”的民众也武装了起来。

二、“独贵龙”内部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譬如：“独贵龙”成员的花名册是按圆形图案排列的，从形式上根本看不出谁是首要人物。各“独贵龙”之间互相联系时，使用顺口溜，或者引用民歌作为联络的暗号。当时的王公等上层人物，虽然明明知道席尼喇嘛是“独贵龙”的主要人物，但抓不到只字片纸的证据。

三、过去，“独贵龙”采取的主要斗争方式是请愿、告状、上书或示威等。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则从过去那种只搞合法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阶段，对那些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王公贵族，贪官污吏进行了坚决的镇压。

“独贵龙”的会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圈，不留豁口，这种形式的会议叫做“无豁口独贵龙”，它用于内部议事；另一种是围坐成的圆圈留个豁口，供人走动，这种形式的会议叫做“有豁口独贵龙”。它用于审讯、惩罚坏人。审讯时，把受审人带入圈内，叫他坐在众人中间，接受大家的审判。被审判的人进入圈内有两种带法：一种是“骑小黄马”，即让受审人骑上一根木棍进入圈内；另一种是“骑赤兔马”，即让受审人骑上带刺的荆棘进入圈内。

察格都尔苏荣的政权更加腐败，他的“黄脸福晋”独揽了旗政大权。她生活糜烂，作风淫荡，成天和管家额尔敦仓鬼混，弄得王府里乌烟瘴气。为了满足她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便对广大穷苦牧民任意增加苛捐杂税，掠夺牛羊，抓牧民充当家丁奴仆。还大片大片地出卖乌审旗的土地。因而，更加激起了全旗人民的愤慨。

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六日的早晨，“独贵龙”的人马在察格都尔苏荣王府所在地搭马莱柴登的西边，扎下了帐篷，打起了旗号。原来，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曾在几天前开会决定，要



在黑夜里捉拿淫妇“黄脸福晋”和淫夫额尔敦仓。现在，他们按照这个决定来到这里，准备行动。王府管家看到这种公开挑衅的阵势，急忙部署层层警戒，通宵达旦，进行防范。

翌日清晨，当“独贵龙”的队伍涌向王府时，却从王府里传来了“管家老爷上吊死了”的消息。人们进去一看，果然看见额尔敦仓吊在一根栓马桩子上，嘴里、鼻子里喷着白沫，正在作垂死的挣扎。人们把他放下来，等他苏醒后，对他进行审讯，这家伙被“独贵龙”的浩大声势吓得丧魂落魄，不但招供了与“黄脸福晋”的奸情，而且供出了他同“黄脸福晋”、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合谋的种种坏事。如：一九一二年十二月间，他们三人密谋决定，将乌审王爷的养子官布扎布秘密送往大库伦（乌兰巴托的旧称），请求在哲布尊丹巴的手下当一名走卒，为他效犬马之劳。并秘密商定将成吉思汗的陵寝迁往外蒙古。席尼喇嘛叫他的安达们录下了额尔敦仓的口供，把他押解到当时担任伊克昭盟审判官员的札萨克旗王爷沙格都尔扎布那里，要求依法严惩他和“黄脸福晋”。沙格都尔扎布把这件事拖了半年，并暗示要给那些坏家伙们翻案。“黄脸福晋”娜仁格日勒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遣心腹，带上大量金银财宝去进行贿赂。不久传出了“额尔敦仓已经越狱潜逃”的消息，其实是沙克都尔扎布亲自偷偷地放走了额尔敦仓。

额尔敦仓逃走后，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额尔敦仓上告到盟长衙门，上边要派兵捉拿‘独贵龙’的人”；“娜仁格日勒向银川镇守使告了‘独贵龙’的状”等等。他们企图用这些谣言，涣散“独贵龙”的人心。然而，席尼喇嘛并没有上当。这时，著名的蒙古族民间诗人贺西格巴图曾给“独贵龙”写了来一封密信，里面是一首四行诗：

米隆原野的邬县波罗。

闪烁智慧的萨楚茹勒，  
未卜先知的狮子呵，  
保护万物查干世呼尔蒂。

“独贵龙”的安达们看了此信，都不解其意。可是席尼喇嘛却了解其用意。原来这首诗是用梵语和蒙语混合写成的，可译成下面这四个人的名字：陶里的嘎尔玛（梅林），斯庆朝克图（梅林），桑杰扎布和纳林河的杜格尔扎布。诗的意思是暗示席尼喇嘛要特别警惕这四个人，防备他们耍两面派的阴谋。席尼喇嘛早就觉察这四个人不与自己志同道合，早有戒备之心。因此，在审讯额尔敦仓时，没有追究他“自杀”的原委就是为了防备这四个人的。后来，席尼喇嘛用家乡的土语给贺西格巴图写了一首诗作为回信。在这首诗里，席尼喇嘛不但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而且说明了自己对“独贵龙”运动的见解和主张。诗文如下：

一张柔软的薄信笺，  
折得边缘已经破损。  
一个陈旧的灰布信封，  
褴褛已不成形。

头戴珠子的人把它送来，  
头戴顶子的人把它拆开。  
你那龙飞凤舞的笔迹，  
聚来多少凝思的眼睛。

局势仍然错综复杂，  
桑布继续动摇不定。  
意见和主张跟我们不合，

头枕在我们这边，手却伸向王公。

在我们这个狭小的天地，  
利用了大家对他的迷信。  
身披着唐僧活佛的袈裟，  
准备着实现他的野心。

愚妄平庸的几行诗文，  
也许让你看作笑柄。  
不过我在边写边改，  
作为对你来信的回声。

措词本想美妙一些，  
情势紧迫难以从容。  
只好用这潦草的手笔，  
随便向你倾吐衷情。

府上的收入正在下降，  
精致的哈达谁还敬奉；  
就连粉绢也不见一匹，  
只剩几句礼貌的奉承。

王府规定的租银税金，  
当然不会如数交清。  
褙褙空了也只好空着，  
你亲自索要也徒劳无功。

当心不要干得太欢，  
在方法策略上也要三思而行。  
弃官取义才是价值所在，  
我真心相劝，望你尽快决定。

如能承蒙更多的帮助，  
会得到我们特别的欢迎。  
你失去的不过是一肩包袱，  
得到的将是大家的信任。

.....

果然不出席尼喇嘛和贺西格巴图所料，没过多久，那四个人公开声明退出了“独贵龙”。随后，台吉旺楚克拉布丹和宝音朝克，被察格都尔苏荣王爷封为参领，他们也离开了“独贵龙”。“黄脸福晋”妄图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瓦解“独贵龙”，结果，不但无损于“独贵龙”的一丝一毫，反而使这个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团结了。但是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他们怕受到处治，便畏首畏尾，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席尼喇嘛为把斗争坚持到底，加强了思想工作。他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七十余人结拜为兄弟，宣誓要推翻乌审旗封建王公的反动统治。这就是鄂尔多斯历史上著名的“七十安达独贵龙”。这个组织的成立，使整个乌审旗“独贵龙”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盟审判官员放走额尔敦仓之后，“黄脸福晋”的气焰更加嚣张。她不但企图赖掉她的见不得人的丑事和罪恶，而且还想以“‘独贵龙’的人冲击王府，是要谋杀王爷察格都尔苏荣”为由向“独贵

龙”问罪，把轰轰烈烈的“独贵龙”运动镇压下去。

那时，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苏荣每年都要去乌审召烧几次香，拜几次佛。每当他去乌审召朝拜时，都要带上大批的随从和仆人，在庙旁搭起宽敞的蒙古包，吃喝玩乐。

一次，乌审王爷和“黄脸福晋”放出风声说：“有了不祥之兆，大难就要临头，需要到庙上去烧香拜佛！”不久，他们便带着大批的随从仆人奔向乌审召。这不过是烟幕。其实他们是想趁此机会溜出乌审旗，到盟里告“独贵龙”的人是叛逆。以便向“独贵龙”进行反扑。席尼喇嘛早已看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同“独贵龙”众安达商量好了对策。

一九一四年二月的一天夜里，当乌审王爷的人马刚刚驻扎在乌审召，席尼喇嘛便带着“独贵龙”的队伍，紧紧地包围了王爷和福晋的蒙古包，并在蒙古包前点起两堆篝火。他亲自带领几个弟兄冲进蒙古包里，揪出了王爷和“黄脸福晋”。察格都尔苏荣见到熊熊的篝火，以为是要把他活活地烧死，吓得面无人色。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把“黄脸福晋”推到自己的前面，向众人表示：一切坏事都是她干的。你们要杀就拿她开刀吧！席尼喇嘛命令他俩跪到篝火跟前，严肃地宣布道：“你们听着！我们‘独贵龙’的众安达，是代表全旗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前来警告奸淫腐化的娜仁格日勒的。她道德败坏，鱼肉本旗百姓，网罗奸党，重用贪官污吏，迫害忠良之士，罪恶滔天。但是，今天我们既不杀她，也不杀你，只是拿她游乡示众，将她的罪恶晓喻全旗”。说罢，他们就把娜仁格日勒驮在马上，连夜离开了乌审召。

“独贵龙”的群众把娜仁格日勒押到全旗各地游乡示众，使她的丑恶行径在全旗各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就大煞了她和王爷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独贵龙”运动在全旗民众中的威

信，使全旗的“独贵龙”形成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

娜仁格日勒的丑事被牧民群众揭露出来，把盟里的官员们弄得措手不及，只好把娜仁格日勒和额尔敦仓的丑事反映给上级。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动运初获胜利。

一九一三年前后，当时，外蒙古正在搞“独立”运动。哲布尊丹巴为了拉拢内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曾经给伊克昭盟的封建上层捎来两封密信，鼓动内外蒙合并。这件事对察格都尔苏荣和娜仁格日勒之流产生了影响。袁世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便极力拢络内蒙各盟旗的王公，抵制外蒙古的影响。

一九一三年十月，在绥远城召开了西部盟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的王公会议。乌审王爷察格都尔苏荣托病未去，派西协理朝克图瓦其尔和五喇嘛（朝协理的五叔）参加了这次会议。

由于“独贵龙”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察格都尔苏荣和“黄脸福晋”的威风一落千丈。他们向“独贵龙”的民众讨饶说：“家丑不可外扬，有事咱们好商量，娜仁格日勒的事情就在本旗解决吧。”当时，朝克图瓦其尔同乌审王爷争权夺利，矛盾很大。“独贵龙”就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加强了同朝克图瓦其尔和五喇嘛的联系。想通过他们二人参加会议的机会，把娜仁格日勒的污秽行径和她的口供上报给伊克昭盟盟长和绥远都统。这件事正好迎合了朝克图瓦其尔推翻乌审王爷而篡权继位的野心，因此他欣然照办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三十日由银川镇守使传达了袁世凯的指令。指令中说：“所报之事已悉。据查，身为乌审旗札萨克贝勒的察格都尔苏荣，在建设中华大业中心怀犹豫，有失旗政，致使蒙古民众骚动，发生‘独贵龙’变乱，理应革其官职，罢其贝勒爵位，以示惩处。”

察格都尔苏荣被革职后，由他的儿子特古斯阿木古郎承袭了

他的贝勒爵位。朝克图瓦其尔协理被封为世袭公爵，掌管旗政，五喇嘛拉格巴扎拉森到得了“教主”的称号。从此，乌审旗札萨克大权，落到了朝克图瓦其尔的手里。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运动取得了节节胜利，声势越来越大，受到了全旗民众的赞誉，吓得反动透顶的王公贵族和封建上层心惊胆颤。乌审旗和伊克昭盟的官员们同绥远都统衙门勾结在一起，密谋要给席尼喇嘛加“煽动民变”之罪，解散“独贵龙”组织。但是，他们没有掌握席尼喇嘛是“独贵龙”领袖的证据，只好玩弄起向“独贵龙”“谈判”的花招。

一九一六年冬天，绥远都统衙门指令伊克昭盟盟长委派郡王旗协理贡都桑布台吉去和乌审旗“独贵龙”谈判。贡都桑布接受命令后，决定在乌审旗班禅庙召开会盟大会，勒令参加“独贵龙”的三百余人届时赴会。席尼喇嘛心里十分明白，参加这次大会，对他是凶多吉少。因此，他带领着他的“七十安达”驻扎在乌兰陶勒盖庙上，一方面仔细观察动静，一方面代表全旗广大牧民向盟长派来的贡都桑布协理接连上书，揭露控诉察格都尔苏荣和娜仁格日勒的种种罪行。他在上报的诉讼书中这样写道“……自辛亥年冬，来历不明的汉人成群结伙往返我旗边界，明抢暗偷，弄得我旗牧民百姓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此时，旗府衙门张贴出了各村各佐抽出人丁巡逻旗地，发现动静及时报告的告示。因此，全旗大多数村佐都组织人力进行巡逻，保卫旗地。可是参领图门，函启官巴音仓，参领章京松力布，台吉、参领旺楚克拉布丹，边吏查嘎岱达瓦，次官、台吉乌力吉德力格尔，台吉嘎尔玛等人，以旗府先前曾经发过‘沿我旗东部边界，可将五里长、三里宽的草地暂时出租给汉民垦种’的指令为借口，出卖大片旗地，大发放垦之财。壬子年夏，他们鬼鬼祟祟勾结奸商，挥动马棒，略指

四至为界，将我蒙古同胞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大片牧场，肆无忌惮地廉价卖给汉商。对于他们这种出卖我旗土地的罪行，若加阻止，就被他们扣上种种罪名加以陷害。

“此外，他们与王爷串通一气，在衙署里擅自安插各自的心腹，破坏了旗衙门的有关规定。继之，又与福晋娜仁格日勒狼狈为奸，结成死党，把新提任的和他们持不同政见的新贝勒以及协理官员另行造册。……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之计，向札萨克王爷一再上书请愿，要求制止放荒卖地。但是王府管家额尔敦仓仗他得宠于王爷和福晋，竟敢无视旗府的有关规定，从中作梗。他不但扣压众官员的报告和决定，而且擅自下达增收徭役人丁和苛捐杂税的指令，逼得全旗牧民百姓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如今，衙门方面要对所谓的‘独贵龙’头目乌力吉杰尔格勒依法惩处，并且下令传讯归案。对此，我等申诉如下：

“我们只求世代赖以生存的水草、牧场有所保障，阿谀奸佞之徒受到制裁，盼望民众再不受苦难。因此，我们自发地组织了‘独贵龙’。我们呈诉的一切，都是事实，并非乌力吉杰尔格勒一人之所为。”

这时阴险毒辣的台吉旺楚克拉布丹和丹达尔等几个叛徒，已经投靠了封建统治者，充当了王爷的鹰犬，他们说什么“参加‘独贵龙’是犯罪行为，愿受官方任何惩处。今后要解散‘独贵龙’，一心效忠王爷，并愿补缴前几年拖欠的全部官税……”以这种无耻的行径去讨好封建统治者。

贡都桑布台吉觉察到由于“黄险福晋”独揽旗政，不仅在王府发生淫乱事件，而且使广大牧民群众遭到不可忍受的痛苦，便打下了“金蝉脱壳”的主意。他发出公告说：“汝等民众所指名



上书十余名官员之事，以及请求制定公正的法制，将旗政大权移交给新贝勒、诺彦等事项，均已上报盟长。并请求盟长于明年（丙辰年）夏天派员来旗查处。当派员一到，定将你们的札萨克以及所有官员招至旗府，凡是被告，一定受到审处。”

贡都桑布发了一纸空文，又勒索了一千两“罚金”，然后溜回盟里，向盟长呈了如下的报告：

“……卑职躬身细察，认为所报‘独贵龙’系乌力吉杰尔格勒为首一事并不属实。如系属实，现有如此众多参加之人，岂不一察即获？可见‘独贵龙’之组织，实系众人志愿组成，并非乌力吉杰尔格勒聚众闹事。况且民众上书之事，情况属实，并无伪言。现在，参加‘独贵龙’的众台吉、平民，均聚于乌兰陶勒盖庙上，疾首认罪，悔恨莫及；卑职已罚银千两，并勒令他们当即解散，各回其家，安分守法，不得再聚众闹事。祈请准予备案为盼！”

这次会盟的审判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又给乌审旗的民众造成了新的灾难。仅按人头向全旗民众摊派的“五食”——米、面、油和牛、羊，就逼得旗民们几乎倾家荡产。这次会盟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使他们的累累罪行大白于天下，也使他们把“独贵龙”及席尼喇嘛置于死地的阴谋彻底破产。这大大鼓舞了参加“独贵龙”群众的斗志，提高了席尼喇嘛的威信，推动了“独龙”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次会盟对“独贵龙”运动的叛徒，也是贵一个有力的打击。尽管叛徒旺楚克拉布丹、那旺诺尔布、宝音楚哈嘎之流，在班禅庙会议之际，协同封建势力向“独贵龙”进攻，以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手段，拉走了“独贵龙”中的一部分不坚定分子，组成了臭名昭著的“六十安达”。但他们的狰狞面目却大白于天下，受到全体民众的唾弃。

“六十安达”是“独贵龙”运动的可耻叛徒，是革命洪流中的沉渣。他们一旦被革命阵营所扬弃，革命的队伍就更加纯洁，思想也更加统一。

席尼喇嘛没有处决娜仁格日勒，把她在全旗各地游乡示众之后，就放回去了。后来，察格都尔苏荣被革职。他们无处可归，过了一段流浪生活。但他们仍不死心。一九一八年初，北洋政府指令将乌审旗大印，从朝克图瓦其尔之手收回，转交给察格都尔苏荣的儿子特古斯阿木古郎，正式委以乌审旗札萨克贝勒之职。这为察格都尔苏荣和娜仁格日勒的东山再起，提供了良机。不久，察格都尔苏荣依仗其“父王”的权威，夺印篡权了。这件事激起了全旗民众的愤怒，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平，也加剧了王公贵族之间的矛盾。察格都尔苏荣看到当时的形势不利，准备投靠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他与“黄脸福晋”密谋，想趁到乌审召烧香拜佛的机会，悄悄逃往外蒙古。但席尼喇嘛早已觉察，决定趁他们行动之机，除掉娜仁格日勒。

在那个时代，要处决一个曾经朝廷钦命的王爷福晋，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旦败露，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因此，事先要做缜密的安排，不能走漏一点声风。

那时候，社会秩序很混乱。特别是鄂尔多斯高原，到处土匪横行。席尼喇嘛与众“安达”经过反复地、周密地研究，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的混乱局面，来一个“混水摸鱼”，既要除掉淫妇娜仁格日勒，又要叫察格都尔苏荣以及上层的统治者抓不到一点把柄，无从追查。

一九一八年二月，察格都尔苏荣和娜仁格日勒，经过几天的准备，定在第二天天一亮就动身逃往外蒙古。不料，深夜突然闯进一伙人来，将躺在察格都尔苏荣身旁的娜仁格日勒赤身裸体地

揪出去。察格都尔苏荣看到这般情景，吓得魂不附体，昏死过去。

席尼喇嘛按照预定方案，派了十几个人，将娜仁格日勒揪出外边，用一条粗毛口袋罩住她的头，让她骑在一匹备着破木鞍子的马上，向巴拉尔驰去。多年来骑在乌审旗广大民众头上作威作福，恶贯满盈的女妖精——“黄脸福晋”终于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

察格都尔苏荣从恶梦中醒悟过来之后，不但说不清娜仁格日勒被谁人捉去，更不知道他的王印在什么时候被人拿了去。昏庸无能的老王爷，虽然怀疑这件事和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有关，但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好忍气吞声地保住自己的性命了事。

事后，很快在全旗民众中传播着这样一种说法：“来了一群土匪，把黄脸福晋干掉了”。

这次事件过后，乌审旗的旗政大权落到小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手里。特古斯阿木古郎与其老子一样，为了维持他的封建统治，对“独贵龙”同样恨之入骨。他为了分化、瓦解席尼喇嘛领导的十一个“独贵龙”，便指使他的走狗“六十安达”到处造谣惑众，扬言“谁若能报告娜仁格日勒被害的内情，不但赏白银五百两，而且封官重用……”。当时，“独贵龙”里有一个绰号叫“灰鬼”的家伙，此人向来串通土匪，勾结奸商，无所不为。当他听到“独贵龙”要秘密除掉“黄脸福晋”时，喜出望外，想趁机捞一把金银财宝，大发横财，因而积极参加了那次行动。可是，那次行动只除掉了娜仁格日勒，丝毫未动王爷的钱财，使他大失所望。这时，听到小王爷悬赏的消息后，又萌生发财之意，准备向王爷告发“独贵龙”，领取一笔重赏，捞到一官半职。

一天夜里，“独贵龙”的人马驻扎在芒哈图庙上，“灰鬼”偷偷地溜走了。对于他，席尼喇嘛和“独贵龙”的人们早已有所

防备。他一逃走，就被“独贵龙”的弟兄们很快发觉。第二天拂晓，当“灰鬼”走到宝寨巴拉尔的时候，便遇到了“独贵龙”的人马，把他干掉了。只剩下“灰鬼”骑的那匹全副鞍辔的花白马，在宝寨的巴拉尔里四处奔跑。当时人们留传着这样一首诗：

骑花马的“灰鬼”啊，  
消逝在宝寨的巴拉尔里；  
要想知道他的底细，  
炮手满达就是证据。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奸诈的旺楚克拉布丹台吉如获至宝。他以为这下总算抓到了控告席尼喇嘛及“独贵龙”的证据，便立即赶到宝寨的巴拉尔，捉来了“灰鬼”骑过的花白马，上书给当时担任伊克昭盟盟长的达拉特旗王爷逊布尔巴图，他在上书中写道：

“……乌力吉杰尔格勒等七十余人，结盟为伍，组成‘独贵龙’，犯上作乱，有了造反的行动。他唆使一个名叫‘灰鬼’的人，杀害了娜仁格日勒福晋。事后怕事情败露，又杀掉了‘灰鬼’，妄图灭口，现有‘灰鬼’骑的花白马为证……”

盟长收到旺楚克拉不丹的控告书之后，认为镇压“独贵龙”运动的时机已到，立即派遣台吉马西德力格尔协理带领一百多大小官吏，二百多官兵来到乌审旗嘎鲁特庙，召开会盟大会，准备血腥镇压席尼喇嘛领导的十一个“独贵龙”。这就是给乌审旗广大民众带来极大灾难的“庚申年嘎鲁特会盟大会”。

这次会议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二〇年六月，达拉特旗协理马西德力格尔带领着三百来人，到达嘎鲁特庙，命令“独贵龙”的成员必须在三天之内到嘎鲁特庙报到。“独贵龙”的人们估计一去就会被擒获，所以，没

让席尼喇嘛、索德纳木东日布和阿尔宾巴雅尔等领导人去参加。当时，“独贵龙”也有了一部分武装，达旗的官兵也不敢轻举妄动。马西德力格尔也无计可施，便指使他的官兵公开抢劫，借“给会盟的官吏征集粮饷费用”为名，向赤手空拳的广大民众开刀。他们不但赶走百姓的牲畜（不到一个月，就从乌审旗老百姓手中抢走了几千只牲畜），还把无辜的百姓抓起来，扣上参加“独贵龙”的罪名，野蛮吊打审讯。

席尼喇嘛看到家乡遭到如此浩劫，民众蒙受如此深重的灾难，怎能顾得个人的安危？他毅然带领他的六十多个弟兄来到嘎鲁特庙上，搭起帐篷驻扎下来。马西德力格尔见席尼喇嘛的人马不多，便派他的心腹——绰号叫“疯子”的金巴，以谈判为名，来往于席尼喇嘛的“独贵龙”营地，窥察动静。他们发觉“独贵龙”群众的警惕性稍有松懈，就来了个突然袭击。包围了“独贵龙”的营帐，逮捕了席尼喇嘛等六十余人，对他们进行严刑逼供，但是一无所获。马西德力格尔只好把大多数被捕的人放掉，留下席尼喇嘛、朋斯克拉西、乌力吉巴图、热达纳斯迪等五人，使用更加残酷的刑罚，继续逼供。把他们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然而从他们嘴里，还是没有得到半点供词。马西德力格尔气得暴跳如雷，可又无可奈何。

这时，曾经掌握过乌审旗实权的朝克图瓦其尔派人来了解席尼喇嘛的情况。朝克图瓦其尔过去贪受贿赂，在向盟里上报的材料中说过席尼喇嘛不是“独贵龙”的首领，对杀害“黄脸福晋”，他也曾向席尼喇嘛暗示过：“要嫁祸于匪”。所以，他急需探听席尼喇嘛死活的消息。

朝克图瓦其尔派来的那个人，到了嘎鲁特庙，先向马西德力格尔呈上了礼物，然后以视察监狱为名，要求看看本旗的犯人。

他一来到狱中，席尼喇嘛便认出他是朝克图瓦其尔手下的人，心中暗暗高兴。他对那个人说：“请你回去告诉协理大人，我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经过他们的折磨，我只剩下了一口气。现在我是用鼻子呼吸，如果一旦用嘴呼吸，那就一命呜呼了！”朝克图瓦其尔听到这话，怕得要死。他明白席尼喇嘛说“用嘴呼吸”，就是要说出除掉“黄脸福晋”的计谋。为此，他便拿出从“独贵龙”勒索来的一部分银子，贿通马西德力格尔，给席尼喇嘛留下了一条活路，钉上了八十斤重的镣铐，和其余的人一起被监禁起来。这样，马西德力格尔也从这个无头案里脱出了身。

这个凶残的马西德力格尔，把不少参加“独贵龙”的牧民，折磨得死的死、伤的伤。他还下令抄了席尼喇嘛的家产，奴役了他的妻子儿女，逼死了他的五弟索瓦迪。还将一些受株连的“独贵龙”成员家属的房屋、财产、牲畜，一抢而空。使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马西德力格尔带来三百来名官员和士兵，在乌审旗整整住了三个多月。他们借口乌审旗尽是叛逆的“独贵龙”，任意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走时不但用六十峰骆驼驮走了大量贵重物资和金银财宝，还赶走了数以千计的牲畜，把乌审旗的广大贫苦牧民，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席尼喇嘛经过了无数次的火烧和吊打等酷刑之后，瘦成皮包骨头。他被钉上八十斤重的镣铐，前后关押在嘎鲁特、塔马嘎赉等地。不但经常遭受看守、狱吏的凌辱，还被押解着到全旗各地游乡示众。当席尼喇嘛等人受刑的创伤化脓溃烂之后，背不动八十斤重的镣铐，看守们便用毛驴驮着镣铐的一端，拖着他们游乡，即使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也得戴着那沉重的镣铐。

席尼喇嘛被监禁期间，乌审旗广大民众和“独贵龙”的安达

们，心如刀绞。他们和广大民众多方活动，想要设法把他救出苦海。但是，官方很快又把他转移到乌审旗王府后面的监狱里，同钉着一百二十斤重的镣铐的朋斯克拉西、乌力吉巴图、热达纳斯迪等人关押在一起。

为了营救席尼喇嘛等人，索德纳木东日布、图布旦巴拉巴尔以及阿尔宾巴雅尔等，同反对乌审旗封建王公的一伙“土匪”取得联系。这伙“土匪”的首领名叫嘎尔杰（嘎·乌力吉，达拉特旗人），当时他率领着三百多人，活动在乌审旗的南部。“七十安达”和嘎尔杰共同商定劫狱营救席尼喇嘛等人的计划。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的一天的深夜，突然来了二十多个“土匪”打开监狱，砸碎了席尼喇嘛等人身上的镣铐，把他们救了出来。席尼喇嘛被救出后，会见了嘎尔杰。然后逃到札萨克旗的巴布梅林家里，当了他家的私塾先生。

席尼喇嘛想回家探亲，巴布梅林送给他一匹善跑的黄骠马。腊月二十九日那天，席尼喇嘛回到了家。席尼喇嘛家中有一间房子留有后门，是为在危险的情况下逃走而准备的。席尼喇嘛这次回来，同以往一样，还是住在这间房子里，把他的马拴在后院的棚圈里喂养。他叫家里的人悄悄告诉亲戚朋友，并且同他们很快见了面。他本打算在家过个春节，第二天清早再动身，但是，到傍晚时分，他发现旺楚克拉布丹的几个爪牙以寻找牲畜为幌子，接二连三地来他家窜游。他感到有异，当夜就返回了札萨克旗。

席尼喇嘛刚离开家，旺楚克拉布丹就带领着十几个士兵包围了他的家。他们立即派出人马四处追捕。由于席尼喇嘛骑着一匹快马，未能追上。从此，旺钦米得格以及“七十安达”的家，也经常有敌人监视着。

席尼喇嘛在札萨克旗任教期间，得知札萨克旗庙活佛旺丹尼

玛在许多问题上同札萨克旗王爷有着重大分歧。他决定去北京看望这位伊克昭盟的著名人物。

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席尼喇嘛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旺丹尼玛任北洋政府陆军司令部的挂名高级参议。他的生活待遇虽然不错，但在政治上却受到种种限制。席尼喇嘛住在雍和宫。内蒙古的革命者和进步青年，也经常来往于雍和宫。席尼喇嘛非常希望能把这些革命志士组织起来。

这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全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北洋政府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席尼喇嘛为了便于搞革命活动，也在北洋政府的陆军司令部里工作。他不但仔细地观察和了解国内外的形势，而且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者。

这次，他在北京住了四年。他和旺丹尼玛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宣传，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有了接触。这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他认识到，为了解放自己的民族，必须动员广大的贫苦民众，经过长期艰巨而复杂的革命斗争，才能彻底推翻封建王公贵族的反动统治，从而使他从只反对乌审旗的暴君察格都尔苏荣及其走狗的狭隘圈子里跳了出来。开始具有了推翻整个封建统治的思想觉悟。他在这颠沛流离的四年里，思想认识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席尼喇嘛产生了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革命道理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旺丹尼玛，得到了旺的支持和鼓励。

他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乌审旗。那时，他的小儿子贡嘎随其喇嘛叔叔在乌审召当了小喇嘛。他便路经乌审召，领上小儿子一起回了家。这时，乌审旗王府军队的首领是台吉丹达尔。此人原是“七十安达”的成员，是“独贵龙”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曾



在“嘎鲁特会议”上和席尼喇嘛同时被捕过。但是，他经不住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用金钱地位的引诱，终于背叛了人民，成了封建王爷的心腹走卒，担任了王府军队的首领。

丹达尔为了表达效忠王爷的诚心，经常派遣暗探监视席尼喇嘛的行踪。因此，席尼喇嘛回到了家乡以后，还不得不经常躲藏在巴拉尔的柳树丛中，秘密邀集安达们碰头研究问题，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几天之内，他便打通了一些牧民的思想。于是他同赛兴嘎、满达呼达赉、朝克图、西日布扎布、巴拉坦、尼玛仁钦、达日玛（女）、萨仁高娃（女）、丹森、桑布、拉姆扎布、特古斯吉尔格楞、图布新、松尼等，再加上他十四岁的小儿子贡嘎，一共十六人，在一九二四年冬，到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

在乌兰巴托，他们受到了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乔巴山的热情接待。不久，席尼喇嘛被安排到国立图书馆工作、学习。他的小儿子贡嘎被送到苏赫巴托学校学习。满达呼达赉、赛兴嘎等其他人都被送到军事学校学习。

席尼喇嘛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期间，乔巴山经常同他谈论革命的道理，对他的生活非常关心。他也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便认真攻读了很多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苏联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深远意义，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在此期间，他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为鄂尔多斯乌审旗的人民革命运动整理编写了一些重要文献。此后又进入军事学校，研究军事技术。

席尼喇嘛于一九二五年二月派遣拉姆扎希等回到了乌审旗。他在给吉米彦、索得纳木东日布等“独贵龙”的领导人写的信中介绍了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并要求他们大力发展“独贵龙”，把一切反对封建王公统治的牧民甚至贵族、喇嘛，都吸收到“独

贵龙”里来。为建立人民的政权，而努力奋斗。

一九二五年秋，席尼喇嘛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回到了张家口。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等同志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席尼喇嘛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旺丹尼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当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随后，组建了四个连的军队，席尼喇嘛被任命为连长。这次会议之后，席尼喇嘛又回到北京，让贡嘎、桑布、赛兴嘎等人回到了乌审旗。

一九二六年二月，席尼喇嘛途经张家口，回到了乌审旗。当他返回家乡的消息传出后，“独贵龙”的七、八百人聚集到嘎鲁特庙，热烈欢迎他归来。随后，席尼喇嘛召开了有两千多牧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他宣读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文件，宣传了贫苦牧民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夺取政权获得解放这一真理。因此，他受到了广大牧民群众的拥护，许多人提出了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申请。

大会之后，席尼喇嘛亲自抓了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第一批就建立了七个支部。到当年三月，全旗已经有了十七个支部和委员会。三月十七日，席尼喇嘛在嘎鲁特庙召开了全旗的党员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委员会。索德纳木东日布当选为党委书记，图门杰尔嘎勒当选为委员长，曾任过王府笔帖式的孟和乌力吉担任了秘书。

乌审旗的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为了镇压“独贵龙”的群众，命令丹达尔把席尼喇嘛和追随他的人全部抓起来。丹达尔带领四十多个士兵准备从两面合围嘎鲁特庙，企图把与会的“独贵龙”群众一网打尽。这时，席尼喇嘛的挚友之一，家在哈溜图庙

的喇嘛根敦灵苏根，在探家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席尼喇嘛。于是席尼喇嘛在敌人到来之前，即携同吉米彦扎布、尼马仁钦、图布丹巴拉尔和根敦灵苏根等人，连夜转移，沿着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的交界地带，向包头方向走去。

丹达尔没有抓住席尼喇嘛，便残酷地拷打了聚集在庙上的群众，把他们的财物抢劫一空，并挨家逐户地搜查了一遍。他们从“独贵龙”的人员中，抓走了索德纳木东日布、阿尔宾巴雅尔（席尼喇嘛的女婿）、赛兴嘎、贡嘎等八人。由于没有得到什么供词，只好把他们几个人带到塔玛格查庙，用脚镣手铐禁锢起来。特古斯阿木古郎王爷的暴行，更加激发起了全旗广大群众的愤慨，纷纷要求王爷立即释放被捕的索德纳木东日布等人。该旗南部萨尔力克等地的“独贵龙”组织，为了解救被捕的战友，还向乌审旗协理朝克图瓦其尔和参领那顺巴图提出了强烈的要求，并逼着这两个官员和他们一起来到陶格里玛庙，让他们二人向特古斯阿木古郎王爷转达群众的意见：如不立即释放被抓的“独贵龙”成员，必将危及王爷和王府官员的安全。王爷无奈，只好下令释放了索德那木东日布等八人。他们获释以后，躲避在宝日呼和乌顺柴达木等地，几个月以后，也前往包头去寻找席尼喇嘛。

席尼喇嘛等人来到包头后，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全面地报告了乌审旗的斗争情况。经过研究一致认为：“独贵龙”运动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夺取政权。

于是，席尼喇嘛开始着手筹建革命武装的工作。这时，苏联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援了冯玉祥部队一批武器弹药，乔巴山元帅从中拨出五百支枪，支援伊克昭盟的革命斗争。

这批武器未到之前，席尼喇嘛在包头建立了一所训练蒙古族

青年的学校。由赛兴嘎担任校长，向蒙古族青年传授革命道理和军事知识。

这批武器运到后，席尼喇嘛等即在包头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一个支队，旺丹尼玛担任司令员，席尼喇嘛担任第十二团的团长，全团共三百多名战士。

训练结束后，部队正准备返回故乡时，旺丹尼玛司令员突然遇刺身亡。席尼喇嘛等率领部队离开包头，到达达拉特旗王爱召以后，才将旺丹尼玛被害一事告诉了大家，把旺丹尼玛的尸体，秘密地装在武器箱内，一直运到他的家乡札萨克旗进行了安葬。旺丹尼玛死后，由他的夫人担任了司令员。

一九二六年秋，席尼喇嘛率领第十二团来到了乌审召。当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赛音巴雅尔、包玉清等十几个人，也随军来到这里。他们派专人叫来了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郎，紧接着召开了由党中央代表、人民群众代表和王公方面参加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席尼喇嘛代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正式成立乌审旗人民革命军和乌审旗人民政府，成立人民联盟。同时宣布如下三条指令：一、乌审旗王公不许违抗人民联盟及其支部的一切规定；二、不许阻挠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三、解散王府所属的旗兵，撤消丹达尔的职务，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人民革命军。

在组织起来的广大牧民群众面前，乌审旗王爷无力反抗，只好乖乖地表示：“愿意遵命！”并在三方面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但是，席尼喇嘛当时考虑到旗里的许多上层人物，甚至包括盟长沙格都尔扎布在内，都和革命队伍的成员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没有马上收缴乌审旗王爷所属旗兵的武器。

席尼喇嘛在乌审召呆了十几天，就又来到了嘎鲁特庙。他在

这一带进一步开展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并于当年年底，在芒哈图庙召开了全旗十七个支部的全体党员大会。会上正式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委员会。选出正式委员五人，候补委员四人，组成了党的乌审旗委员会。索德那木东日被任命为书记，图门杰尔格勒担任了旗委员长。当日，又召开了旗委第一次会议，讨论研究了全旗的工作。从此，乌审旗的革命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年的春节前夕，席尼喇嘛让大部分士兵回家过年，他自己只带着少数士兵迁移到呼陶勒盖。特古斯阿木古郎探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认为这是捉拿席尼喇嘛的好机会。于是，他纠集了旺楚克拉布丹、宝音朝哈格等一百多人，在腊月二十九日深夜，包围了席尼喇嘛的驻地。但是，席尼喇嘛早有准备，敌人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这次战斗中，席尼喇嘛的部队活捉了旺楚克拉布丹和宝音朝哈格等十余名官兵。席尼喇嘛释放了其余人员，把民愤极大的旺楚克拉布丹、特古斯杰尔格勒、那旺诺日布和宝音朝哈格等人监禁起来。

席尼喇嘛率领战士们，押解着俘虏，从呼陶勒盖迁移到乌兰陶勒盖庙。沿途人民群众对旺楚克拉布丹恨之入骨，竟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一九二七年农历正月初三，席尼喇嘛率领部队从呼陶勒盖出发，直奔达丹尔的家。丹达尔走投无路，只好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狗命。席尼喇嘛饶有风趣地说：“哎，我们是来给旗兵的首领大人拜年的，没想到我们一来，他就给吓死了，原来他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旺楚克拉布丹被放出后虽然只剩下一只眼睛，仍贼心不死，

还要做垂死挣扎。他和特古斯阿木古郎密谋，决定前往榆林城，请军阀井岳秀派军来镇压席尼喇嘛的部队。

井岳秀为了乘机侵入鄂尔多斯草原，欣然接受了旺的请求，并和特古斯阿木古郎结拜为兄弟，还接受了特古斯阿木古郎送给他的大片土地和牧场。这就给乌审旗的广大群众带来了更为惨重的灾难。

各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井岳秀在鄂尔多斯草原大肆掠夺财产、杀害人民的时候，把长期以来在内蒙古地区投资生产、开荒种地的榆林人民及小商小贩的财产和牲畜也一扫而光，这就激化了这些汉族人民和井岳秀之间的矛盾。每当井岳秀反动军队出来进行掠夺时，这些汉族人民便把井与特古斯阿木古郎的活动情况，及时地报告给席尼喇嘛的军队；并且送来粮草支援人民革命军。由于蒙汉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国民党军阀和乌审旗的反动王公，人民革命军屡屡获胜，井岳秀的军队常常被打得狼狈逃窜。

一九二七年二月间，席尼喇嘛率领的第十二团驻扎在乌兰陶勒盖，准备应敌。二月十三日拂晓，从乌兰陶勒盖庙东南的柴达木，突然驰来井岳秀的二百多名骑兵，分兵三路，一路直扑第十二团的驻地，其余两路从庙的两侧包抄过来。

席尼喇嘛早已得到敌人这次突袭的情报，便命令一部分军队埋伏在庙西北的山丘顶上。当敌人靠近时，埋伏的军队居高临下，以强大的火力把敌人压向庙东南一望无际的大柴达木，战士们一跃而起，猛烈追击，使敌军遭受惨重伤亡。这次战斗之后，席尼喇嘛查清了井岳秀的部队是从特古斯阿木古郎的王府出发进犯人民革命军的。于是席尼喇嘛率领军队直接到了王府。用手枪逼着特古斯阿木古郎，要他交待和井岳秀勾结的罪恶活

动。特古斯阿木古郎吓得面无人色，站在他身旁的东梅林胡尔杏毕力格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地上求饶说：“请席尼喇嘛高抬贵手！”席尼喇嘛当众揭穿了特古斯阿木古郎的阴谋诡计，历数他的种种罪恶，收缴了他的全部武器，然后派几名战士把他看管起来。

当年九月二日，席尼喇嘛部队的二十几个士兵，在乌冷柴登一带巡逻时，与井岳秀部队的二百多名士兵突然相遇。经过英勇奋战，打死了几十个匪兵。这时，由李裕智、奎璧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一、第二营，从银川派来了七十多名援军。席尼喇嘛率领部队赶到乌审旗和鄂托克旗交界的珠日和庙迎接。在一起去往陶资庙路上，抓到了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派遣的两个便衣使者，搜出了沙盟长给特古斯阿木古郎的一封密信。信中说，他准备调动伊克昭盟各旗的军队，与井岳秀密切配合，采取四面合围的办法，彻底歼灭席尼喇嘛的军队。席尼喇嘛得到这个情报，警惕性更高了。

席尼喇嘛的部队和敌人进行的激烈战斗达七十多次，敌军闻风丧胆。人民革命军愈战愈强了。

沙克都尔扎布看到围剿失利，便想暗杀席尼喇嘛。他对达拉特旗的山吉米德布说：“只要你能把席尼喇嘛干掉，我赏给你金钱和军权！你曾经救过席尼喇嘛的命，一定有成功的把握。”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接着手枪，藏在内衣里面，就启程奔向乌审旗。途中，他在白音陶勒盖的色登诺日布家过宿时，一时得意忘形，竟暴露了自己的马脚。第二天，色登诺日布以护送为名，派了两名士兵，随同他一道去嘎鲁特庙。到了那里，两名士兵首先去见席尼喇嘛，报告了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山吉米德布装模作样地向战士寻问：“我是席尼喇嘛的安达兄弟，他现在哪

儿？”正在这时，团部派来两名战士，对他强行搜查，他无法抵赖，只好老老实实地交出了藏在怀里的手枪，并如实地交待了他的罪恶企图。这个坏蛋受到了应有的处置。

席尼喇嘛领导的军队，所以能够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是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革命军队。席尼喇嘛对战士经常进行这样的教育：“我们是人民军队，是为人民利益战斗的。因此，不许打骂人民，不许侵占人民的一点财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军队和王爷的官兵有什么两样？”他还说：“我们官兵一律平等，要亲如兄弟，互相关心。”在这方面，他不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还能严格地要求部队。他特别反对打骂士兵。一次，部队行军中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有一个战士偷偷地溜到这家院子里，用自己的劣马，换走了人家的好马。这件事，席尼喇嘛当时虽有觉察，但是没有马上处理。到了宿营地以后，他让那个战士亲自去送还马匹，并承担责任，当众作了检讨，为战士们做出了表率。席尼喇嘛还时常下伙房，给士兵们烧茶做饭。

当年八月，乌审旗的反动势力，和沙盟长勾结井岳秀，采取两面夹攻的方法，围攻席尼喇嘛的部队。其中一路是由旗兵、盟属部队和井岳秀的匪军共两千多人组成，从乌审旗的东南部，直扑过来；另一路由张鸿云率领，从榆林城出发，途径梅林庙、乌冷等地迂迴包抄。他们很快就占领了乌审旗大部分地区。在这危急关头，席尼喇嘛领导的第十二团的指战员们，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所吓倒。他们沉着应战，进行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席尼喇嘛把部队分成许多小分队，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与敌军周旋。他们避开敌人的锋芒，歼灭零散的匪军。他们还乘敌人精疲力竭的时候，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奇袭其一面的办法，使敌人受到很大打击。



乌审旗王爷特吉斯阿木古郎，被这震撼鄂尔多斯高原的英勇斗争吓破了胆，便逃到榆林，投入了井岳秀的怀抱。当时，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贫苦牧民群众，都为革命军的胜利所鼓舞，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

我们军队的团长，  
神机妙算赛孔明；  
对我们蒙古族的人民，  
满腔热忱献忠心。

我们的部队首长，  
智勇双全真出众，  
创建了革命的军队，  
打垮了万恶的敌人。

席尼喇嘛非常关心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分析研究国内外动态。经常循循善诱地对同志们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常对那些认识模糊的战士讲：“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不仅是从北边（指第三国际）来的，更主要的是从南边（指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来的。那些头戴红五星的人们，就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到那时候，我们将会更加发展壮大！”

乌审旗的政治局势有所稳定，席尼喇嘛惩处了少数反动王公和他们的走狗，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广大牧民群众更加热烈地拥护和支持人民革命军，那些深受榆林军阀井岳秀的残酷压迫的汉族劳动人民，也主动向乌审旗人民革命军缴税送粮。蒙汉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下了革命的友谊。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我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当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白云梯等，在银川叛变了革命，投靠了蒋介石集团。并发出了“清党”的通知。但是广大革命者，对这些叛徒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在银川民族学校工作的赛兴嘎等人，带领学生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寡不敌众，结果被敌人镇压下去，有不少人流血牺牲。赛兴嘎同志只好带领民族学校的部分学生，回到了乌审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白云梯还企图把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第一营营长赛通嘎拉拢过去，把这支部队拱手送给蒋介石。赛通嘎是曾经和席尼喇嘛并肩战斗过的英雄好汉。白云梯为了达到他的罪恶目的，派去了二十多个官兵。从此，第一营的内部产生了矛盾。赛通嘎只好离开了部队。第一营的一部分人便投降了国民党。后来这些叛兵被席尼喇嘛的部队歼灭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赛音巴雅尔也叛变了革命。叛徒舍楞东布秘密指示他：“务必设法把席尼喇嘛领导的第十二团调到银川！”赛音巴雅尔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曾经多次劝说席尼喇嘛，但毫无效果。赛音巴雅尔便以副司令的名义，命令乌力吉杰尔格勒率领部队前往银川，如果违抗命令，就逮捕法办！席尼喇嘛看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同战友们研究之后，决定前往银川。

席尼喇嘛率领部队从协理府出发，途中宿营在查玛哈嘎柴达木的一个叫巴雅尔芒耐的人家。叛徒赛音巴雅尔听到席尼喇嘛来到的消息，便派兵去杀害席尼喇嘛。于是在查玛哈嘎柴达木原野上展开了一场血战。

席尼喇嘛的部队将赛音巴雅尔的部队消灭了一半，赛音巴雅尔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向银川方向逃去。席尼喇嘛率领军队转战在毛宝力高、哈留图等地，后来又回到达布其格地区，在那里建立

了革命根据地，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

当年九月初，白音陶克等人勾结军阀井岳秀，又纠集了一千多匪兵，再次向革命军队进攻，结果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此后，井岳秀虽然不敢公开进攻革命军，但他仍旧和特古斯阿木古郎相互勾结，密谋暗杀席尼喇嘛。他们发出赏赏布告：“如果谁杀掉乌力吉杰尔格勒，不但委以乌审旗旗兵首领的要职，而且赏银一千两。”

席尼喇嘛听到这个消息，对大家说：“假如我干了对不起乌审旗人民的坏事，你们可以杀掉我；如果我做的事情对乌审旗有好处，那么，你们怎么能杀掉我呢？”他还说：“现在那些家伙天天在琢磨着杀害我，即使我死了，乌审旗的革命火种也不会熄灭。总是有人会起来革命，革命终究会成功的！”

这时候，特古斯阿木古郎，又派呼和陶勒盖的德力格尔仓作为密探，打入了席尼喇嘛的部队，准备暗中下手，制造惨案。

一九二九年冬末，席尼喇嘛给他的战友放几天假，让他们回家过年。但是秘书孟和乌力吉没有回家，布仁杰尔格勒，额尔和木达赉、浪诺日布等人，也以保护团长和秘书为名，留下没走。当时，孟和乌力吉和席尼喇嘛住在一个院内。

一九三〇年一月三十一日，正是正月初二的深夜，穷凶极恶的敌人突然把罪恶的子弹射到了鄂尔多斯人民的英雄儿子席尼喇嘛身上。

第二天，阴云笼罩了鄂尔多斯高原，全体安达和战友们悲痛欲绝。秘书孟和乌力吉也大声说道：“我们一定要抓到杀害乌力吉杰尔格勒的凶手！”但又说：“这可能是土匪来干的事情！”这样，就把事情拖延了两天。

席尼喇嘛遇难的时候，只有第三连在他的身边护防。其余各

连都在外地。出事后，外地住的部队马上赶来，把有关人员全部押起来，并且仔细地审讯了当天夜里值班的哨兵和巡逻兵。结果证实：三营二连连长布仁杰尔格勒和额尔和木达赉等人是合伙杀害席尼喇嘛的凶手。

那天夜里的哨兵是额尔和木达赉，值班员是布仁杰尔格勒。当布仁杰尔格勒以看表为幌子，进入席尼喇嘛的房间，额尔和木达赉躲在他的身后开枪。事后，他们立即吹灭蜡烛溜走了。事情初步查清，罪犯们都被逮捕了。孟和乌力吉说：“杀害团长大人，罪恶滔天，应该立即枪决凶手！”就把额尔和木达赉和布仁杰尔格勒立即拉出去枪决。额尔和木达赉喊道：“你们可以杀我，但是我有几句话要说。”孟和乌力吉催促执行者：“快杀、快杀！”立即开枪把两个凶手打死了。

革命军的指战员们，都为失去了卓越的领导人而万分悲痛。为了继续进行革命，给席尼喇嘛报仇雪恨，指战员们一致要求尽快选出一个新的领导人。当时，有人提议让孟和乌力吉当团长。孟和乌力吉地说：“我才疏智浅，不能胜任。不过，如果大家硬让我担任团长，我为了给死去的团长报仇，愿意承担！”

在枪决额尔和木达赉和布仁杰尔格勒的前一天，呼 和 陶 勒 盖的德力格尔仓来到布仁杰尔格勒的家中。这时布仁杰尔格勒已被革命军抓走了。大家便把德力格尔仓也抓了起来，并要求立即审讯，等拿到口供再做处理。孟和乌力吉说：“不必在这里审讯，把他带到南村再说。”可是，在去南村的路上，孟和乌力吉便把德力格尔仓枪决了。

席尼喇嘛遇难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四面八方。当时，陶利“独贵龙”的领导人乌力吉巴特尔听到这个消息，伤心地说：

“革命军队的权力落到了孟和乌力吉的手里，乌审旗又要遭殃了！”孟和乌力吉听到此话，马上派兵捉走了乌力吉巴特尔，不经审讯，就把他拉到哈留图庙的沙丘里枪决了。

席尼喇嘛领导的革命军终于失败了。但是，鄂尔多斯人民的英雄儿子——席尼喇嘛以及他所建树的卓越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心里。

## 旺丹尼玛事略

宝音图

旺丹尼玛，伊克昭盟郡王旗人，是图门巴雅尔之子，芒来吉尔嘎拉的弟弟。旺丹尼玛的年龄与席尼喇嘛的年龄相近，但究竟何年何月生，尚未弄清楚。

旺丹尼玛出生于贫民家庭。他同公爷庙（召）活佛伊希丹金旺吉勒，诗人贺其格巴图等人一样，是一个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幼年时被扎萨克旗喇嘛庙选定为活佛。后来由于他精通蒙、藏文和佛学，被授予班弟达<sup>①</sup>学位。因此，人们都尊称他为“班弟达”经师。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宗教渗透，在鄂尔多斯各旗，修建了许多教堂。这些天主教堂不但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向王公贵族廉价购买了大量土地草场，还把鄂尔多斯的特产甜草<sup>②</sup>大量运往国外，获取暴利。年青的旺丹尼玛，亲眼看到牧民的财富被一批批掠走了，心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火。他觉得只有起来进行斗争，赶走外国侵略者，人民的生命财产才能有保障。一九〇〇年，我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

---

注：

①班弟达——佛教中的一种学位称谓。

②巴彦敖包出产的甜草质量好。如今巴彦敖包这个地方已经沙化了。

运动。鄂尔多斯各旗也迅速出现了“独贵龙”运动。他们烧毁教堂，赶走传教师，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旺丹尼玛亲自参加了这场斗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满清王朝对外卑躬屈膝，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向外国侵略者大量赔款。为了解决赔款问题，清王朝决定在蒙古地区开垦草场，采取“移民戍边”的政策。由于大量开垦草场，严重影响了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满清当局和蒙古牧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蒙旗的人民群众为了保护草场，开展了一场反对开荒的斗争，有些王公、贵族、台吉和喇嘛也参加了这场斗争。

旺丹尼玛更是怒火填膺，他走出庙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他的带领下，札萨克旗开展了大规模的“独贵龙”运动，参加“独贵龙”的群众同测量土地的官吏展开了斗争，捣毁了他们的房屋，并反对当局的苛捐杂税。由于旺丹尼玛领头反对开荒，札萨克旗王爷才不敢大量出卖草场（当时札萨克旗出卖的草场比其他旗都少些）。旺丹尼玛还积极支持了其他旗的“独贵龙”运动。如达木彬和朝克都楞领导的准格尔旗的“独贵龙”运动，阿尤尔萨那领导的达拉特旗的“独贵龙”运动，查干宝伦领导的杭锦的旗“独贵龙”运动，阿日拉喇嘛（章文轩）领导的鄂托克旗的“独贵龙”运动等，都受到旺丹尼玛的有力支持。全盟人民反对开垦草场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满清当局的“移民开荒”政策。为此，札萨克旗王爷沙克都尔札布召见旺丹尼玛，指责他一个作为出家的活佛喇嘛，不应该动枪动武，扰乱旗政，违抗王法，支持贱民，参与暴乱。旺丹尼玛据理反驳了沙王的指责。经过这一场争辩，沙王和旺丹尼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本来札萨克旗的王位应由伊其拉布敦继承，但被沙克都尔札布篡夺了。札萨克旗衙门的“笔帖式”（相当于文书）阿尔彬贺其格在整理档案资料时，发现了事情的真象。便向伊克昭盟盟长、

达拉特旗王爷逊布尔巴图提出控告。沙克都尔札布得知这一消息，便将阿尔彬贺其格关押起来，过堂用刑，打得奄奄一息，然后交给关布章京好好“关照”。过了几天，阿尔彬贺其格就死了。沙克都尔札布又借口关布章京没有“关照”好，图谋问罪。关布便在众人面前揭露了沙克都尔札布的阴谋，并说出沙王篡夺王位和杀害阿尔彬贺其格等情，激起人们的更大愤怒。沙王不得已，不但没有问罪，还给关布一些钱物。

有一年，在那达慕盛会上，旺丹尼玛又同沙王吵了一架。旺丹尼玛就当众揭发了沙王排挤伊其拉布敦，篡夺王位，杀人灭口，残酷杀害阿尔彬贺其格的种种罪行。沙王大怒，要以“反王”之罪，扣押、惩处旺丹尼玛。但是，全旗文武官吏们认为班弟达经师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不宜轻举妄动。沙王也感到，如果杀害旺丹尼玛必将引起群众的反抗，导致更大的风波，于是就隐忍了。旺丹尼玛也知道，沙王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便带上苏儒穆（察哈尔人）和另一名弟子从扎萨克旗喇嘛庙出走了。这大约是一九〇六年的事。

旺丹尼玛出走之后，在伊克昭盟其他旗和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各旗群之间周游了数年。他隐匿了自己的身份，和普通贫民一样，做苦重的劳动。徒弟们劝他说：师傅，您有很大的学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活儿呢？他答道：只有与人民同甘共苦，才能做人民的知心朋友。

在这期间，旺丹尼玛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宣传，进一步认识了封建主义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猖狂掠夺的罪行。他深深感到依靠封建王朝救中国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制度。他决心为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而斗争。



扎萨克旗人民群众得知旺丹尼玛在察哈尔地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纷纷要求旗府把班第达经师请回家乡。在全旗官吏和百姓的强烈要求下，旗府不得不把旺丹尼玛接回扎萨克旗。

旺丹尼玛返回扎萨克旗之后，向旗民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各地反对满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号召人民组织“独贵龙”运动，反对封建王公，反对放垦土地，他还向盟长揭发了沙王出卖草场，侵吞出卖土地钱财的罪行。但盟长袒护沙王，把旺丹尼玛的正义行动诬蔑为“煽动旗民，扰乱地方”，对“独贵龙”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利用权势和金钱，或用高压手段，或用收买政策，严重地削弱了“独贵龙”运动。不得已，旺丹尼玛第二次离开扎萨克旗。

此后他即同杭锦旗的查干宝力德，达拉特旗的那木其赖等人合作，发动杭锦、达拉特和阿拉善旗东部地区的牧民群众，壮大“独贵龙”运动的力量，继续与王公官吏、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旺丹尼玛总结了十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要巩固和发展“独贵龙”运动，打击敌人，必须组织武装力量。在他的宣传和努力下，这些地区的“独贵龙”运动积极扩充武装，很快就搜集火、步枪一百余支，拥有武装人员二百余名。

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影响下，绥远地区有些蒙旗骑兵，也举行了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旺丹尼玛领导的“独贵龙”力量，与这些起义部队建立了联系，并在河套地区开展了反对清王朝斗争。

“独贵龙”运动的武装力量还在河套地区捣毁商铺，夺回土地，严厉地打击那些贪官、奸商及土豪劣绅。当时，杭锦旗的官布梅林在赴绥远谈判草场问题时，竟然把杭锦旗三个巴嘎的土地与盐池卖掉。查干宝力德和旺丹尼玛得知这个消息后，扣押了官布梅

林，押到盐池湖沙滩上进行游斗。他们还赶走了占据盐池的奸商、豪绅，夺回了盐池。这些贪官、奸商和豪绅纷纷向各旗王公和伊盟盟长告状。但由于旺丹尼玛和查干宝力德等人领导的“独贵龙”运动人多势众，又有武装力量，这些封建统治者对之也无可奈何。

这时，阿拉善旗王府给伊盟盟长送来一封密信，说：旺丹尼玛、查干宝力德等人，组织“独贵龙”，闯入阿境内，破坏治安，扰乱地方，要求伊盟认真解决这一事件。伊盟各旗王公在杭锦旗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在会上，他们采纳了杭锦旗管旗章京的建议，设法秘密逮捕旺丹尼玛、查干宝力德等人，并致函阿拉善旗王府要求予以协助。

阿拉善旗王府接信后，一方面派人到旺丹尼玛处，送去礼物，表示和睦相处；另一方面又与宁夏马福祥和陕西孔恒魁联系，请求给予支持。

一九一三年六月，阿旗王府官员致函旺丹尼玛，说有要事相商，邀请他到船上计议。旺丹尼玛接信后，即带两个卫兵，到了格根套海惠德升地方。刚要登船，枪口就对准他们，示出了伊克昭盟的扣捕令。他们把旺丹尼玛用船送到包头镇衙门。途中，查干宝力德等人虽予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准备，未能救出。旺丹尼玛被押到包头后，又押往归化城。绥远将军衙门审问了旺丹尼玛的身世情况后，呈报北洋政府当局，袁世凯下令将旺丹尼玛押送到北京。

一九一三年夏天，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门，开堂审讯了旺丹尼玛。他们把旺丹尼玛五花大绑押进了大厅。旺丹尼玛面无惧色，对审讯官说：“要杀早杀，我并不怕死。遗憾的是没有死在战场上，却上了奸细的当，受了这般苦刑。”在审讯过程中，那些审

讯官员们了解了旺丹尼玛的身世与经历,对他广博的学问,流利的汉语都很钦佩。司法部门向袁世凯呈报了审讯情况。当时袁世凯刚刚篡权,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已经宣布独立,内蒙地区也很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深知,要杀害一个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活佛喇嘛,会引起更大的波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想利用旺丹尼玛,他在亲自召见旺丹尼玛之后,就把他释放了,并在北京城给安排了住宅。旺丹尼玛在北京一直住了十二年,并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活动。

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国人民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旺丹尼玛亲眼看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他认识到组织起来的民众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旺丹尼玛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第三国际和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在北京同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一起,积极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筹建活动。他认识到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光明前途。当席尼喇嘛去北京时,旺丹尼玛对席尼喇嘛说:我们的革命形势很好。我想派一些人去乌兰巴托学习革命道理,尚未找到适当人选。席尼喇嘛当即表示愿意亲自前往。他们商定了去乌兰巴托的具体路线和人员。席尼喇嘛从北京返回乌审旗后,组织了十六个人,于一九二四年赴乌兰巴托学习。

另外,旺丹尼玛还派人去各盟、旗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当时荣儒布被派往伊盟,给各旗送去了密信。苏、蒙方面对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也给了很大的支

持，还支援了一批枪枝弹药。旺丹尼玛从各地招人进行培训，又派回原地去进行革命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是从伊克昭盟前来参加学习的。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一九二五年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指导了这次大会。李大钊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当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九人。旺丹尼玛被选为中央委员，兼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司令。会后，旺丹尼玛回到北京。不久即返回内蒙，进行革命斗争。当时旺丹尼玛的部队有三百余人，整编为一个营，下设四个连，席尼喇嘛就是其中的一个连长。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部迁到包头后，在包头建立了三公学校（即军政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当时由多尔济扎布任校长，孟根昌任指导员，赛兴嘎任军事教练员，奎璧、巴彦巴图尔等人任教员。学校从各盟、旗招收青年人，讲解革命道理，进行军事训练。旺丹尼玛还同苏蒙方面取得联系，拟从国外运进一批枪枝弹药。一九二六年，他派扎萨克旗的道布旦和荣儒布等七人去东北德格都乌德，运回六千支枪枝。但在返回途中，行至喇嘛庙时，被张作霖的宪兵队抢去了。旺丹尼玛听到这一消息非常痛心。

革命烈火燃遍了整个内蒙古草原，日益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参加斗争。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二六年夏天，旺丹尼玛住在包头德明棧商号。当他正准备率领部队返回伊克昭盟时，被坏人下毒药毒死了。他的战友们决定把旺丹尼玛的遗体秘密送往扎萨克旗喇嘛庙安葬。全军行至达拉特旗旺乃召，才公布了旺丹尼玛被害的消息。全军士兵强烈要求揪出谋害旺丹尼玛的凶手，严加惩处。但是篡夺了部队领导权的策仁栋日布对士兵的要求，怕得要死，竟

然把潮伦巴特尔和包启蒙二人以“扰乱军心罪”惩处了。为了笼络人心，他把旺丹尼玛的妻子委任为副司令，并讲了许多骗人的话，才把队伍带到扎萨克旗喇嘛庙。

安葬了旺丹尼玛的遗体后，舍楞栋日布即图谋解散革命军队，席尼喇嘛看穿了策仁栋日布的阴谋，即带领自己的弟兄，前往乌审旗，继续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旺丹尼玛虽然被害了，但是，他的遗志和英雄事迹，鼓舞着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鄂尔多斯人民。

旺丹尼玛有八名警卫人员，他们是：津巴扎木苏、道布吉尔、舍楞拉喜、普力杰忠乃、荣儒布、金山（达拉特旗人），甘珠尔扎布（哲盟博王旗人）等。

## 陈长捷杀害奇国贤之我所见

奇世勋

奇国贤，蒙名道布庆道尔吉，原是乌审旗的西协理，家住本旗沙尔利格大圪圖。

乌审旗东西官府不和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事。自从旗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郎死后，东协理奇玉山便以护理扎萨克的名义号令全旗，奇国贤对这个山大王自然心怀不满，长此以往，东乌审和西乌审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起来。这种矛盾在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

据说奇国贤在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就和陕北的共产党有了联系。一九四二年我在新街国民党绥境蒙政会任会委（即小委员。由蒙藏委员会任命的委员叫大委员，由蒙政会任命的委员叫会委）时就听到了这种议论。奇玉山为了除掉他强有力的政敌，对奇国贤和共产党的接触更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放出了不少的邪风毒雾，以混淆视听。当时的蒙政会大小官员对共产党还是存有戒心的，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有意制造民族隔阂，不少人惧怕把“红水”引进伊克昭盟。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派陈长捷到东胜，任伊盟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当时人们都称呼他“陈总司令”。这个杀人魔王，经常随意杀害无辜蒙汉人民，伊盟人民又称他为“陈屠家”。奇玉山正是利用了陈长捷对共产党的仇恨心理和对蒙政会的歧视而加害于

奇国贤的。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深秋时节，有一天，盟长、札旗王爷兼国民党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人称沙王）叫我到王府，和我谈起奇国贤。他对奇国贤和陕北的共产党发生联系表示无限忧虑，希望我到乌审旗面见奇国贤让他来新街走一趟，他想亲自和奇国贤谈谈，劝他不要随了陕北共产党。我离开新街的时候，沙王又亲笔给奇国贤写了封信，让我面交奇国贤。

我到了乌审旗东官府没有见着奇玉山，只见了奇玉山的姐夫（任乌审旗保安大队长）。他问明我的来由后，再三劝我不要到沙尔利格，说那里有八路军，去了性命也难保。第二天我走的时候，奇玉山的姐夫还派了一个兵给我带路。

离开乌审旗东官府两天后，我到了沙尔利格西官府。奇国贤看了沙王的信件，半晌不言语，脸上毫无表情。我的身份显然不是送信的差使，我得苦言相劝，争取奇国贤和我一起到新街见沙王。在我们交谈中，奇国贤矢口否认和陕北有联系。他说：“哪有那么回事。陕北来了共产党谁也撵不走，我能怎么样？我倒是想见见沙王，给他说清楚，我奇国贤还是让他放心的。”我知道奇国贤虽是个忠厚善良，和事和人的人，软劝不成我也不能硬来。他几次流露出到新街的忧虑，他说：“去倒可以，就怕见陈长捷。那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灰东西。”我说：“扎萨克旗离东胜二百来里地，离陈长捷还远着哩。再说咱们是见沙王，陈长捷能把你怎么样？我看你还是去走一回好。”那次，我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他只是来回摇头。这一挠头的事使他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矛盾之中和进退两难之地，他不时地长吁短叹，长时间地沉默不语。看来让奇国贤和我一起到新街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只好自收锣鼓停止了这场难以演下去的丑戏。翌日，我在离开沙尔利格

时，奇国贤为我送行，临别前我又重复了昨夜对他说的话：“沙王的话我都说给你了，你要是怕陈长捷，你就个人打主意吧。”

我回新街后向沙王汇报了我的乌审旗之行。沙王也没说什么，只是说：“他不想来就算了。”此后不久，蒙政会召开会议，伊盟七旗都有人参加，乌审旗来的代表是西协理奇国贤。我们见面后互致问候，言谈中他流露出想利用开会的机会顺便消除沙王对他的担心，但他讲的比较隐晦。奇国贤一行抵达新街已是傍晚时分，没有参见沙王。按照当时的规矩，他还不能直接见沙王，得听候阿木古楞大委员的安排。第二天上午，我领着奇国贤拜见了阿委员。阿委员是沙王跟前的“大红人”，大小事都得经他的手，权势很大，炙手可热。我们在寒暄之后，阿木古楞说，他要把奇国贤的到来尽快告诉沙王，至于沙王什么时候接见奇国贤，再另行告知，且嘱咐奇国贤“不要在新街乱窜（指到别的地方），以防不测”。

记得有一天上午大约九时许，有五六个国民党兵突然把奇国贤五花大绑起来，二话没说就从新街解往东胜。见此情景我急忙去找沙王请示营救办法。沙王说：“你赶快去找陈长捷，给他说明一下情况，无论如何给咱把人领回来。”

关于奇国贤被捕的原因我事后才弄明白。当蒙政会通知各旗仕官到新街开会时，奇玉山一开始就推托不去，并且反复劝说奇国贤去参加会议。这样，奇国贤才带领随从副官启程赶往新街的。就在奇国贤离开沙尔利格后，奇玉山便给驻在榆林的朱绶光（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去电，请朱急速派人在途中杀掉奇国贤。不知是什么原因，朱绶光没有直接杀害奇国贤，而是把这件事交给了陈长捷。

我受沙王的委托，和奇国贤的随从副官一同赶到东胜，当天下



午就见了伊盟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我向他提了两点要求：第一点是尽快求见陈长捷，转达沙王的意见；第二点是一定要见一下奇国贤。经协商再三，处长答应：“见奇国贤现在就可以；至于向陈总司令转达沙委员长的意见明天再说。”

我们见到奇国贤时，奇的副官已哭成个泪人。从奇国贤刚毅的脸上我看到了他愤怒的神情。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因为跟前人多，又不让我们单独谈话，我只用蒙古语问了他一句“怎的了”，他也用蒙语回答说：“我完了。”这时奇的副官哭得更厉害了，几乎是放声大哭。

第二天，陈长捷叫我和奇国贤的副官一同共进午餐，我顺便转达了沙王的意见。陈长捷慢慢腾腾地对我说：奇国贤“通匪”（指和中共的接触）是有罪的，是朱长官来电让我扣他的，人是不能领回去啦，回去告诉沙委员长，待请示中央后再说。”

万般无奈，我只好和奇国贤的副官失望而回。几天后，这个残忍成性的“陈屠家”终于下了毒手，在东胜将奇国贤秘密处死。奇国贤死时年仅四十多岁。他的死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反共灭蒙”政策，激化了鄂尔多斯人民和国民党当局的矛盾。

奇国贤死后，正在新街开会的各旗仕官群情哗然，纷纷指责陈长捷，有的甚至责骂国民党。沙王当时也很气愤。一向老诚持重的沙王，也不顾众仕官在场就激动地大声说：“不管奇国贤怎么样，我连他的面都没见就给杀了，真是岂有此理！”沙王的夫人也曾背后对人们说：“陈长捷也太不说理了，好好的个西官府，长不说长，圆不说圆，就给杀了？！”表示出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不满。在乌审旗，人们对陈长捷无辜杀害奇国贤更是愤怒万分，各界人士包括普通牧民都激愤难忍。当时人们慑于“陈记杀人坊”

的淫威，还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众怒难犯，几个月后，伊盟就爆发了武装对抗陈长捷开垦牧场的民族起义。札旗事变后，乌审旗军民也积极响应，在保安队奇金山队长的指挥下，于旧历三月十一日发动了“乌审旗事变”，逮捕了保安队里的国民党特务人员和蒙汉官员中的坏分子共五十多人，其中四十多名罪大恶极的被拉出去枪毙了。这是陈长捷推行“反共灭蒙”政策的恶果，也是乌审旗军民对陈长捷杀害奇国贤最有力的回击。

奇国贤遇害已经四十一周年。现在我把他遇害前后的一些情况写了出来，作为对他的悼念。但因时隔久远，记述难免有不准确之处，希望知情人再作补充。                   （李克仁整理）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 奇恩诚传略

金牡丹整理

奇恩诚，蒙名仁庆栋日布，一九二二年出生于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乌替嘎查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祖父朝格吉尔格拉台吉，曾任鄂旗王府西协理，父亲查汗其劳虽没有官衔，但也以台吉自居。奇恩诚兄弟姊妹五人，奇恩诚是长子，号称达仁（大个子的意思）台吉。奇恩诚的家庭虽然不是家产万贯之户，但在鄂旗也是数得上的富贵之家。他聪明伶俐，又在家中受过启蒙教育，幼年就能识字读书，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他在娇生惯养中度过了童年。

一九三七年奇恩诚十六岁时，被送到章文轩办的阿日勒庙第一初级小学念书，由于他在家受过启蒙教育，蒙语文基础好，因此只上学三年，就掌握了初级小学的全部课程，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一九四〇年，章文轩出于用才心切，就挑选奇恩诚等几名学习优良的学生先到宁夏“师资培训班”进修，继而又转上初中。一年后，奇恩诚返回鄂旗，随即被章文轩分配到司令部工作。

一九四一年，章文轩已接近六十花甲，开始考虑自己的继位人选问题。他虽然有侄子章耀文、章耀武，但他知道，他们的出身微贱，如果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职位，贵族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势必出现争权夺利的斗争。为扶持侄子，保住他们现有的地位，避免出现争权夺利的后顾之忧，章经过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由台吉的后代接班。可是台吉子弟多是庸庸碌碌之辈，唯有奇恩诚年轻有为，才学出众，是较为理想的接班人。于是章文轩

首先把奇恩诚与两个侄子叫到一起，亲自为他们三人烧香秉烛，叩头拜为弟兄，接着就把奇恩诚列为继承人并呈报盟府批准，委任为伊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人们称奇恩诚为“后起之秀”。其时奇恩诚的爷爷西协理朝格吉尔格拉见孙子出挑成一表人才，又被戴上副司令的桂冠，大喜过望。同时他觉得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乘现在还在位，说话还管用之时再扶孙子一把，决定把西协理的位子也让给他。于是把章文轩请到家中，设宴招待，并送给章一锭元宝请求说：“我的年纪老了，继续协助王府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如果司令允许的话，就让我的孙子奇恩诚任协理职务吧。”章鉴于老协理的请求，又考虑到奇恩诚与自己侄子拜了把兄弟，与自己的侄女眉来眼去，形影不离，关系暧昧，认为奇已被自己笼络住了，就当场拍板把奇恩诚作为提拔协理的人选。与此同时，噶王的四子杨森扎布突然抛开经卷，走出庙堂，还俗娶了老婆，也积极活动准备当协理。究竟协理由谁来当呢？经过旗务会议协商后，认为这两人都年轻，这次不宜选任当协理，决定由图门德力格尔接任协理。然而此人命短，刚参加了王爷为其上任举行的宴会，就溘然死在回家的途中。这时在协理的人选上又出现了分歧意见。王爷王庆扎布要让其弟杨森扎布当协理，而章文轩则要让奇恩诚当协理。正当双方争执不休时，札萨克旗王爷、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派协理阿木古郎来到了鄂旗。阿木古郎把王爷王庆扎布请到阿日勒庙同章文轩商谈，决定由杨森扎布出任协理，奇恩诚任副协理。紧接着章文轩又把自己的保安司令之职让给了奇恩诚。随后不久，杨、奇二人踌躇满志地前往札府受衔领命。这已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情了。

章文轩觉得自己的目的已达到，就把奇恩诚叫来，郑重其事地交了权，并嘱咐奇要象亲兄弟一样扶持他的两个侄子。奇恩诚

受宠若惊，他深知自己之所以能由副司令升任为司令、副协理，全靠章司令的提拔和栽培，因而对章十分感激，处处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章文轩也认为了却了一桩大事，有了依托终身的继承人，可以守教诵经度个安逸的晚年。为了减少外来干扰，避开缠身的军政事务，章索性将司令部、学校等机构搬迁到克珠尔庙，自己住在阿日勒庙，身边只留了一部分卫兵。

章文轩对两个侄子十分宠信，处处袒护。这两人仗着章的权势，整天游手好闲，眠花宿柳，奸污妇女，聚赌酗酒，胡作非为。他们对章器重和提拔奇恩诚，非常嫉妒和不满，因此，经常在章的面前进谗言，说奇的坏话，挑拨离间他们的关系。久而久之，使章与奇产生了嫌隙，常因一些小事而闹别扭。这期间，宁夏的马鸿逵听说章选了一位年轻司令上任，想看个究竟，就让章文轩把奇领到宁夏来。马鸿逵一看奇恩诚身材高大，长得俊气，又兼通蒙汉文，对他产生了好感，当即赞扬章文轩有眼力，识人才。奇恩诚看到马鸿逵对自己的赏识，受宠若惊，联想到章对自己渐有疏远之意，顿萌亲马疏章，另觅靠山的念头。

一九四三年章文轩要到塔尔寺拜佛，把一切军政事务全依托给奇恩诚。这期间连续发生了几起案件，由奇恩诚亲自着手办理，结果都断错。章回来后要追究责任，奇着了慌，采取了嫁祸于人的办法，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与章仇隙很深的梅林章京、司令部秘书长阿尔并贺什格身上。章心里也明白奇恩诚是找替罪羊，但借此机会能除掉阿尔并贺什格，也去掉了自己心头的一块病，同时也给奇敲一下警钟。于是给阿尔并贺什格罗织了三条罪状，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阿尔并贺什格为了保住性命只好含冤负罪。

章文轩处理了阿尔并贺什格，对奇的震动很大。他感到章已越来越不信任自己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受到限制，因此，对章

文轩的不满情绪和戒备心理与日俱增，两人的嫌隙越来越大，特别是在花钱问题上，更是经常发生冲突。奇恩诚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当了司令、副协理后，年轻得志，生活更加骄奢淫逸，经常眠花宿柳，聚赌酗酒，挥金如土。为了寻欢作乐，他经常以士兵缺饷为由，向章伸手要钱，而章又秉性吝啬，拒绝给钱，两人经常争吵。奇觉得自己身为司令，连花一点钱的权都没有，还算什么司令？一赌气躲在家中，不来司令部上班，后来又跑到宁夏马鸿逵那里不回来，不听章的指挥。

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在三边地开辟根据地，建立了工委。一九四一、二年间，根据党的政策，工委负责人周仁山等在以章文轩为代表的民族上层中做统战工作。章当时对国共两党一直保持中立态度。对国民党不反对，与共产党也有交往，并和周仁山等同志结为拜把弟兄。在党的政策影响下，章文轩部下的一批下级军官如顾寿山、马良诚、马富纲等开始觉醒，积极靠拢共产党，而奇恩诚则不与我党接触，频繁与马鸿逵来往，关系日密，并于一九四四年还担任了鄂旗国民党党部书记长。

一九四六年元月，章的部下顾寿山、马良诚、马富纲等在阿日勒发动了起义。奇恩诚躲在旗衙门窥伺事态的发展。当他获悉章被处死的消息后，狂喜异常，觉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独揽鄂旗大权的时机就要到来了。因此跃跃欲试，准备走马上任。然而当他得悉起义部队由升济米图任代司令，只给他一个副司令的职位时，十分沮丧、懊恼。后来虽然勉强任职，但一直耿耿于怀。对奇恩诚这个人，我们党一直坚持争取的态度。为了使他能早日觉醒，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经马富纲等人的请求，三边地委同意他来边区参观。是年三月，在顾寿山的陪同下，奇恩诚到达了我

边区定边，受到三边地委领导的热情接待，请他参观了县城附近的兵营和兵工厂，向他讲解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并晓以民族大义。奇回来后就住在阿日勒庙司令部。

就在这年春天，奇恩诚的政敌杨森扎布企图独揽鄂旗的大权，突然带兵来到阿日勒庙，逗留了几天。在此期间，杨森扎布与顾寿山密议除掉奇恩诚，但杨在没有下手前就走了。而后顾寿山派人把奇恩诚押送给杨森扎布，让杨论处。在押送途中，奇乘人不备，逃脱直奔盟府，途中巧遇盟府派来的官员，于是偕同盟府官员来到鄂旗衙门。奇恩诚在旗衙门住的期间，杨森扎布又与孟克密谋，准备从盟府官员手中抢出奇恩诚并当即除掉。在这危急时刻，绥远省府派来了乔专员，奇恩诚才被释放。奇恩诚觉得鄂旗已无法安身，就跑到宁夏住了一个时期。后来傅作义把杨、奇二人调到归绥，要他们解除宿怨，共同对付共产党，并分别委任杨、奇为鄂旗边防司令部司令、副司令。杨、奇二人接受了傅作义的调停，暂释前仇。

奇恩诚有了国民党绥远省的支持和委任状后，气焰就嚣张起来了，返回鄂旗后马上另立旗号，积极收罗兵马，强迫吉拉的一部分士兵到乌替保护自己。顾寿山见奇恩诚回来，就派人请奇回阿日勒庙讲和，继续与自己合作。奇就召集一部分支持自己的贵族开会，商量对策。会上贵族们反对奇再去阿日勒庙，也反对与共产党来往。贵族们认为既然有了傅作义的委任，就另立旗号，各据一方。奇恩诚采取了贵族们的意见，公开走上了与党和人民为敌的道路。

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开始，奇恩诚指使部下多次到三段地解放区进行骚扰和挑衅。张志珍同志在去巴郎庙的途中，被奇恩诚的部下明更巴雅尔抓走，不久被杨森扎布杀害。奇恩诚的反革命

行为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愤慨。尽管如此，我党对奇恩诚还是进行了仁至义尽的争取和规劝，三边地委先后派出田万生等同志给其做工作。但奇恩诚仍执迷不悟，最后竟然拒绝接见共产党方面的任何人，死心踏地地与人民为敌。鉴于这种情况，三边地委决定用武力打击一下奇恩诚的气焰。

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月（农历正月十九日），奇恩诚在家大摆酒宴，招待亲族朋友。宴席从中午延续到夜深人静，最后客人走的走，醉的醉，只剩下二十多人。奇恩诚也有七八分醉意，但还大喊大叫，提醒部下注意提防八路军。天拂晓时，我军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奇恩诚的住宅并发起了进攻。枪声、喊杀声把奇从梦中惊醒。他慌忙爬起来，命令部下抵抗。我军在前沿阵地喊话敦促他投降，而奇还负隅顽抗。一阵激战之后，我军攻破院落，占领了奇恩诚的住宅。在混战中奇恩诚被打死，结束了其短暂的二十五年生命。

（金牡丹整理）



# 绥远都统马福祥

关钟麟

## 前 言

马福祥，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已成为西北边陲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出生宦门，行列第四，所以一般人都称他为马四大人。清末，庚子教案发生后，他曾追随光绪、慈禧，西幸西安，论功行赏，钦命为记名提督并尽先拔补。及至两宫回京，又受命为靖边协台。一九〇五年，调任为陕甘军某标协统，一九〇六年升任西宁总兵兼阿尔泰山护军使。那时，达赖喇嘛与陕甘制台升允发生齟齬，他挺身而出，从中调停，在和平息事之后，又授以建威将军的头衔，并调任甘宁巡防统领。

辛亥革命时期，他留恋清室，持首鼠两端的态度；嗣因陕甘将领，纷起响应，他才俯顺輿情，自动将兵权交出。

共和告成初期，窃国大盗袁世凯，曾策命甘肃藩司赵维熙署理甘肃都督。在那个时候，马福祥亦以形势所迫，对袁氏政权不得不表示拥戴。

一九一三年，马得到了北洋政府的信任，被任命为甘肃、宁夏护军使兼将军，节制阿拉善旗、鄂托克旗与乌审旗，并授以二等文虎章和陆军中将的头衔。受命之后，更进一步同袁氏勾结，曾选

送其长子马鸿逵入京作质，担任了总统的侍从武官，经过一段效忠从顺的考验，才又转返宁夏。

曹锟贿选以后，马福祥又以灵活手段，展开了猎官的传统伎俩。曾将几个月的应领协饷，馈送曹氏亲信李彦青，因而得到了陆军第五混成旅的番号，其长子马鸿逵并升任为旅长。

一九二一年，马福祥受命为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早已改制为镇守使，所遗之缺，由其侄子马鸿宾继任，马鸿逵部与一部分宁青军，亦准随同马氏，移驻归绥。从此以后，马家父子，不但统治了绥远与宁夏，而且西北回疆的军政大计，北洋政府亦多向其咨询。

以上的这些情况，是由当时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主任王文彬老先生所谈及，一并写出，聊代前言。

## 马福祥迟不履新的内因

马福祥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虽然受命为绥远都统，但在他的内心中，却有不少的顾虑，因而迟不履新，曾惹起了各方面的疑窦。那时，直奉两系，为了争夺地盘，不时暗斗，一旦兵戎再起，他所率领的马鸿逵旅或被迫东调，卷入内战漩涡；或改变番号，脱离指挥，都将会丢掉升官发财的资本，而这对他个人的利害得失关系至大。同时他又想到当年卢占魁部崛起塞外，马鸿宾等也曾奉令进剿，但处处失利，吃到很大苦头，因而对赴任与否，举棋不定，犹疑徬徨。

当北洋政府的命令公布以后，中和店财东白云峰也曾以异姓兄弟的关系，将绥远难治以及民性刁悍等情况，密函左右，对他

的荣膺新命，提出了多加思考的建议。后因北京当局电促到任，地方士绅，也曾公推荣祥先生以诗代柬，表示欢迎，他才随风转舵，由宁抵绥。兹将荣的原诗录下，作为参考。

固圉那堪说九边，阴山日暮起愁烟。摸金校尉闻匪走，扞腹将军拥妓眠。已分永遭居蔡毒，岂期更值伏波贤。从今共作来苏庆，谈虎有应慑去年。

边民翘盼恨来迟，誉著龙城已可知。威播玉门班定远，才兼露布傅修期。欲开紫塞耕云日，须趁苍生望雨时。敬代丰州诸父老，挥毫赋赠迓公诗。

## 马福祥的禁烟与善后局

马福祥到任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曾将一般豪绅巨室，纳入了人事范畴。如将目不识丁的李春秀委任为副官处长兼塞北关谘议、禁烟善后局会办与筹饷局座办等白拿干薪的美差，一时舆论大哗，竟致民意机关与都统公署，形成了对立状态。

在那个时候，他曾以筹饷为名，竟将贩运鸦片作为暴发横财的手段。下车伊始，不但允许各地乡农播种鸦片，而且甘宁各省的烟土也由于马家军的护送，大量东运，仅归绥一隅，烟土就堆积如山，交易兴隆，膏店林立。每年在鸦片收割之后，按照他所制定的单行条例，必须计成交税，并由各地的善后分局，无遗漏地尽量收购，一俟汇集成数，解送善后总局，仍由马家军护送运往京津出售；所得的价款，又将洋广杂货，转贩西北，一往一来，攫取了不少的财富。禁烟善后总分局，是一所树党营私，豢养土豪劣绅与食客机构，不少人坐领干薪，共分为五级，一级二级属于会办、帮办、座办、谘议与参议，他们所领的车马费，

多达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其他一般额外人员，即属于三级至五级，月领津贴由四十元起码，至一百五十元不等。

## 横行各地的军粮局

当年宁夏一带的马家军，原由保卫团队所组成。一般官兵，除供给服装与主食、副食外，既无饷金的规定，又无名额的限制。庞大的军费开支，多向驻防地区按照具体情况，分别歛征。在那个时候，移防绥远的宁青军，约有五六千名。马福祥为了维持现状，曾由绥远总商会会长那克让成立了绥远筹饷局，苛捐百出，戮力搜刮，以致怨声载道。

辛亥革命以后，塞外农村因土匪滋扰，已行破产；而马家父子为了加强实力，扩编军队，又在各县成立了军粮局，勿论粮秣军草，直接由军方人员向民间征收，同时也可以现款折价，横行乡镇，行政机构，不敢过问。每亩土地的征收率，原定为二升五合，嗣因经办者中饱自肥，实际上已超出了四、五升，负担奇重，甚于应纳的田赋。

绥远全区的升科粮地，由清末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直至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共有十九万五千九百一十余顷，一般农民遭受田赋与军粮的双重压榨，确由马福祥时代而开端。

## 兼并土地断送满民福利

马福祥在担任宁夏护军使时期，所练的家兵和一般军政人员，都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与骨干，如以人口计算，每六个劳动人

民，负担一个不事生产的兵丁、官吏。在那个时候，宁夏全境，可耕种的土地面积，仅有四万余顷，加以兵匪窜扰，连年荒旱，收获的食粮辄有不敷供用的现象。当他调任绥远都统以后，除将第五混成旅马鸿逵部与一部分宁青军，移驻包头、归绥一带外，又为了调剂宁夏的军用民食，曾由李春秀献计献策，将河套兰镇一带八旗官兵的垦地二千余顷，以五千多两大烟土的代价，即为马家父子所吞併。换来的烟土，一般旗丁每人仅得到三两，其余的绝大部分被李春秀等人鲸吞，从此以后，贻谷将军的捐廉垦地与满民福利，竟被李春秀串通马福祥而断送。

### 荣获意大利勋章

马福祥坐镇绥远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曾通过洋神甫弗怀永的关系，与意大利、比利时等帝国主义者有了进一步的联系。那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慈善事业的伪装下，拟以比利时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一处规模较大的医院，以行医施善欺骗群众。经副官处长李春秀斡旋，马福祥竟将绥远城西门外大教场，以五千元的代价，出卖给天主教堂。

大教场原为绥远城镇威将军检阅驻防八旗官兵的场地，面积为十顷左右，内有演武厅七间，休息室八间，围场的成材大树亦有一千余株。订约之后，舆论大哗，群起反对，地方士绅虽然也表示异议，但在帝国主义与当权者的双重压迫之下，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医院落成，起名为公教医院，因房屋形式类似兵营，谣言四起，又惹起附近居民的不安。

当公教医院兴工期间，弗怀永等曾请准罗马教皇以意国政

府的名义，赠马五星勋章一枚，并给李春秀在城隍庙街修建了大院两处，作为对这个国际牙纪的酬谢。

## 都署失火殃及居民

当年绥远都统公署，原是明清时代历任镇威将军的驻节地。马福祥自一九二一年主政以来，也曾兴工修葺，粉刷一新，内部二堂，更是油画得美轮美奂，显示出特权阶级的豪华，除摆设金石琳琅与古色古香的器皿外，还悬挂着慈禧太后、宣统皇帝以及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等书写的横批对联和工笔彩墨，同时又将他所夸耀得意的草写虎字和马氏家训八条，都装裱、悬挂起来，充分地暴露了这个封建官吏的思想与喜好。

一九二三年冬，都统署两宅，因取暖不慎，酿成火灾，卧室二堂，竟在烈火蔓延与乌烟笼罩之下，付之一炬。在那个时候新城四门，严加戒备，并勒令附近居民，自备桶担，进行抢救，可是火灭之后，马家家兵，唯恐救火的老百姓乘机盗窃，又在朔风凛冽，严寒刺骨的气候里，经过了一番剥衣检查，始得放行。

一九二四年夏，马福祥为了恢复旧观，责成归绥县署与警察厅，强征了许许多多富有建筑经验的泥木匠，按照计划，即时兴工，所用的砖瓦材料，仍由副官处长李春秀将满民领有的兵房，每间一律以现洋二十元作价，勒迫拆购，以致民怨沸腾，造成了流离失所的现象。工竣之日，马福祥也曾征诗征文，刻碑、勒石，庆祝一番，当时归绥道尹李景泉也是囿于积习，歌颂当权。兹将他所应征的七律两首，照录于后：

天欲维新故示灾，朔方从此壮图开，书焚插架钱公量，楼易筹边李相才。赋就他年传鲁殿，落成今日颂灵台。经营若问将军

意，未忍劳民况费财。

由来离火象文明，一笔焚如百度更；岂异龙光辉北斗，定占鸿烈著边城；立标钢柱助难毁，诗似银花韵自清；为告旁人休惋惜，巾箱近已贺书盈。

李道尹两首应征七律在《西北实业报》披露之后，竟在都署影壁上揭出了打油诗四首：

一入都署马宝斋，富丽堂皇莫与侪；虽说自家夸豪有，尽是民脂血购来。

一场天火付烬中，俨如重瞳焚阿宫；说来本是循环报，还有闲人惜惺惺。

天欲惩凶故示灾，因遭离火有由来；但具仁心齐喝彩，都说报应信有哉。

怎比西伯筑灵台，那是庶民如子来；今番强制又压迫，博得劳民又伤财。

登时传遍两城，成为谈笑资料。

## 越狱暴动影响了地方治安

马福祥主绥以后，一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人，由于环境的驱使，每多铤而走险，啸聚山林，不但是广大农村有所骚动，就连戒备森严的归绥，也是抢案迭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那个时候，很多的草泽英雄，被捕入狱。驻防军队，为了巩固马家统治，也曾随时出动，相机进剿，但因社会制度与政治黑暗等关系，所谓“匪患”问题，直至解放以后，才得到彻底的解决。

一九二三年春，有一名年已五旬的劫路伤人犯张三，系归绥县忽寨沟村人，麻面腮须，膂力过人，因为他走起路来特别快，

一般人都称他为飞腿张三。当他被捕入狱之后，因豪爽不拘，仗义疏财，竟在看守与难友当中，树起了很高的威信。其后由于郑典狱长年老力衰，疏于防范，他就串通了监外伙伴，在接济衣物的时候，将钢锉一类的东西，混进狱内。及至阴腊岁末，监狱人员多忙年关，张三即乘机煽动，将刑具锉断，在某日深夜，全体难友呼啸群起，夺门而出，一时秩序大乱，造成了大规模的越狱事件。那时所有的犯人，在情况紧张与抢声四起当中，有的跑向武川，有的奔往南乡，还有一小部分就躲藏在城里。

马福祥据报以后，甚为恼火，除令就近部队即时出动追剿外，并责成军法处查明原因，彻底究办。后因郑典狱长原系军法课长叶森的岳丈，郑的职务，也是由他保荐，涉及内亲，就有了不少的顾虑。最后采取一种蒙蔽手段，将一切责任都推在看守身上，郑典狱长仅以有失检点的过错而撤职了案。这一次越狱暴动后，虎口余生的犯人，仍多勾结成伙，四处抢劫，使各县农村更陷入不安状态。

## 附记

马福祥就任时期，我曾担任归绥县议会议员，关于他的施政情况，尚能略举大端，惟因事隔有年，具体时间，早已遗忘，分别写出，敬请一般耆老，予以斧正补充。

（一九六五年）



## 马福祥祸绥的一段回忆

常斌魁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间，马福祥正担任绥远都统。他的儿子马鸿逵，担任绥远某骑兵旅长，后擢升为宁夏省主席。当时正值北洋军阀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马福祥夤缘时会，奔走权门，弄得了绥远都统这一要缺。到绥之后，也照样以澄清吏治、兴利除弊标榜，实则，上行下效。曹锟贿选获得了大总统，马氏购买人心，也取得了当时绥远地方上部分土豪劣绅及在北京求学的少数败类的拥护；于是为所欲为，弊政百出擅立名堂，巧取豪夺。地方有识之士及在北京求学的大部分青年学子，睹此情况，忿愤不平，群起反对。是时绥远旅京同学，分成反马、拥马两派。反马派有：北京中国大学学生陈国英、于存灏、常斌魁、李蔚洛、尹世增，民国大学学生焦守显、李蔚淮，师范大学学生张国宝、张登魁、王庭槐，医科大学学生李蔚潭、刘铎，北京大学学生陈志仁，农业大学学生李藻，燕京大学学生阎秉乾，朝阳大学学生樊殿襄等，其余忘记了名字，共约四十余人；拥马派大部分系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学生，如郑宝桥、郝大中、聂剑、王楷、贾子凯、刘文元，还有民国大学学生李庚、李显等共约十余人。当时绥远教育厅对旅外学生的津贴是这样规定的：不论国立、私立，凡在各大学上学者，每年每人照例发给津贴一百元。这本已成为例行规定，但对这些反马派学生，有时借故留

难，不按时汇发。拥马派则不然，教育厅不但按时汇发，而且每人还秘密补助一百元，有时还给特别补助费。

当时绥远旅京同学会，创办有绥远旅京学会半月刊。这个半月刊的内容，除刊登各校同学学习心得和研究学术外，多系有关绥远地方上的一些横征暴敛、贪污腐化的劣迹。这个刊物，很受地方各团体、各有关人士的欢迎。但马福祥则视为眼中钉。旅京同人，有鉴及此，咸认为书面警告，不能使马氏稍敛其恶行，于是向当时曹锟总统府列举其罪状联名控告。詎料曹锟、马福祥，本系一丘之貉，气味相投，致使呈状屡投，迄无明令查办的下文。

当时绥远警务处处长余鼎铭，系马氏心腹爪牙，贪污暴敛特别凶，对旅京反马派的同学，恨之入骨。后来借冯玉祥北京政变，曹锟下台，张作霖入关临时主持北京政局之际，遂密电张作霖将反马派同学陈国英解绥法办。当日（记不清月日）将陈国英逮捕至北京市警察局，警察总监系冯玉祥所派的薛笃弼，当时中国大学校长是中俄外交督办王正廷兼任，冯玉祥又系中大董事，我同中大同学李蔚洛持函找薛笃弼营救，经过一昼夜多方面分头奔走，才得到王正廷、冯玉祥联名给马福祥复电，大意是：将陈国英留京、就近查惩等语。一场风险，才告平息。就此一斑，可以窥见马氏祸绥的全貌矣。

# 马福祥在绥轶事

刘映元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二十七辑《文史资料选辑》刊载了田生兰所撰“马福祥事略”，对马福祥在内蒙的许多事情，叙述得非常简略，只用四百多字做了概括的介绍。马福祥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和内蒙古发生了密切关系，并且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担任了四年多绥远特别行政区的都统，尤其是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直到解放以前，仍在他儿子马鸿逵的势力范围以内。兹将我所了解的有关马福祥的历史资料记述如下。

## 惠德成诱捕旺丹尼玛

未谈马福祥给袁世凯充当帮凶，镇压内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以前，有必要先谈一谈马福祥成为封建军阀的经过。马福祥的父亲马千令并不是和马安良同样驰名的人物。马千令是甘肃河州的一个行商小贩，赶着毛驴往来拉卜楞贩卖青稞炒面，同治年间参加马化龙领导的回民起义，在陕西靖边县的张家畔抢了一个汉族姑娘，后来生下福财、福录、福寿和福祥四个儿子。马福财因贫穷无力抚养，给了人家被折磨而死；到了马福录长大以后，马家才开始飞黄腾达。老三马福寿字诤菴，是一个平庸之人，依靠哥哥和儿子坐了一辈子官。他既比不上老二马福录，更比不上老四马福祥，因此甘肃人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三草包”。一九二〇年以前马福寿在定边县驻防时，曾和当地的好多人说：“我是你

们三边的外甥。”

马福祥因二哥马福录得中武举，从小过的是读书练武的少爷生活。光绪二十一年甘肃循化厅“撒拉回”武装起义，他和哥哥组织民团替清朝效力，很受董福祥赏识，就编在董的部下。随着董福祥到冀东驻防，此后董马两家成了世交。董福祥的孙子董继祖，以后也参加了马家的集团。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马福录得战死在东交民巷口，给马福祥赚来一个记名提督。马福祥和董福祥在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前往西安途中，极力巴结慈禧皇太后的亲信太监小德张（张祥齐），所以很快就升为西宁总兵。因为马福祥是老四，在他未担任绥远都统以前，绥远人都叫他马四大人；由于他带领的军队是从绥远西边开过来的，绥远人称他们弟兄父子叔侄的兵为“西军”。

一九一三年马福祥任宁夏镇总兵。这一年伊盟札萨克旗“班第达经师喇嘛”（班定喇嘛是住在家里念经的喇嘛）旺丹尼玛占领了后套的五原，以配合白彦公、达赖公和乌拉特三公旗的队伍向包头进攻。包头情况非常紧张，人心恐慌，官僚巨商已经把细软装上轿车，准备往归绥撤退。

这时，袁世凯叫马福祥出兵绥西，和阿拉善旗亲王塔旺布里加拉的军队，共同解决旺丹尼玛的部队，以平定后套并解包头之危。马福祥以儒将自诩，有一套政治手腕，不轻易动用武力，不象马麟弟兄一样嗜杀。马福祥进入后套，约束部下很严，极力扭转人们对西军的恶劣印象，他对旺丹尼玛决定智取而不力敌。

马福祥先派阿拉善旗的总管安久，到马迷图和旺丹尼玛接洽。安久，后套人称之为安久大人。据说是陪公主下嫁到阿拉善旗的满族随员的后代，时任旗官。光绪二十六年阿拉善亲王派安久带兵攻打三盛公洋堂时，安非但没有杀人，反而叫喇嘛念经把耶

酥像送到黄河里边，处理得非常圆滑，所以庚子“赔款”时，阿拉善旗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这次马福祥即派安久充当说客，把旺丹尼玛诳到军中。

旺丹尼玛到了黄河南岸杭锦旗的惠德成地方，受到马福祥“热烈”欢迎和招待。马为了一网打尽旺的指挥部人员，当天没有下手，而是让旺回去把参谋们带来共同开会协商。旺丹尼玛第二次到惠德成的时候，带着参谋彭棠根那、木加拉等十几个随员，还有二百多护卫骑兵。马福祥和旺见面以后，要跟旺进行互换武器的礼节，马把一枝未装子弹的手枪递给旺丹尼玛，拿上旺的装满子弹的手枪对着旺的胸脯。旺的卫队见此情形都不敢动手，便被马福祥预先埋伏下的兵收了武器。

另一种说法是旺丹尼玛带的卫队，由马福祥的副官们在外边以酒肉款待，正分散到好几个院子里吃饭的时候，端饭的勤务兵故意打架，蒙古兵放下步枪拉架，被马福祥的士兵掏出手枪缴了武器。总之，马福祥利用蒙古人老实的特点，而使旺丹尼玛堕入圈套。由于旺的被捕，“西军”顺利地通过后套进入包头。旺丹尼玛被马福祥由包头送到北京交给袁世凯，被北洋政府软禁了十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后，旺丹尼玛才恢复了自由。一九二五年，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北京回包头工作，不幸被人暗害死于包头的泰安栈，据说是札萨克旗沙王的儿子格拉僧义熙以毒药害死的。马福祥因为诱擒旺丹尼玛有功，袁世凯特升他为中将军，任宁夏护军使兼宁夏满营将军，并节制阿拉善旗和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与乌审旗。阿拉善旗的总管安久也因诱说旺丹尼玛有功，赏了个镇国公的爵位。

### 同卢占魁的军队作战

一九一三年以后，马福祥的昭武军由马福寿带领，驻防于宁

夏河东及伊盟鄂托克旗一带，并由马福寿的儿子马鸿宾练起一支新军，驻防于宁夏河西及阿拉善旗一带。

这期间，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孔庚坐镇包头，因为孔把外蒙南下的军队在西线挡住，很受袁世凯的重视，阎锡山想撤掉孔的师长，派张江杰到包头以购买军马为名，布置下张培梅的弟弟等许多特务，于一九一四年阴历五月初九发动了有名的包头兵变。孔由卫士金占魁奋力保护未遭伤害，兵变被镇压下去。金占魁原来是宁夏同心城的哥老会大龙头，他是抱着抢夺枪支的意图混入孔庚的卫队，兵变后被提升为中尉副官。金占魁回同心城探家，路过宁夏时替孔庚给马福祥送过礼物。这一年秋天卢占魁由外蒙退到固阳的同兴公，金占魁即脱离了孔庚，成为一九一六年春天卢占魁攻打宁夏的开路先锋。

绥远地方哥老会的势力很大。由于哥老会的分子非常复杂，被人们目为土匪。包头兵变之后，山西陆军在绥远曾进行过一次编遣，被编遣的士兵亦多投入哥老会里边。后套的哥老会组织起武装两三千人，由弓占元率领，于八月间占据了五原附近东皮房一带的村庄，把绥远的地方军队骑三营击退。这时北洋军队在包头驻防的是高在田的褚其祥旅，因为防备参加外蒙独立的玉禄等部，不敢离开包头，段祺瑞遂令“西军”进剿后套。弓占元部人数虽多，但系乌合之众，不堪马鸿宾的新军一击，于九月间在千里庙被“西军”打败后退到狼山背后中公旗的康布尔，马福祥即负责了包头以西的防务。冬天，弓占元配合卢占魁的其他部队向北洋军队进攻，在惠德成被马鸿宾的队伍击毙，同时死的还有哥老会的另一首领鲍文华（是否察哈尔蒙人待继续调查）。从此马家和哥老会为敌，一直到一九二五年马福祥将绥远的都统交给国民军的李鸣钟为止。

卢占魁是一九一五年阴历七月到达固阳同兴公，不久白彦公、达赖公也把骑兵带到了固阳，哥老会不仅声势强大，并且有了比较统一的领导。从一九一五年阴历十月到一九一六年夏天这一阶段，向秦陇晋绥发动了一次全面进攻。参加的人包括蒙汉回三个民族，除了卢占魁等人而外，还有陕北高士修，陇东的张九才和宁夏的金占魁等领导人物。从山西的右玉、偏关、河曲，经过陕北沿边六县，直到甘肃的环县、宁夏的灵武、金积，到处都是卢占魁的旗号。曾攻陷毕克齐、察素齐、萨拉齐、托克托、定边、盐池、环县、哈拉寨、高家堡等许多城镇。袁世凯出动的军队，除了“晋军”和“西军”，还有蔡成勋的第一师和肖官诚、李际春的“淮军”，以及土默特旗和固阳的保安队。马福祥受卢占魁压迫，曾一度放弃后套，退入包头。

马福祥的侄子马鸿宾与儿子马鸿逵，在与卢占魁作战时，几乎被蒙古骑兵活捉，其时马鸿宾在五原的白家地，马鸿逵在鄂托克旗的天池子。一九一六年元月，马福祥首先由包头东进，又被卢占魁的人赶到山西右玉县境内，其后马鸿宾由包头西进，又被卢占魁的人牵制在西山咀一带不能进套。马福祥见北洋政府援绥的军队由大同经德胜口开出，即从杀虎口到了包头。刚到达就得到马鸿宾在西山咀被围的十万火急报告。马福祥连春节都没有在包头过，就赶忙带着队伍前往救援。二月一日出发，走到公忽洞便和卢占魁的队伍打了起来，由于沿途受阻，从包头到五原四百华里整整走了十二天，才在五原与马鸿宾会师。

在西山咀被围的“西军”拼命突出，经扒子补隆向五原逃跑，行至白家地，又被白彦公的蒙古骑兵追上包围。正在形势危急之际，李际春的两个骑兵营从大余太杀过来，方把马鸿宾部队搭救出来。马福祥叔侄在五原相会以后，卢占魁的主力已进到伊

盟和陕北。宁夏河东地带和鄂托克旗乱成一片，他们便赶快回宁夏布防。由马福祥坐镇宁夏，马鸿宾防守吴忠堡，马鸿逵防守花马池，于三月间完成了各项部署。卢占魁原想从府谷过河进攻山西，没有乘虚直捣宁夏，迟至五月间才发动了对宁夏的攻势，这就给于“西军”以喘息机会。四月二十九日，马鸿逵了解到卢占魁正沿着边墙由东向西挺进，就先带着二十多个卫士骑马往灵武撤退，走在鄂托克旗的天池子，天方中午，遇上由聂家梁过来的卢占魁部的前哨，把马鸿逵一直赶到边墙口里的清水营，几乎被活捉。到了清水营，从花马池退出的步兵营据守到黄昏，又突围至鄂托克旗的草地里边，在沙漠中露宿了一夜，驻防花马池的李自正营长从后边赶来，才保护着他安全退到灵武。

进攻宁夏时，卢占魁和金占魁的意见分歧，没有协同一致动作。卢占魁计划从横城堡过河，直扑宁夏城；金占魁主张先到同心城招集哥老会众，占领附近各县围困宁夏。卢依了金的办法，让金由磁窑经灵武去取同心城，他在后边跟进。金占魁于五月四日打到吴忠堡附近的空寨子，遭受马鸿宾的炮兵伏击，不幸中弹毙命，士气受到很大挫伤。卢便放弃了进攻宁夏的打算，去占领南老山和董志原。这时卢的另一路部队由赵有禄率领，穿过榆林、绥德和延安城郊，上了洛川附近的黄龙山，这样宁夏才转危为安。马福祥从此以后即会办绥远军务，并在裁撤宁夏“满营”时，得到大炮十门（内有德国造神机炮四门）、快枪五千余枝、战马一千余匹以及“满营”的全部弹药物资，马家军队的力量越发壮大了。

### 昭黄庙击败高士修

攻入定边县城的高士修，是定边盐场堡北二楼地方的人。家庭系做买卖的商贩，养有跑运输的骆驼，并在宁夏城内的明德巷开有醋铺。高士修从小喜欢赌博，爱跟江湖上的人交往。高士修



经常往来宁夏，结识宁夏新城满族人岐鸣山。岐为宁夏哥老会的龙头，便介绍他加入了哥老会。因为私贩碱盐被花定盐局扣捕，受过、非刑拷打，释放后杀了花定盐局局长魏某全家，逃亡到关中，投到“太白山”大龙头张云川门下，张派他潜返三边吸收会众。辛亥革命时，同高登云在灵州起义，受金积团练马学仁部队的压迫，退到定边砖井堡后即同高登云分家，先归郑思诚（即郑庠，曾任吴佩孚的师长），任二营管带。郑思诚打死榆林哥老会起义的龙头杨昆山后到西安时，高士修没有跟去，同郑思诚的哥哥郑思杰一起带领地方团队。高在三边很有号召力量，江湖上都称他为“高老大”。

卢占魁从环县上来，驻防定边的陆建章部索惠东营，闻风追往安边堡，高士修到吕家水口和张九才会合，占领了定边，然后把卢占魁欢迎进城。卢在定边住了两天，得悉张兆钾的军队从安边堡前进到砖井堡，遂亲自指挥队伍前往迎击，在砖井堡打了一仗，将张兆钾赶进南老山区。当时，张兆钾还没有担任陇东镇守使，人们都叫他张帮统。

卢占魁所部多是山西、绥远、察哈尔人，在陕宁一代转战半年都有疲蔽思乡之感，因在三边东西受敌，遂决定到鄂托克旗城川教堂以北的昭黄庙一带暂为休息，以便再过黄河从后山向东挺进。高士修撤离定边的时候，将满清定边协统衙门存留的火药械弹全部带走，除了他所率领的团队，还招募起五六百哥老会的会党。卢占魁从定边开拔时，同伙有张千三、格尔济老五、段二长条、烂头老二、马占元、豁牙老五、圜圜老三、革命老三、金福、秃老爷、张九才、大耳朵活佛和高士修等首领。高士修的人马驻在东昭黄庙附近的村庄，蒙古骑兵把鄂托克旗的牧民赶跑，住了他们扔下的帐幕。

在马福祥派马福寿带领昭武军进驻花马池，攻打昭黄庙之

前，安边堡有一位原是陆建章部下的牛统领。他想把高士修收抚回去，特派“师爷”陈孟奇为代表，由地方人士穆全生领上前去谈判。当高的士兵大都睡熟，陈孟奇、穆全生正和高士修插香结盟之时，鄂托克旗的牧民突然把“西军”于半夜间引来。高士修认为是陈孟奇同穆全生有意把他稳住，好让“西军”前来偷袭。当时就把陈孟奇和穆全生杀死。“西军”由花马池开去马腾蛟率领的一营步兵和董学南率领的一营骑兵，由余鼎铭指挥，在当地牧民的带领下，很顺利地摸到了昭黄庙附近的沙梁上面。昭黄庙距安边一百四十余里，离花马池有二百多里，因而高士修疏于防范。开仗后，“西军”发出先声夺人的炮弹，把高士修从定边带去的火药引着，火光冲天，声震四野，使卢占魁的人马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来了多少敌人，都不敢前去救援。高士修带少数人突围出去，其余五百多人都被“西军”击毙。马家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很使卢占魁的人马沮丧，特别是把三边和鄂托克旗的人心慑服，再不敢小瞧“西军”了。

昭黄庙的战况相当激烈。高士修的部下，曾同“西军”奋勇地进行了肉搏。至今昭黄庙的破旧建筑物上，仍有当年遗留下的斑斑弹痕和血迹。“西军”方面亦阵亡了步兵连长马葛祥和骑兵排长马龙，马腾蛟的卫士马八三等也被打死。昭黄庙一役，使卢占魁不能在鄂托克旗驻留，陕西方面因为无力西顾，遂把三边交给“西军”防守，故马福寿自此即驻到安边，直到一九二〇年高士修带着井岳秀的“马二营”从延安上来，才又躲回甘肃地界。

### 定远营擒拿大耳六吉

大耳六吉是甘肃静宁县的汉人，姓吴名生彦字六吉，就是绥远人所谓的“大耳朵活佛”。他先在陇东环县一带行医，因医好一些人的绝症，很受群众崇拜。“辛亥革命”后，他看到天下大乱，

便以妖言惑众，自称是满清皇室的后裔，用刚时行的火柴抹在脸上，于夜间放出磷光，一些愚民认为是真龙出现，把他描绘成一个神秘人物。张九才充满封侯拜相的封建思想，便把他弄来做为傀儡以号令各方。高士修在昭黄庙全军复没以后，即依附于张九才，成为卢占魁集团里边的陇东、陕北派系的首领。大耳六吉故封高士修为御林将军。大耳六吉在行军时，乘黄缎驼轿，并有銮驾随从，普通人很难看见他的容貌。在卢占魁退到固阳同兴公时，高士修和张九才保着这个假皇帝到达了乌兰脑包。据说有些蒙旗的王公仕官，还跑来称臣进贡。高士修见到大耳六吉之后，即想打着这一招牌前去进攻宁夏。

马福祥得到高士修要去宁夏复仇的情报后，即分兵预防，仍是自己坐镇宁夏，派马福寿到河东布防，让马鸿宾在石咀山戒备，并派张福全的骑兵和马腾蛟的步兵进驻阿拉善旗定远营，在三盛公北面的大滩，还配置了“套防骑兵分统”马雄图。

三月二十一日，“西军”主动出击，马鸿宾由石咀山北上，马雄图由大滩南下，高士修部受“西军”两路压迫，被截成两半，大都过了黄河退到鄂托克旗的巴拉庙和图拉图沟一带，高士修则保着大耳六吉穿过腾格里沙漠深入到贺兰山底下。高士修趁马鸿宾出动的空隙，挑了五百多名快枪手去夺取石咀山，因马进忠的步兵回援，不仅没有攻入，反遭到“西军”的埋伏后被打散。这样，高士修只好带着大耳六吉退攻定远营。

高士修在磴口捉住阿拉善旗的总管安久，让安久回定远营说服阿拉善旗塔王投降，因“西军”张福全的骑兵开到，塔王未作任何表示。高到了定远营，在三月二十六日晚上打了一夜没有攻破，二十七日马腾蛟的步兵赶来，高士修腹背受敌，就退守到定远营附近的北寺。及至马鸿宾的大队人马到来，高和大耳六吉即陷入重围。

北寺很快被马鸿宾攻破，高和大耳六吉以及部众四散奔逃，被“西军”打死武将军以力登达赖，三将军张辅等二百余人，活捉军师于凌云、统领苏学奉、姚占魁和营长张振邦及眷属二百余口。

高士修在突围时打死西军的一个什长，始跨上一匹战马冲出，跑到河畔有一个卫士赶来，抢了农民的一匹拐腿骡子，二人泅水过河，从鄂托克旗落荒回到三边。在堆子梁洋堂窝藏了几天，后去榆林投奔了井岳秀。大耳六吉和他的弟弟吴玉庆带着少数几个人，藏于贺兰山中，餐冰咽雪，三日夜不敢出来。后因饥饿难忍，派人下山寻找食物，被马腾蛟发现，跟踪入山搜查，遂被一网打尽。

大耳六吉及军师于凌云等，均被马福祥杀于宁夏。大耳六吉死前曾留下一张供状，对他的出身经历叙述甚详。解放以前据说保存在马鸿逵为他父亲马福祥修建的“云亭纪念馆”中，解放时不知弄到哪里去了。高士修占领磴口以后，他的在宁夏城内明德巷开醋铺的弟弟，喝醉酒对人扬言“我哥再迟三天，就要进来坐宁夏将军”。事泄，亦被杀于宁夏。

由于昭黄庙和定远营两次胜仗，段祺瑞授于马福祥上将衔，马鸿宾和马鸿逵亦晋升为中将。清翰林皋兰罗经权，在所撰“马上将军纪功碑”文上，把马福祥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镇压蒙古军队和哥老会起义的经过，吹嘘成“始擒王德呢吗（按即旺丹尼玛）殒击降王；继弑大耳六吉，面缚伪皇。白彦公遁，达赖公藏；金占魁死，卢占魁殒；张九才死；弓占元创，强者死、弱者戕；前者倒，后者殒。大小七十战，俘虏百千强，蒙匪遂尽歼，套匪亦偕亡。总西夏五十七番，寒毛惕伏；擢桑公一十五将。骏烈鹰扬”。张九才并没有被马家打死，擒拿大耳六吉时，只是下落不明。当于右任由陇东到了三原以后，他和卢占魁都带

着人去陕西参加了“靖国军”。

### 分化瓦解哥老会

马福祥在宁夏和直皖两系都拉关系，所以能在一九二一年蔡成勋开往江西之后，接任绥远都统。他让侄子马鸿宾接任宁夏护军使，将昭武军和新军留给三兄马福寿看家，自己带着儿子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到归绥走马上任。“第五混成旅”是马福祥用兵餉从曹錕那里换来的一个空番号。当他升任了绥远都统，甘肃诸马都给他添凑人马以示捧场。青海办事长官马麒，河州东乡红胡子马斌、结大人及其子马国翰，北乡汤庭寿，西乡九吃大人马祝三（尕爸爸），八方的喇伟卿和兰州马永昌以及马岐山等，共给凑集了两三千人，编为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连。一团团长是马雄图，二团团长是董福祥的孙子董继祖（董升伯），骑兵团长是马步芳但没有到任，由马腾蛟代理，后来机枪连和炮兵连都改称为营。这就是马福祥来绥远接任都统时的“本钱”。

“西军”兵力单薄，只能在绥包两地执行绥靖任务。马福祥一到绥远，即利用地方的税收款项，给自己扩充队伍，收容了“毅军”、“淮军”、“绿营”以及跟随张绍曾、潘榘楹、蒋雁行和蔡成勋等历任绥远将军、都统，而流落下来的失意失业军人。他给郑泽生凑了一个“第二旅”；给河州人蒋辉若在包头成立了一个骑兵支队，以吸收地方的团队，对外号称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马福祥收罗、招募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加入了哥老会的，并且和土匪交了朋友的人。马福祥为了巩固在宁夏和绥远的统治，对哥老会，采取了利用、分化和打击并用的手段，以削弱哥老会在绥远和三边一带的力量。

一九一七年冬天，卢占魁南下关中参加“靖国军”时，哥老会

让小五杨（杨万祺）掌握。卢在四川失败以后，由云南绕道上海见了孙中山先生，到东北参加了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继续反对北洋军阀。据说马福祥担任绥远都统期间，卢曾由张家口潜返后山与小五杨见面，动员杨把人马带往东边，因杨想独树一帜不肯前往，卢哭着鼻子回了张家口。杨在这时已经掌握萨县保安队候宪章的一团队伍，营长为石老么、史海和王英。

马福祥为了对付哥老会，首先对候宪章下手。其中情况很复杂，大致过程是：马福祥延聘小五杨为蒋辉若的副支队司令，并以他同王同春结拜的关系把王英（按：王英为王同春之子）拉到自己手里，使候宪章孤立起来，把候扣捕，其后枪决于归绥。为了拆高士修的台，他又让王英派人去三边鼓动士兵哗变。

一九一七年，高士修从阿拉善旗逃出，去榆林投奔了井岳秀，并让他搞哥老会的工作，收罗、招抚卢占魁从关中返回来的零星部队（“靖国军”在关中失败以后，卢占魁随着云南唐继尧的军长叶荃到了四川，许多山西、绥远、察尔哈人不愿跟着继续南下，纷纷由关中北返），时在一九二〇年夏天。那时井岳秀还没有多少骑兵，收罗了卢占魁的人马，便派范笃生成立了一个骑兵团。一营营长是齐月山，三营营长是王保民，二营营长为高士修，让张长城担任副官（当时陕北军队没有副营长的官衔，副官就等于副营长）。陕北人就把高士修以卢占魁的旧部组成的马队，称为“马二营”。

“马二营”先由榆林开到延安驻防，因为鄂托克旗发生了神娃娃火烧堆子梁洋堂的事件，井岳秀就借此把高士修调往三边。马福寿听到高士修带着“马二营”上来，就自动让防由安边回了盐池，恐怕和高士修磨擦，从而引起跟井岳秀的冲突。范笃生骑兵团以“马二营”最为人强马壮，共有七八百人，都是好马好

枪。由范红士、崔秀生、李俊华和罗占元等四个连长率领。哥老会的队伍没有编额限制，凡是军官都有自己的“小伙子”，连军需官、军医官也带着兵，甚至于司号长、查马长亦有二三十至四五十不等的人。因此高士修的四个连，分别接收了靖边的张家畔、宁条梁、定边县城和安边堡这三边四大城镇的防务，三边人把这些绥远人统称为“包头家”。就在马福祥充任绥远都统的同时，高士修升任了陕北骑兵团的团长，张长城升了“马二营”的营长，井岳秀特派他的侄儿井延候（号清泉）担任了“马二营”的副官，“马二营”占据的四个城镇，相当富庶繁荣。高士修的势力不断壮大，加上他在三边的号召力量，给绥远和宁夏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马福祥对高士修感到芒刺在背，想方设法要瓦解高士修和分化绥远哥老会。

马福祥很了解绥远的情况。他知道后套的王同春在绥西有很大的声望，不仅是个大地主，而且也是哥老会的大龙头。所以他从会办绥远军务往来五原的时候，就和王同春结交为朋友。马福祥接任都统以后，更进一步和王同春磕头结拜为弟兄。这时王英给萨县候宪章担任第三营营长，带领地方团队。王同春怕王英往“邪路”上继续堕落，就让王英到马福祥跟前学习人情世故，请马福祥以武将家法予以约束。于是王英以干儿的身份，投到马福祥的麾下，马就把瓦解绥远哥老会的工作交付王英去办，特别是让他把流落在三边的高士修部队里的绥远人拉了出来。

王英接受了马福祥这一任务，特派他的副官任三海去执行。因为参加卢占魁部队的后套和包头一带的人，有好多是王同春的“把式匠”与老伙计，任三海和这些人都是很熟悉，同时任也是哥老会的一个小龙头。一九二二年春节后，任三海由包头往三边出发，临走时带了一班子“二人台”，唱旦的叫小四子，当时在包

头附近非常出名。任三海对外宣称，他从队伍上下来穷得没有办法，想领上一班子人到宁条梁和安边打闹洋烟。他们到了三边，受到“马二营”弟兄们的热烈欢迎，留在连里排里三天五日不让离开。唱戏的和当兵的混在一起同吃同住。二人台班子里不知任三海在搞特务工作；高士修和张长城也不注意这一班“玩艺儿”。任三海经过深入地调查，了解到“马二营”营长张长城的护兵段得胜原是王英南牛堡上的人，和王英的护兵段得功（是王英的姐姐“二老财”的女婿）是亲兄弟，并且知道张长城的军需王静山（即王麻子，又称王老人）是后套份子地保三元的人，因为没有当上“马二营”的副官，对高和张很不满意。任三海就利用这些关系和矛盾，把段得胜和王静山拉了过来，因此造成了一九二二年阴历前五月（这年是闰五月）的宁条梁、安边堡和张家畔兵变。

兵变的时候，除了打死营长张长城，副营长井延候，还打死连长范红世、李俊华和罗占元。王静山把宁条梁、安边堡和张家畔的三个连都掌握起来，去围攻驻防定边的二连连长崔秀生。攻了一天未打下定边县城，只好领上这三个连从三边开到包头对岸的大树湾，接受了马福祥的收编。马拨归蒋辉若和小五杨的骑兵支队，由王英担任营长，王静山、段得胜、何得胜（黑不浪）和傅双狮各任连长，也编为第二营，故“马二营”的称呼仍旧保留下来。

### 激起哥老会的“海水大潮”

马福祥利用王英拆了高士修的台，并且将苏雨生也收到自己的部下，让他把跟过卢占魁的许多人，都招纳到蒋辉若的骑兵支队里边。二次直奉战争时，马鸿逵任讨逆军独立骑兵副总指挥兼绥远援军司令，拿上王英和苏雨生的骑兵和郑泽生的步兵，去替直



系军阀充当炮灰。“绥军”在多伦的锥子山被奉军打败，步兵退回张家口，骑兵退回北京，被奉军截成两段。马鸿逵把打败仗的责任，完全推到绥远人的身上；同时怕王英和苏雨生把部队带回绥远捣乱，就由直军协助，在北京南苑把这支部队包围起来缴械解散，每人给发了五十块钱，打发回绥远。

哥老会的人认识到受了马福祥的利用、欺骗，都团结在小五杨的周围。小五杨装病脱离蒋辉若部，在二次直奉战争以前就躲在包头西区区董刘三红的团队里。哥老会鉴于马福祥一贯与哥老会为敌，发起了一个“海水大潮”，想把马福祥赶出绥远。“海水大潮”是哥老会中的“黑话”，是遍地起义和到处暴动的意思。

“海水大潮”来时，马福祥只能保住绥、包两座城镇，其余地方几乎全成了哥老会的世界。在二次直奉战争以前和卢占魁未死的时候，小五杨接受了奉军第“二十五旅”的番号，王英的“马二营”虽然成了马福祥的“官兵”，但是仍然接受哥老会的号令，所以当时人们给编了两句爬山调：“二十五旅马二营，后头跟的个刘三红”，以形容哥老会在绥远的声势。

马福祥走的是直系路线，张作霖为了打击马福祥，很重视绥远哥老会的社会力量。张除了通过卢占魁争取小五杨，还派直鲁豫的人来联络流落在绥远的直鲁豫的军人。清末民初跟上军队来绥远的内地人很多，绥远的“青帮”就是由这些人给散布下的种子，“青帮”的人来到绥远多参加了“红帮”。所以张作霖为此在包头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用德商“鲁昌洋行”的名义掩护活动，负责人是给李际春的两骑兵团当过军法官的杨峻岭。杨从前的勤务兵给他当小伙计，杨仍按官长的习惯随便打骂，这个勤务兵便向“西军”告发，遂将杨扣押到归绥，从“鲁昌洋行”中起出很多烟土枪枝和同哥老会来往的信件。

哥老会在绥远发起“海水大潮”之后，不仅在农村、小城镇大肆活动，还派人进归绥市内，甚至打入“西军”内部“锄香”。“西军”的官兵多信奉伊斯兰教，可是到了绥远以后，有些人变了质，也加入了哥老会。“西军”过去一直领不到足饷，弟兄们来到这个比宁夏繁华热闹的城市里边都没有钱花，有些官兵每到黑夜就在新旧城马路上刁抢上下火车的旅客。有一个马鸿逵当营长时的小号兵马虎臣，到绥远升了马腾蛟部的排长，但人们仍叫他“尕号令”，他居然也在小五杨发起“海水大潮”以后偷偷地参加了哥老会，企图发动骑兵团哗变。暴露后，马鸿逵就把他寄押到模范监狱。哥老会为了营救“鲁昌洋行”的人和马虎臣，遂在一九二三年发动了归绥的炸狱事件。

归绥的模范监狱紧靠着旧城的城隍庙，离马鸿逵的司令部只有半里多地。那时，城隍庙经常停放死人的灵柩。在炸狱以前，哥老会就打发人把枪枝藏到城隍庙的死人棺材里边。又让马虎臣的妻子在送进的馒头中夹了一把小型钢锉。一夜之间，人犯都把脚镣打开，第二天清早“放风”时夺了看守兵的武器，越墙跑进城隍庙拿上枪枝，大白天冲入马鸿逵的炮兵连，抢了八十多匹骡马和四十多枝步枪，呼啸着穿街过巷跑出归绥市外。未骑上马的犯人闯进理发馆剃掉长头发，穿军衣的换上老百姓的便衣，拿上干粮，也都跑得一千二净。

哥老会炸狱的时候，马鸿逵还睡在一个坤伶家中没有起床。当时归绥旧城秩序大乱，新城关了城门。直至枪声停息以后，马福祥才亲自带着卫队到旧城查看监狱。首先就问“马虎臣跑了没有？”下边的回答说，不但马虎臣跑了，所有重要犯人没有剩下一个。他气得跺了跺脚，骑着马回了新城的都统署。

归绥炸狱事件发生后，马虎臣从归绥跑到达拉特旗，成了哥老

会的一路诸侯。和河西哥老会的大龙头高罗，王同春的同兴东柜上的“把什匠”孙五袴子齐名。人们给伊克昭盟哥老会的首脑人物编了四句顺口流，说是“苏三、兰三、侯洞林，这是三个梁外人，高罗、孙五、马虎臣，这是三个办事人”。马虎臣扩充到四百队伍，马鸿逵的副官马录给他秘密接济子弹，被马鸿逵知道了，马录也逃到马虎臣那里。马福祥恐怕马虎臣继续往出拉引穷“西军”，派王英过河西收抚，马虎臣不敢回去，遂给王同春的同兴东“老柜”上看了家护了院。后来马虎臣把哥老会的另一个龙头大眼李打死，江湖上的人才不把他看成朋友。马虎臣由于成了哥老会的叛徒，在昭君坟附近被部下打死，众人拥戴马录当了首领。后来，马录投了苏雨生。

苏雨生在北京南苑被缴械以后，从包头过河到伊盟重振旗鼓，把“马二营”的人和自己的旧部收罗起来，跟马福祥作对。这赵有录奉井岳秀的使命，也从榆林上来组织哥老会的队伍，收集起赵半吊子、金翅雕、康存良和陈得胜等一帮子人。加上当地刘喇嘛的六七百人马，哥老会在伊盟就有了三部分队伍。马福祥没有力量过河，伊盟形成了独立局面。曹锟和吴佩孚特派裴宜丞为河西清乡司令，把苏雨生、赵有录和刘喇嘛收抚。伊盟的哥老会变成直系的“官兵”，和后套以及大青山后的倾向奉系的哥老会结成了联合阵线，共同反对马福祥在绥远的统治。

马福祥对黄河北岸，也无力控制。只能勉强防守绥包两城，大青山前和山后的交通，还得仰仗土默特旗玉禄的老一团给维持治安。这时马鸿逵和王英、达拉特旗的康王等人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马鸿逵在坤伶筱子舞家中跟青海金矿开采局局长马辅臣打牌，竟把兵饷输下，连机关枪都输了两挺。马福祥为了限制儿子继续在绥包两城胡搞，就让他担任绥西剿匪司令，由玉禄保

护到绥西一带打游击。一九二四年夏天，哥老会的队伍几乎攻破包头，驻防包头的董继祖和老一团的玉禄，都在追赶哥老会的队伍时受伤。

一九二四年，马福祥的归绥新城都统署，还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库房内的好多枪械弹药和他自己的不少贵重财物都被烧毁。火灾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丫环失火，一说是哥老会给点着的。总之马福祥到了绥远，始终被哥老会的“海水大潮”包围，把他扰得四年多时间内无一宁日。

### 收买拉拢地方绅士

马福祥不是北洋军阀的嫡系，虽然他一味巴结袁世凯，以后又依附了段祺瑞和曹锟，但根基很浅，一直没有一个坚实的靠山。只是因为他出身于回族的官僚家庭，北洋军阀想利用他来拢络西北的回族。虽然晋升为上将，并由宁夏护军使而担任了绥远都统，但是很少给他补充给养，而是让他自己筹划。所以马福祥到了绥远以后，不但不禁种鸦片，而且成立了一个“禁烟善后局”征收烟税，官卖烟土，以解决军饷、给养。绥远广大地区被哥老会占领，马福祥就把负担都加到绥包两地的商人和绥包铁路沿线农民的身上。由于他力单势薄，地方士绅看出他的弱点和窘状，多有和他作对者。

马福祥对同他捣乱的地方士绅和知识分子，大都采取安抚的策略。萨县五区大岱的刘江文和候宪章是儿女亲家，马福祥枪决了候宪章以后，刘江文连络归绥东庄脑包的李子涵要去北京告他。马福祥便给刘江文发表了一个警备司令的名义，并叫李子涵担任了副司令。萨县四区苏波罗盖镇有个鬻仲山，也因告马福祥而变成了马的朋友，曾任筹饷局局长，列为马福祥周围的“三囚四害”中的一员，并且从此发展成了一个奔走直奉两系的政客。

绥远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马福祥对于各民族中的上层人物也是尽力拢络。马福祥和王同春结拜，前边已经谈过。他来到归绥以后，和商务会会长邢克让走得非常接近，予邢以都统署参议的名义，邢克让为马还在商务会增设了回民厨房。他不敢得罪准格尔旗的那森达赖，那森达赖在哥老会“海水大潮”期间，以镇压哥老会为名，由杨家湾进驻到萨县东南准格尔旗“河套”的将军窑子等地，在那里开了“人肉杀坊”，好多汉族地主被戴上哥老会龙头的帽子，被迫倾家荡产地赎取性命。“河套”的地主代表连络萨拉齐和托克托的士绅到归绥控告那森达赖，但马福祥不予受理。达拉特旗的札萨克逊博尔巴图兼任伊盟盟长，他便以磕头拜把子的方式来羁縻此一昏庸王公，让逊博尔巴图将儿子康达多尔济送到归绥，委以少校侍从副官，逊博尔巴图为此将包头河南昭君坟附近的一大片牧场送给了马福祥。鄂托克旗毗连宁夏，马福祥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霸占了鄂托克旗的陶葫芦滩十六段好地，上八段给了马鸿宾，下八段给了马鸿逵。李培基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时，在那里成立了沃野设治局，但是由于马家阻挠，政令无法推行。到马鸿逵担任了宁夏省政府主席以后，于一九三七年秋天趁傅作义赴山西抗战的空隙，即把沃野划成了宁夏的陶乐县。

马福祥以回民的家长自居，但他到绥远以后并没有给当地回民办什么好事。他对伊斯兰教曾翻印过一些经文，赠送给各地寺院以沽民钓誉，但是对回族宗教活动，并不怎么热心。补修归绥清真大寺时，阿訇和乡老们想叫他领衔多化些布施，不料他在化缘捐启簿上，写了“布施一份”四字。阿訇、乡老看见他没有确定出多少款数，便不敢再进都统署请求。至今呼和浩特的回民中，留下“马都统的‘乜贴’——一份”的歇后语，以讽刺他对公共事业的冷淡和吝啬。

光绪时，担任绥远城将军的贻谷，提出了“拨武归田”的口号，请准二十万两银子，做为绥远城旗丁的安插费，存入交通银行生息。并且在包头的珊瑚河两岸和后套兰锁渠灌域，安置了好多田土，谓之“旗丁公产地”。民国以来绥远的历任将军和都统，都以军费困难为名，压迫归绥新城“旗民生计处”处长李纯秀，把这一笔存款三万五万地提取出来。马福祥担任绥远都统之后，与处长李纯秀狼狈为奸，将李任用为都统署的副官长，一度还担任过警务厅长，结果将交通银行存放的满族旗民的生计存款尽数提出，并把后套兰锁渠灌域的旗民“公产地”，完全变成了马氏“敦厚堂”的私产。

新城的满族士绅关钟麟，为此联络民国二年任山西省议员的萨县人胡虞卿，托克托县的律师田肇修，到北京控告马福祥，曾得到北京一些报馆在舆论方面的支持和绥远旅京学生会的声援。马福祥先是许以归、萨、托三县县长，后来又通过京师警察厅把胡虞卿和田肇修扣走，关钟麟跑到热河躲避起来。胡和田被解回归绥，马福祥把他们二人派到“禁烟善后局”做了安置。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马福祥于一九二一年春天接了蔡成勋的都统，到一九二五年夏天把都统交给李鸣钟，统治绥远达四年多时间。以后马福祥由跟随冯玉祥，而最后投靠了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夏天在京汉路武胜关鸡鸣山避暑时，由于马鸿逵的同父异母弟马鸿炳，侮辱了同去避暑的外国妇女，马福祥在又惊又气之下得了重病，去北京医治的路上死于火车里边。

（一九六三年四月）

## 四十一军进攻宁夏的经过

刘映元

一九三三年夏天，蒋介石解决了冯玉祥在张家口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以后，怕孙殿英的四十一军留在北平附近跟他继续捣乱，所以任命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命孙率领军队由平绥路往西北开拔。这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一条毒计，孙殿英如果前去接任，必定和马家的“西军”冲突；如留在后套不走，也必将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发生磨擦。无论孙去与否，蒋介石都可以利用旁人的军队把这支人数在四五万以上，并且有韩麟符这样“危险”人物参加进去的部队消灭。由于阎锡山老奸巨滑，运用了好多政治手腕，象送鬼一样把四十一军打发出后套。随后即在一九三四年春天，爆发了孙殿英进攻宁夏的战争。阎锡山不仅避免了晋绥军和四十一军的磨擦，并且在孙、马“鹬蚌相争”的情况下，坐收了渔人之利。

四十一军由孙殿英担任军长，于世铭（鼎卿）担任副军长。孙部原先只有一个四十师（孙兼师长），下属丁綽庭和刘月亭两个步兵旅，高霞轩的一个骑兵团以及一营炮兵。一九三三年孙殿英在古北口一带抗日，接收了从热河退下来的“奉军”汤玉麟的许多骑兵与大炮；到了包头更大肆扩充队伍，派萨拉齐人崔仲甫到东胜柴登壕收编了杨猴小；到了临河亦不断收编土匪，把王英的旧部韩祥符和刘致祥也编为骑兵团。并且由韩麟符担任军部的

政治处处长，此外华北各地不少失业青年也加入他的部队里。所以在进攻宁夏以前，扩编成一个完整的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把于世铭调为骑兵军长，任命谭某为副军长。步兵军的三个师为丁緯庭的一一七师，刘月亭的一一八师和卢丰年的一一九师。骑兵军除了高霞轩的一个旅，李纯华的一个旅，汤玉麟旧部的一个旅以外，主要是杨猴小（杨耀峯）的骑四师。孙殿英打宁夏时，利用杨猴小为开路先锋，特别给杨编为师长，派南荇忱为参谋长，并让杨兼骑兵挺进司令。此外孙部还有一团炮兵，人数总共将近五万，对外号称“十万之众”。

一九三三年秋天以后，四十一军集结在后套的临河县境。孙本人经常驻临河县城，韩麟符驻陕坝镇，杨猴小的骑兵驻扎在蛮会镇以北的狼山脚下，步兵散布在临河陕坝到三盛公教堂之间的公路两侧。

当孙殿英的队伍由北平附近西开以前，阎锡山就把王靖国的十九军放到五原和百川堡一带。孙部从包头出发时，绥远方面以运输辎重的车辆困难为理由，让四十一军一团一团地进入后套，因此拉了一条长线，无法把后套控制以后再去进攻宁夏。及至冬天集结在临河一带，已经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当时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和赵承绶的骑一军，也跟在四十一军的后边进入后套。

孙殿英看不起马鸿逵的“西军”，认为吹一口气就可以把宁夏夺过来。他给部下讲话时，说是有四项胜利把握：第一是“闽变发生”。蒋介石既要对付江西的红军，又要注意福建的十九路军，北方的军阀可能趁机再发动反蒋，“西军”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援。第二是马鸿逵于一九二二年接了宁夏主席，一九三三年春天才由河南信阳回到宁夏，因为争夺主席和马鸿宾不和，在宁夏的统治地位很不巩固，并且马鸿逵内部也有矛盾。第三是青海的



军队因道路遥远，不会前来保卫宁夏。第四是马鸿逵的士兵多半是直鲁豫三省人，不肯替“西军”卖命。孙派代表到宁夏见马鸿逵时也是这种说法，马鸿逵在四十一军出动以前，曾针对着孙殿英的错误估计，以把兄弟的亲热口吻给孙殿英去了一封信，劝他悬崖勒马，勿要被人利用。

四十一军多年来是一支流动的军队，始终没有找到一块可割据的地盘。这次如果攻破宁夏再占领青海，孙可以在西北为王，部下也能跟着享受荣华富贵。所有中下级军官求战之心很切，对部下约束亦颇为严格。为了不住民房，曾用后套的芨芨草搭成窝铺驻扎。阎锡山除供应粮秣给养和一部分弹药外，还给每一个士兵发了一件皮大衣，鼓励孙殿英去抢宁夏，所以孙军的士气颇为旺盛。韩祥符和刘致祥的兵，在陕坝附近抢掠，谭副军长在召集他们讲话时，暗派刘月亭的步兵将他们包围解决，枪马都拨归了高霞轩。特别是陕坝标语满街，很有必胜的乐观气氛。

宁夏地区水网纵横，孙殿英恐怕马鸿逵利用河渠“水战”进行抵抗，所以迟至过了一九三四年元旦，才向宁夏发动进攻。孙殿英本人和卢丰年的一一九师留在临河，让刘月亭和于世铭指挥队伍前进。去年我在银川看到孙殿英于一九三四年元月十日午后六时发布的作战命令，现抄录如下：

（一）颢孙子瑜旅长率所属两团，十一日晚出发，王遂庆团星夜急进。限十二日上午六时占领磴口。侯丁师到达，直驱石嘴山。

（二）杨耀峰师长为骑兵挺进司令，高霞轩旅归杨指挥。十日在东塘集中（补隆淖南十五里），十一日下午四时出发（沿河），占领石嘴子奖洋五千元。颢孙旅刘杨师占领平罗后，即归于鼎卿司令指挥。骑兵占领不了石嘴子，渡河再渡河竭力扰乱，但占领石嘴子，再奖手枪二十枝。

(三)于司令率石赵孟李等部，于十二日早由渡口堂出发，经沃野附近渡河，以平宁间李岗堡为目的地，断其归路。

(四)丁师长綽庭于十一日出发，当日夏旅到三盛公，师部及杨旅到补隆淖，十二日夏旅到达磴口后，随颢孙旅前进。

(五)刘月亭师率炮兵团，十一日出发，在丁师后跟进，所有该部陆续跟进。本军所有部队过三盛公后统归该师长指挥，前方一切交该师长负责。他若有错，我就杀他；你们不服从他，我就杀你们。

以上便是四十一军进攻宁夏的行军序列和战斗部署。我们从孙殿英这一手令里边可以看出他们很倚重杨猴小这一部分绥远土匪，证明他对宁夏的情况非常生疏。另外他既要叫于世铭指挥，又要让刘月亭负责前方，结果谁也指挥不了谁，以致不能协同动作，互相推诿，无法一鼓作气将宁夏城占领。马鸿逵对孙殿英的进攻，早就有了各种准备。蒋介石在十三日，才从南昌拍来电报让马进行防堵。说四十一军有韩麟符参加，受共产党利用，要到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同日蒋的兰州行营主任朱绍良也发来电报，委派马鸿逵为左翼军总指挥，邓宝珊为右翼军总指挥，马鸿宾为右翼军前敌总指挥，马步芳为总预备队总指挥。这时青海的军队也可开始出动，以骑兵向宁夏增援。

杨猴小的骑兵纵队，进展非常快速。从磴口、石嘴山、平罗、姚福堡、李岗堡，一直冲到宁夏城外的八里桥。沿途均受到“西军”的抵抗，杨本人在姚福堡几乎被马鸿逵的炮兵打死。杨猴小的骑兵十一日从东唐出发，十七日那天就占领了李岗堡。可是四十一军的步兵的行动特别迟缓，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到了平罗迤南，二十七日到了谢岗堡，二十八日才到达了宁夏城郊。刘月亭的一一八师不率先攻城，而让一一七师丁綽庭的部队去攻。这

样彼此观望起来。从元月下旬到三月中旬，与“西军”胶着在城下，达五十多天之久。这一期间杨猴小的骑兵曾占领了宁朔县地区和李俊、鬲靖、杨显、靖益等地，把宁夏外围的“西军”许多据点摧毁，并前进到宁夏西南一百多里的地方，将甘肃到宁夏的大路切断，阻止了马步芳的增援骑兵。但是因步兵配合不上，也无补于整个战局。攻城旷日持久，四十一军的士气便衰落下来，守城的马鸿逵部队信心却大大增强。

孙殿英于二月二十三日把刘月亭撤掉，亲自带着卢丰年的一一九师前来攻城，图作孤注一掷。当他一离开后套，“晋绥军”就跟着到了三盛公南面的上江布防。这时正是春分前后，黄河已经开始“流凌”，马步芳的骑兵沿着贺兰山麓和杨猴小的骑兵展开激战。宁夏省城久围未下，往后套退却的归路，也被傅作义和王靖国的军队卡住。孙殿英这时被装在口袋里边，情绪非常急躁，怪怨前方的将领不服从刘月亭的指挥，随便斥骂于世铭和丁綽庭。每夜发动攻城，士兵多被执法队打死。而官兵们更不愿给牺牲卖命。守城的“西军”士气更加旺盛，许多高级将领也都上了城墙。马鸿逵的保安处长韩进禄就是在城上督战时阵亡的。孙殿英的云梯和坑道都被“西军”破坏。于世铭的骑兵旅长李纯华因为没有挡住马步芳的骑兵，使青海的援军大包抄过来，他怕回去被孙殿英斩首号令，于三月十三日投降了西军。五天以后丁綽庭也归附了“西军”。十九日蒋介石派来四架飞机助战，入晚孙殿英又挑选八百奋勇队攻城。因为军心动摇，结果仍被“西军”击退。孙殿英看见局势已经无法挽救，遂下令往北转进。他先坐上汽车到了上江，想叫“晋绥军”给让开退路。王靖国奉了阎锡山的命令，便把他软禁起来送往包

头。

四十一军退却时，由杨猴小的骑四师在后边掩护。青海的骑兵追来，冲入杨猴小埋伏的包围圈，被解决了一个团，步兵才得以从容撤退下来。除了丁綽庭和李纯华旅，其余都由刘月亭和于世铭带到黄渠桥一带，检点人数，尚有三万余人。刘月亭在黄渠桥召开会议时，杨猴小曾提出由石嘴山过河，经鄂托克前旗前往陕北、陇东，如果不能在三边和南老山一带独立，干脆去投红军的建议。可惜刘月亭等没有远大眼光，想把这一部分人送给“晋绥军”归附阎锡山，未采纳杨的建议。其实，当时三边和陇东非常空虚，只有邓宝珊的十一旅，榆林的八十六师又不能完全开出，如出兵陕北是很容易通过的。这时韩麟符已离开孙殿英，故四十一军再没有什么能够出谋划策的人了。

三月二十九日四十一军完全退出石嘴山，把郑家油房军械库的弹药，都扔给“西军”。从石嘴山到上江的腾格里沙漠中，沿途到处是士兵们遗弃的枪枝。杨猴小死也不投降“晋绥军”，领着于世铭的李团（士兵多系热河的胡匪出身），冲破“晋绥军”在上江的防线，由大生壕过了乌拉河进入后套，经三道桥，上蛮会，小召子滩，南牛渠和乌兰脑包窜入后山。四十一军的步兵失掉杨猴小的骑兵掩护以后，听见马步芳的骑兵追来，大都没有携带干粮就离开石嘴山，忍着饥寒通过了腾格里沙漠。好多下级军官走到上江，摘下手枪向“晋绥军”换饼子充饥。“晋绥军”把四十一军的青壮年士兵，收容下来插编到连队里边，老弱残兵都发给护照遣散，让他们自己设法回家。这些打了败仗的兵，把皮大衣脱掉，三文不值二文地卖给后套的老乡充当盘费。所以至今后套还留下一句“四十一军卖皮袄

——没有办法”的歇后语。可以想见孙殿英攻打宁夏失败的惨象。

一九六三年四月

## 四十一军进军青海途中 在秦川被困覆灭经过

张 型

### 孙殿英和四十一军

孙殿英是河南省永城县人，本名孙奎元，字殿英，自称“孙老板”。因为他小时生过天花，落了一脸麻子，所以又得了个“孙大麻子”的绰号。他是拉杆起家的土匪头子。青年时候，人们就叫他“白花”，从小练就了一套赌博的绝招：如掷骰子，叫一就是一，喊六就是六；又如推牌九，只要把三十二张牌，反正两面看看，想吃那一门，就能吃那一门。这是因为他掷骰子有真功夫，认赌具有强烈的记忆力所致。诸如掏宝，打麻将，耍纸叶牌等等，样样精通，一赌便赢。不务正业的青年们，见他有钱，就跟着他跑，越混越多，进而为匪，由小股逐渐发展成大股。初在豫西一带活动，继而流窜到安徽、山东等地。先是投靠了张宗昌，在直鲁联军中爬上了师长的宝座；北伐期间，直鲁联军被打败之后，他的部队未受损失，乘机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扩大了编制，更为野心勃勃，后来又投靠了蒋介石。由于他善于逢迎，会拉关系，蒋介石把他看成是能攻善战的将才，且因他的部下官兵，大多数是直鲁豫人，秉性强悍，战斗力强，即发表孙殿英为国民革命

军第四十一军军长。

## 轰动全国的东陵盗宝案

一九二八年夏天，孙殿英的四十一军，驻扎在河北省遵化、蓟县一带。他的司令部驻在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皇室的东陵只一山之隔，孙殿英对东陵早有所闻。他从皇陵雄伟的建筑，联想到殉葬的奇珍异宝一定很多，认为这是盗宝的千载难逢而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好机会，遂召集该部营长以上的亲信，密谋策划了盗墓之事。对内宣布进行军事演习，并在东陵四周遍布岗哨，严禁官兵出入。对外则到处张贴布告，声称进行军事演习，严禁军民在防区内活动，违者论处，以此封锁消息。孙殿英派该军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兵两旅，进驻东陵园内，进行盗墓的准备工作。孙、谭两人直接指挥工兵部队，挖掘慈禧（西太后）陵；另一部由旅长韩大保指挥工兵部队，挖掘乾隆陵。他们用炸药把地宫炸开，将两陵殉葬的奇珍异宝盗窃一空。据清室护陵人员说：除私人下了腰包的不计外，仅该部就用了四套大马车二十多辆，满载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逃离东陵。此事很快泄露，不几天，平津两地就闹得满城风雨了。特别是新闻界大为哗然，其中以《小实报》报道情况最为详尽。所以，孙殿英的东陵大盗案，很快就轰动了全国。由于护陵大臣的反映，清逊帝溥仪（宣统），通电呼吁蒋、阎严惩盗陵首犯孙殿英。蒋介石也不得不下令追查。这一下孙殿英慌了手脚，连忙派人四出活动。首先给特务头子戴笠送了一串乾隆皇帝的朝珠。并通过戴笠给蒋介石送了一柄乾隆皇帝的宝剑（九龙），把慈禧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宝石、翡翠送给了宋子文，另外，还给孔祥熙夫妇送

了许多宝物，于是，这场轰动中外的东陵盗宝案，就不了了之了。

## 背蒋倒向阎冯集团

孙殿英在东陵案件之后，逐渐疏远了蒋介石，倒向阎（锡山）冯（玉祥）集团。阎冯反蒋战争开始时，阎、冯实力略大于蒋，在津浦、胶济、陇海各线的进攻，节节胜利，大有锐不可挡之势。特别是津浦线的晋军攻下曲阜之后，南京岌岌可危，蒋介石有朝不保夕之势。但在蒋的策动之下，阎冯军将领纷纷阵前倒戈，投降了蒋介石。进入雨季之后，阴雨连绵，阎冯部队更失去进攻能力，于是两军形成胶着状态。东北军入关后，帮助了蒋介石，因此，战局急转直下，阎冯通电下野，所有部队，均归张学良改编。当时孙殿英的四十一军退到上党（晋东南），名义上也接受了东北军的改编，部队番号仍为四十一军，但实际助人员达七万之众。曾有随军的“兵工厂”生产军火，还设有“制药厂”，专制海洛英（料面）和药丸（金丹），并滥发纸币，以之购买粮草。他在上党地区整训期间，公开出售军火、毒品，致使上党地区人民受害非浅。“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阎锡山已返山西，蒋介石在乱中不得不发表阎为太原绥靖主任。阎就职不久，看到晋南和晋东南客军云集，粮草供应浩繁，政令难以推行，于是，就开展运动客军出境的活动。其他部队陆续离境，唯孙殿英仍按兵不动，继续大肆制卖毒品，扩充军队。阎锡山为此特派徐永昌（山西省主席）前往南京活动，通过宋氏兄妹和孔祥熙夫妇的帮助，迫使孙殿英离晋他去。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发表孙殿英为柴达木盆地的屯垦督办，



并发给开拔费200万元，限期开拔，同时电令阎锡山妥善安排四十一军离晋北上开拔青海的一切准备工作，如接济粮草和开拔费用等。这是蒋阎共谋，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

## 奉命离晋北上

当孙殿英接到蒋介石令他开发柴达木盆地资源的电报之后，兴奋异常，认为今后有了地盘，大有用武之地，心情愉快，行动迅速，尤其是部队在行军途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称赞。因此四十一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顺利地进入绥远境内。傅作义早已受到蒋阎的暗示，沿途粮草预备齐全，并对孙军过境举行了热烈的迎送活动。当时孙殿英下榻在绥远省平市官钱局，（绥远省银行的前身）备受优待。傅作义并在绥远省饭店设宴，为该军高级军官洗尘，赠给全体军官每人皮大衣一件，士兵每人皮耳扇和皮手套各一对。孙离开归绥时，对傅作义表示感谢外，并问傅该军能否顺利西进，傅回答说没有问题。此时孙殿英似有疑虑，最后告别时，还再次对傅说，如有风吹草动，务请事先告诉，必要时我可以下野，愿把军队交给老兄。四十一军离开绥远省境之后，绥西阎锡山部队，立即调整了驻地，布置了防务，这是防范该军后撤的具体部署。

## 被困秦川全军覆灭

四十一军先头部队进至宁夏省垣时，遭到马鸿逵十五路军的阻挠，挡住去路，不让前进。尽管孙殿英多次派人联系，马鸿逵一概置之不理。以致双方发生冲突，互不相让，战斗持续数周

之后，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前来增援，不久，盘踞在甘青两地的二马（马步芳、马步青）亦来增援，实力更加雄厚。再加上马家部队，在地形熟悉和粮草弹药充实的有利条件下，以优势的兵力，把四十一军打得落花流水。孙内部又发生了兵变，该军骑兵师长丁振铎（回族）率部阵前倒戈，投降了马鸿逵。全军被迫撤退到石嘴山以北地区，少粮缺草，势难久留，战败整补，更无法进行。后路又被晋绥军卡住，在这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而当地更无粮草可买的情况下，急得孙殿英只是团团转。这时蒋介石命令孙、马两军，立即停止战斗，四十一军各部，除宋世铭师、刘月亭旅，保持原建制立即离宁夏开往江西，参加“剿共”（此时蒋介石正发动三次大围剿）外，其余均归傅作义收编，官兵愿在者继续留用，愿走者发给遣散费。孙殿英接到这份电报后，只好唯命是从，解甲归了田。四十一军的官兵留落在后套的为数不少，大都就地落户另谋生路了。后套有句顺口溜：“四十一军卖皮袄——没有办法”。

# 阎锡山、马鸿逵解决孙殿英

## 四十一军的经过

王 福 田

孙殿英字魁元，绰号孙麻子，原籍河南省人，性情豪爽，嗜好赌博，在旧军阀中一度颇享盛名。虽然蒋介石委以四十一军军长之职，但对孙时感尾大不掉，不予信任。一九三二年日寇进攻赤峰时，孙殿英曾率部抵抗。孙殿英不听调度，随意扩军和违命抗击日寇的行动，使推行“不抵抗主义”和排除异己政策的蒋介石对之甚为不满。

孙殿英不论在任何地区，都随时扩充兵员、武器，以便壮大自己的力量，企图争夺地盘。他还在河北挖掘清室陵墓，盗取古宝珍品，大发其财。

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有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军。

一九三三年七月，孙殿英的四十一军由山西省开到绥远包头，八月十五日由包头整装出发，经安北大余太、乌布浪口，进入河套的五原、临河县，直达黄羊木头、头道桥一带驻扎，待机出发。

孙殿英屯垦青海的消息，早已传遍西北各地。由山西进入绥远包头途径后套大平原时，各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五原各界数千人举行欢迎大会时，笔者在私立河套中学读书，也参加了

这次大会，四十一军，军官教导团派出二十多个代表在五原戏院出席大会讲话，宣传日寇侵华的罪行，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团结抗日抵御外侮，誓雪国耻收复失地，慷慨激昂，言词动人，到会群众颇受感动。

孙殿英经绥包进入后套时，沿途网罗人马，扩充势力。如五原地方保安队队长史某和关仁德、刘致祥等，都连枪带马集体投入孙部；绥远地区最大的股匪头子杨猴小二千余人亦被孙殿英网罗收编，至于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的散兵游勇更是络绎不绝。这些沿途招收的人马和孙原有的部队合在一起号称十万之众。

当孙殿英的部队进入河套时，沿途重要地点都设立了粮台，如安北大余太、乌布浪口、五原县城、郭家地、天吉太桥、临河县城、黄羊木头等地，均集中大量的粮草，并设有专人支应过往军队。开始军风纪亦较好。军队不住民房，都是自备帐篷，买卖公平，走到那里即张贴抗日标语。他们的口号是：“四十一军不抓车，不抓夫，不牵牲畜”，当时给河套人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蒋介石命令孙殿英到青海去屯垦，是一个阴谋。他是以屯垦青海的名义来解决孙殿英的部队。因此他在调令孙殿英屯垦青海的时候，便命令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全力阻止孙殿英过境，并派他的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在宁夏中卫坐镇监督；同时又命令阎锡山的陆军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尾随其后，阻止退却，前后夹击，企图一举消灭孙殿英的四十一军。

当时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各省的军阀，都是各霸一方的土皇帝，口头上服从蒋介石，实际上都是心怀异志，各行其是。特别是大西北的诸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仲英等，蒋介石更是鞭长莫及、统驭不了。所以孙殿

英到青海去屯垦，西北诸马必然坚决反对，绝不让他西北一带插足染指。这样，马鸿逵阻之于前，阎锡山截之于后，孙殿英必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蒋介石则可利用这些地方军阀自相残杀，静观虎斗，排除异己，坐收渔人之利。

一九三四年元月，孙殿英的四十一军从临河黄羊木头出发，官佐每人发饷三元，士兵每人发饷二元，声言打进宁夏后加发双饷。当部队进攻宁夏省垣时，孙殿英对全军官兵作了动员讲话，宣布打开宁夏后，任命一一八师师长刘月亭为宁夏省主席；一一七师旅长杨干卿（孙殿英在河南时的心腹高干）为宁夏警备司令。

一九三四年春节拂晓，孙殿英的四十一军与宁夏马鸿逵的防守部队开始交火。马鸿逵的军队全部开出城外抵御，城内仅有一个军官教导团防守。孙殿英的一一八师师长刘月亭任全军攻城总指挥，双方在宁夏省垣外围激战甚烈。马鸿逵一面全力防守，顽强抵抗；一面急电青海马步芳、马安青等前来支援解围。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孙殿英的攻城先头部队，曾有一个排突破城墙缺口，冲进城内；炮兵团以排炮发射的威力，猛轰宁夏省垣城墙。省城上空硝烟弥漫，不见天日，马鸿逵惶恐万状，意欲突围逃跑，经马鸿宾一再阻止，才留了下来。当攻城最紧张的阶段，纷传青海省马步芳等援军到达，并将孙殿英的炮兵团包围。此时，孙殿英的一一七师旅长杨干卿（河南籍回民）率部叛变投降马鸿逵，因而使孙部攻城士气大为顿挫。且因围城日久（围城时间两个多月），马鸿逵以坚壁清野的战略方针，将省垣外围的水井、房屋、粮食，牲畜等全部填埋拆运，使孙殿英的攻城部队在给养上遭到严重的困难。全军官兵在给养中断的情况下，宰杀战马骡马充饥，战斗力大大地减弱，宁夏省垣终未攻破。四十一军向绥西撤退时，军官士兵作鸟

兽散，轻重武器辎重弹药等，除一少部遗失在宁夏境内外，其余大部被抄后路的阎锡山部队缴获，阎锡山的部队在河套临河县和五原县分别设立了收容所，对愿在阎锡山部队当兵的马上留用安插，不愿当兵的听其自便。这样一来，阎锡山不但轻而易举地得了大量的武器军火装备，而且给自己的部队扩充了兵员，一箭双雕，坐享其成。

四十一军的官兵在退却的时候，虽然没有大量的刁抢老百姓，但已溃不成军，抓车、抓牲畜的事不断发生。所以后套的老百姓在他们两个月前张贴的“四十一军不抓车”标语上，填上一个“火”字，即“四十一军不抓火车”，“四十一军不抓夫”填上一个“大”字，即“四十一军不抓大夫”，“四十一军不牵牲畜”，填上一个“老”字，即“四十一军不牵老牲畜”。事实说明他们所喊的口号和张贴的标语，只不过为了欺骗群众而已。

一一七师旅长杨干卿率部投降马鸿逵后，被马编为两个警备大队，即宁夏第一警备大队和第二警备大队，当时均驻扎在宁夏省城内。

四十一军官兵退却的时候，每人除了仅有的一件皮大衣而外，什么东西也不准携带，除极少数的官佐带有小武器（手枪和八音枪）因落荒行走未被阎军缴获没收外，都因饥饿过度在河套地区和群众换了吃的东西。当时两个烙饼就可换一支手枪，至于没有带小武器的千千万万官兵，都因饥饿多日无力行走，忍痛将仅有的一件皮大衣脱下来换了吃的东西，当时一个烙饼即可换一件皮大衣。至今河套人民还留传着这样一句歌后语：“四十一军卖皮袄——没有办法”。

轰动一时的孙、马争夺宁夏之战结果是：孙殿英一败涂地，蒋介石实现了排除异己的阴谋；阎锡山不费吹灰之力落了个“渔

人得利”，马鸿逵稳住了根基，成了“宁夏王”。这实在是大小军阀们在国难当头不抗日，而互相争夺权力，祸国殃民的一场闹剧。

## 马鸿逵在宁夏统治时期的见闻

杨毓瑞

自一九三九年起至一九四九年止，在这十年当中我对马鸿逵的政治、军事、经济和他的私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有一些了解，现就记忆所及叙说几段事情，以供读者参考。

### 马的妻室

先从他的私生活方面说起。大家知道马鸿逵多妻，究竟有多少？他共有妻子六房。为什么只说妻不说妾呢？因为按回教教规妻妾不分，不论任何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的话，可以多娶几个。所以，马鸿逵一直娶到六个。他的大太太生了三个儿子：长子马敦厚，任骑兵旅长；次子马敦静，任军长；三子早殇，仅留一孙尚幼。马的子孙繁衍，五世同堂。这位大太太的功劳最大，其他五房均无所出。可是，这位大太太不幸于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因病亡故。出殡的时候，省府委员、参议、参事，各厅、处长，均身穿孝袍，头戴孝帽，国民党中央机关以及驻宁外省机关首长们，去吊丧均给五尺长的一根孝带。马因丧妻，号啕大哭，及灵车到了坟地，马仍是哭声不绝。当时有人说：“马主席哭得这样悲痛，真是如丧考妣。”及埋葬之后，马每天早上坐上卧车，总要到大太太墓旁转一遭，以示恋恋不忘之意。如此举动者，约有两月之久。



此外还有五个太太，其中，最得宠者为四太太刘慕侠。刘生得窈窕，精明伶俐，为他房所不及。对马的日常生活，刘慕侠已掌握规律，并且照顾得很周到。刘慕侠穿的吃的比其他房都优异，山珍海味当然是应有尽有。就是水果方面，全国的名产她的房中差不多都有。刘慕侠住的一处洋式小高楼，玲珑精致，非常美观。她的丫头最多，出入簇拥，俨若帝王的后妃一般。马最好看秦腔，他就培养了一班戏剧学生，名曰“觉民学社”，把西安“易俗社”的演员席子才等请来，担任戏剧编导。排演出来的戏，大半都是“易俗社”的剧本。马每晚必到“觉民学社”观戏，在马未到剧院前不能开戏。俟马到了剧院，舞台上锣鼓才响，戏才开演了。马身后跟的护兵马弁，荷枪实弹，雄赳赳地围绕在马的周围。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令人目之生畏。马体胖独坐着一个大圈椅，陪衬看戏的就是各厅处长了。在这时候，刘慕侠太太乘的马车飘飘然亦就来了。跟随着四个丫头，都是如花似玉的。环侍在刘慕侠的左右。同时揭开手提包，取出鲜果之类，给马的座位席上放四碟，自己面前亦摆四碟，经常摆这样的排场，已是司空见惯了。刘慕侠日常穿戴亦很阔气。戴的一对耳坠是钻石镶的，在晚上观剧的时候，头一微动，宝光四射，五色光芒在空中闪烁。刚来到银川市的人目之甚为惊奇。刘慕侠在马府中是首屈一指的阔太太了。

### 马太夫人祝寿

在一九四一年三月，马给他的老太太祝寿。把西安“易俗社”剧团请来演出寿诞期的摆堂戏。在诞期中，刘慕侠为学老莱子娱亲，拌演了一出“戏风”（刘慕侠幼时在京剧中是个名角，技艺精湛，博得观众的喝采。接着丫头们也拌演了“柜中缘”、“三回

头”，演技亦很娴熟。观众们都极口称赞。因为马好听戏，其妻子及丫头们都能演剧；可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 马府举行婚礼

一九四一年的五月，马给他的长孙和他的侄子同时举行婚礼，大摆筵宴。国民党中央各部、院长，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省主席都送有喜幛祝贺。我在事前听说，马家不要单幅喜幛，果然临期我们去贺喜的时候，一看都是红缎的双幅大幛。马府一连三宅大院，我站在“将军第”门口往后一瞧，陈设俨如皇宫一般。一幅幅喜幛，都以绳索横贯起来，东西南北和中间挨着排列。特别是两边的走廊和正中的厅堂，横挂的喜幛都带丝穗走水，风吹摆动，耀眼夺目。当时估计，双幅喜幛足有一千五百余幅。其它如高大的银盾和古磁瓶、玉如镜等贵重物品，不计其数。而在日寇侵略我国、锦绣江山几完大半，国难当头，民生极苦的时候，马身为西北军事大员，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不但不为国为民忧，而是极尽人间之乐事；不但不抗日，反而拥兵自重，与人民为敌。以致众议沸腾，舆论诋诽。以人民之膏血供自己之私欲，凡有良心者岂忍出此。

### 封锁边界

宁夏的东部，与陕北的安边、定边、靖边即三边地带毗连，接近边区。马不但对三边的货物严禁出入，就是由三边来往的行人亦稽查甚严。有一次，宁夏天成西商号靠近三边的分号派了几位夥友，来宁夏总号办事，为马的密探侦知。第二天拂晓，警察宪兵即将天成西包围，大肆搜索，当时搜出该号由三边分号派来宁夏办事的夥友五人，即诬称是八路军的密探，当

场捆绑起来，押送军法处审讯，结果毫无证据。军法处不但不放人，竟要以军法从事。该号闻讯后，即求商会会长张子贞，商联合会会长乔秀泉向马保人，同时宁夏八大商号亦递保状，均无效果。越数日，马下令将此五人押送郊区枪决。我那天早晨看到天成西的夥友数人，骑着自行车并带着一大罐酒和黄表干草之类，急急忙忙往南门外驰去。我问其故，该夥友说：“我们分号来的五人被扣捕后，马主席今天要把他们枪决。我们是去装殓收尸的。我当时对这几个人无辜受戮，实抱不平，只好长叹而已。岂料人不死总有救星。当马鸿逵站在讲台上，宣布这五人罪状的时候，忽然，马的伯父马福寿（人称草包司令）也登上了讲台说：“少云啊，你对这五人的处决，还是从缓一下吧，俟调查确实后再行处理……。”马见他伯父这样的说法，很不高兴地说：“那么你办吧！”愤然拂袖而去，到军部休息室去了。此时，商联合会会长乔秀泉，商会会长张子贞等一起晋见马，竭力保证这五人不是八路军密探，可予严密查访，以明究竟。这一下才把马的烈火泻下去，结果罚了天成西七千双军鞋。总算把这五人的性命保下了。马福寿为什么给这五人说情呢？其中有个原因：马福寿是天成西的房东。当五人被捕后，天成西的经理到处烧香磕头，央人求救，在乔、张两个会长和八大商号保不下的时候，该号经理央求马福寿出来求情。马福寿因为与天成西是房东房客关系，于是慨然挺身出来说情。马鸿逵讨厌他伯父多管闲事，可是这五人的性命总算救下了。

### 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享受

抗日战争开始，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马对国难当

头，好象是满不在乎的样子，仍然是及时寻乐，穷奢极欲。抗日时期，每年暑伏天马鸿逵总要到贺兰山避暑。贺兰山为宁夏名胜之区，位于银川市西部，距城六十华里，山势巍峨，清流湍激，山上寺庙很多，马鸿逵将依山近水的一处佛庙拆掉，另建一处楼房，供自己与刘慕侠居住。此楼居高临远，黄河映目，万鸟歌鸣，幽雅宜人。马对这些风景还不以为满足，他把“觉民学社”剧团调到贺兰山上演戏。各厅处长，军旅长等，隔日乘汽车上山向马汇报军政要事，及处理重要公文。山上有交际处办的临时饭馆，专备省府机关和游览行人吃饭。国民党中央驻宁机关及外省住宁机关，为逢迎马的所好，每年暑期也要到贺兰山住两天。我是外省驻宁机关的一员，和这些机关人员上了山的时候，当然要连袂进谒马鸿逵。谈片刻，即返招待所。一会儿，马派庶务处长赵旭东持请帖来，请我们大家翌日早餐吃抓羊肉，下午吃酒席，晚上观剧。第二天下午，我们联名回请马并请各厅处长作陪，藉资联系。第三天向马告别，每年总有这么一次。曾记得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日寇投降时，马正在贺兰山上避暑。马对我们说：“外患虽去，内忧还在，兄弟鬩墙之争，在所难免。”

### 垄断居奇

一九四〇年，我到宁夏的时候，曾见大商号中家家摆着大烟灯，这种情况在各省说来，甚属罕见。烟土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绝大部分是宁夏银行出售的。烟土每板是五十两，上面贴着宁夏省政府字样，在市面行销的有宁夏省政府字样的即是官烟，可以随便买卖。否则，即是私烟。一经查觉，即行没收。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大烟究竟有多少呢？据宁夏银行有关人员说：五间大屋放得满满的。在一九四〇

年，每两售现洋三元，至一九四八年每两售到十元左右，据说在一九三六年，国民党中央禁种大烟，以前的收购价每两不过三四角。仅大烟一项，马就大发其财了。马有一次对我们说，宁夏银行收买大烟是为了收拢宁夏银行的旧币。实际上是藉此压榨人民膏血的一种伎俩。

### 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马鸿逵最喜欢人奉承，不论什么事都是独断专行，谁也不敢冒犯。财政厅长赵文府，是马的忠实爪牙。马的财政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所以，马对赵文府视同手足，而赵文府对马奉为圣主。有一次，赵文府坐轿车在街上遇见马鸿逵坐着马车过来了，他赶紧下车站在道旁，垂手而立，俟马的车过去，他才走开。对马是如此恭敬。赵亦最善于逢迎，所以他多少年来没有挨过马的鞭责。其它厅局处长，大半是唯唯诺诺，丝毫不敢触犯他。有敢与他争辩的人，轻者鞭笞，重者杀戮。地政局局长王敏悟，有时与马意见不合，马对他大为不满，便寻找他的弊病。借口说他有贪污，即派员查帐，没有查出贪污痕迹，又以王敏悟经手建筑地政局的房子，所用的砖瓦有中饱之嫌，派员一个一个数点，砖瓦有破损的埋没的，当然不能与原数相符，所短之数硬说王敏悟贪污了。令交地方法院审判。在审判期间，王敏悟使其妻到南京告状，临上飞机时，被宪兵搜出诉状，当时把其妻亦扣捕。马对王敏悟更加恼怒，第二天马去省府亲自审问王敏悟，王据理辩驳。最后王在激怒之下说：“你有权把我枪毙好了。”马说：“你认为我不敢把你枪毙吗？”当时喝令宪兵将王敏悟缚了，令军法处长程福纲监送法场，执行枪决。刹那间，王的性命就呜呼哀哉了。类似这样的事

情不一而足。

“觉民学社”戏院原建筑式样有些老旧，马嫌不美观，令交际处长李汉钊负责，另行建筑。工程完竣后，马到剧院检验，说台上四个反照灯用的材料太多了。李汉钊说：不用这么多材料，做出来包不住光线，更不好看。马说，虽然如此，材料总是用的太多。李汉钊说：材料用的多，我并没有贪污。这一句话把马触怒了，说：你敢顶撞我吗？当时喝令护兵把李汉钊按倒在地，他亲自拿起军棍，把李汉钊打了数十下，经左右求情，才放手。有一天马谈黄河口岸防务方面，责备军法处长兼督察处长程福纲（外号程剥皮）没有尽到督察责任，彼此言语之间有些冲突，马当时也把程福纲打了几十军棍。

### 马家的房产遍银川

马家三代统治宁夏有权有势，横征暴敛，层层盘剥，为所欲为，不惜竭泽而渔。我在宁夏十年，不论商号住户，一问你们的房东是谁？所听到的不是马主席的，就是马司令的。银川市房屋几为马家所独有了。马鸿逵的房屋有他的帐房给收房租，马福寿的房租是他亲自去收。赶到四大节的时候，马福寿亲自坐上轿车，向他的房客和二房东索要节礼。如不送节礼或节礼不丰富，马上就撵房客腾房，毫不客气。为什么马家的房产这么多呢？说起来也有原因。同马家的房子四邻相接的房主，经常是提心吊胆地恐怕出事。如马家提出要买，不论价值多少，赶紧卖掉，以免因房子而遭祸事。如此强力蚕食，马家的房产就日渐其多了。交通银行在宁夏设立分行时没有行址，就买下靠近宁夏银行的一块地址，准备建筑行址。已经建筑其半，马军长敦静（马的二少爷）提出他要在这块地址上建楼房。交通银行

只好乖乖的让与马二少。他们父子专横如狼似虎，谁也不敢与他们抗衡。

### 马在宁夏拔兵的方式

马鸿逵在抗日时期，假抗日为名扩充军额。每年最少拔兵一次。不论在城市和乡村出兵的全是贫苦农民和市民。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子弟们，因与马的各厅处长、征兵大员多有直接间接关系，通过人情和贿赂，都可免于兵役。对商号的征兵是分派的办法，大商号多派，小商号少派。如广发隆等八大商号每家每年派兵十名至二十名，较小的商号亦在三名至五名。商号不能让夥友当兵，只好出钱雇兵。这些雇兵绝大部分是些流氓地痞、游手好闲的人。既系雇兵，当然要讲价钱的。以现洋来说，每个兵价少者五六百元，多者一千元左右。讲定后由当兵者给雇兵的商号立据。验准后分批交付价款。商号把所要的兵额雇足了，静候验兵大员检验，这是第一难关。迨验兵的时候，首先衡量身材是否合格，五官是否齐全，内脏是否有病，这是法定的手续，有一点毛病就剔除下来。在第一次检验的时候，能验准的不过十之五六，验不准的着商号另补。这时，商号只好通过有关人员，向验兵大员行贿，到第二次再验时，就可把第一次检验不合格的兵验上了。但这还不算是万事大吉。这些雇兵一经入营理应由军队管理，纵然逃跑，应当由所属部队严行缉拿，而出兵商号不能负责。可是，在马鸿逵的军事制度下，却不是这样。其逃跑之兵仍由原出兵商号补兵，这个商号有理难辩，只好另补。就这样年年在商号征兵，而商号年年雇兵。大些的商号在解放前雇兵竟有达一连人之多的。这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多有因雇兵太多亏损至钜而倒闭

者。

### 解放前的混乱局面

解放前，马鸿逵和他的几位太太以及长子马敦厚等早已飞往重庆了。宁夏仅留次子马敦静维持治安，马如龙担任城防司令，城内死气沉沉。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兰州解放后，银川终日 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九月初傅作义到了包头，促进绥远起义。蒋介石闻讯后，即派国防部长徐永昌乘飞机到包头向傅游说。徐路经宁夏住了一宿。意在看看马家的动静，徐所看到的是马家的子弟兵暮气沉沉，毫无作为。翌日，在徐未起飞前，驻宁各机关依照交际处的通知，都前往大公馆送行。这时徐认为卧车早该准备好了，遂与大家告别。走出大门，卧车仍没有开来，徐颓丧不已又无可奈何，身依门口的石狮子站了足有二十分钟，卧车始行开到。这时马敦静才来了，看其面貌黑黝黝的，少精神，好象烟瘾还没有过足。马急匆匆扶徐上车后，即另坐一辆卧车到机场送行。

### 宁夏解放前夕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兰州解放后，杨德志司令员于九月中旬率领全军往宁夏推进。行抵中宁县时，马鸿宾部起义，解放军一帆风顺地过了黄河，长驱直入中卫县与马鸿逵部接火。据人民解放军匡处长说，只打了三发榴弹炮，马家军队即溃不成军如鸟兽散。解放军继续前进到吴忠镇时，正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宁夏银川市驻军极度惊慌，至晚九点钟的时候，城内枪炮齐鸣，我初以为解放军已到城垣附近，与马家军接火。这时炮声越响越烈，空中子弹嗖嗖乱飞，彻夜不止。我全家伏在窗根



底以避流弹。俟天明，有邻者开门出视，只见街上有尸数具，是中流弹而毙命者。又见马军仍是持枪乱放，这时才知道解放军尚没有进城。正议论间，我行（绥远省银行宁夏办事处）工友张凯志突然来对我说：同人们有请示的事情，叫我速到行商议。我马上就要前往，家人阻拦不让走，因此时枪声未停，恐有危险。而我自认“内省无咎”，有何惧怕？遂决然而出，沿商舖疾趋办事处，及到行内召集同人开会，会计万珍首先提出：值此马家军队哗变之际，人人自危，生命财产难以保全。为了转移匪军的视线，拟将行内库存现金，分散在同人家中，以免匪军抢劫。我说此非万全之策。库款放在同人家中，如被土匪抢去把库款丢了，我无法交代；如在库里放着，倘匪兵进来打开库房把款抢去，有目共睹，这我可以交代。万珍等看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扭头就走，回家去了。午后我又召集在行的同人说，今天上午宁夏省政府厅处长、商会会长和地方绅士手执白旗，乘汽车到吴忠镇欢迎解放军。如今天晚上解放军能够进城的话，银川市可免兵燹之灾。否则，匪兵抢劫在所不免，似此今晚即是一个难关。我们如能平安渡过，即是大家的幸事。否则，不免要受到惊慌。我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就在行内住。你们愿意陪我在行内住更好，否则听其自便。话毕，师敦业和二位工友同声说，愿陪主任在行内住。我说如此甚好。天将黑即将大门关好，并以大石块把门顶住。我与同人们静坐一室，盼解放军赶快进城，以救生民。这时候，城内枪声四起，炮声隆隆，响成一片。至午夜十二点以后，枪声渐渐稀疏了，旋闻街上有汽车喇叭的声音，我和同人们说，解放军进城了，我们可以庆幸无恙了。及天明我即开门出视，果见解放军驻扎玉皇楼、鼓楼等处，市面秩序井然，市民与商号都呈现一种欣喜的气氛。变

兵把枪枝都扔在中山公园附近，逃之夭夭了。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起，马鸿逵统治宁夏十七年的家天下被捣毁了，宁夏人民跳出苦海，重见天日，走上了光明大道。

## 傅作义将军主绥期间，内蒙古西部

### （绥远地区）新闻报纸出版简况

杨令德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阎、冯反蒋，扩大会议失败。一九三一年傅作义将军率部驻防绥远，为傅来绥之始。绥远多年来为山西军阀阎锡山之禁脔。马福祥统治绥远以后，冯玉祥之西北军，张作霖之奉军，都一度占据过绥远，但均为时不久。北伐前后，山西之商震、李培基、徐永昌先后担任过绥远都统、绥远省主席，王靖国、赵承绶部的步骑兵，均先于傅部在绥远驻扎过。一九三一年傅来绥时，绥远省主席为李培基。傅抵绥后，首先加强警宪戒备，以袁庆曾接替绥远省公安局长卜兆瑞之职务，袁同时兼任宪兵司令，其后任民政厅长。傅为三十五军军长，所部有两师之众，师长李生达和傅自兼。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华洋义赈会所建萨、托民生渠举行开闸放水典礼后，李培基去职，傅即出任绥远省主席。从此军政大权在握，傅才有了这么一块地盘，但一切仍受阎锡山控制。绥东丰镇、集宁一带有赵承绶部、包头以西有王靖国部分别驻防，阎锡山并派冯曦为绥远建设厅长，实际为监军。再加上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嫡系亦逐渐向这个地区伸手，使傅的处境很有微妙之处。

傅一向重视舆论宣传，二十年代即在天津与《大公报》胡政

之、张季鸾结识，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建立了关系。傅部甫抵绥远，张季鸾、胡政之即先后来绥晤傅，其后《大公报》记者陈丕士、赵思源、汪松年、赵望云、杨汝泉、范希天（长江）、孟可权（秋江）等多人先后来绥，作过一些采访工作。其中长江、秋江在绥数月，工作较久。

一九三一年李培基任绥远省主席时，我即任天津《大公报》驻绥远记者，所寄通讯，对地方政府措施有所抨击，《大公报》均为发表。傅任绥远省主席后，最初我所发通讯一仍旧贯，对地方政府措施，亦有所指摘，但稿件投邮后，如石沉大海，不见刊出。不久即知傅与《大公报》在政治上有密契，从此我也就在《大公报》上为傅鼓吹，而且在这方面一直为之效劳多年。

一九三一年傅来绥远时，绥远地方新闻出版事业很不发达。绥远从民初由王定圻（屏章）创办报纸以来，直至一九二五年全地区只有铅印报纸一张。王定圻包头人，老同盟会员，曾任绥远中学校长，从太原请来印刷工人，备办了一些印刷器材，出版一张名为《一报》的铅印报纸。王定圻被袁世凯杀害后，报纸商办，改名为《商报》，不久亦停刊。其后即由历届政府接办，历史最长者为《西北实业报》，苟延残喘，几达十年。一九二七年奉军在绥时，改名为《绥远日报》，名义上为民办，实际仍由政府资助。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冯玉祥驻节包头时，在包头创办《西北民报》。这是绥包地区第一张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报纸，系一四开小报。从此包头才开始有了铅印设备，有能够出版报纸的印刷厂。当时归绥方面仍为唯一的一张旧式报纸，使用的是文言文，《西北民报》则完全使用白话文了。

绥、包两地各有一份报纸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一九二六年后，包头《西北民报》停刊，归绥方面如上所述《西北实业

报》改为《绥远日报》。一九二八年北伐以后，国民党改《绥远日报》为《党报》（《绥远民国日报》前身），作为国民党的地方机关报。不久有一韩姓工人开设一小印刷厂，可以排印一张小报，这时绥远教育厅下设之通俗教育讲演所，改为民众教育馆，其所属之《通俗日报》也改为《社会日报》。一九三一年傅来绥时，绥远全省地方只有归绥出版的这两个报：《绥远民国日报》和《绥远社会日报》，而绥远省政府则并无自己的机关报。

傅任绥远省主席后，立即筹备购制印刷器材，出版了政府的机关报《绥远日报》，与《绥远民国日报》成为党政两个大报。《绥远日报》先由张策后由周钧主办，不久即由闽人林超然任社长兼主笔，直到“七七”事变后，绥远沦陷时止。

《绥远日报》始终无什么特色，几乎是继承了多年来《西北实业报》的旧传统。《绥远民国日报》和《社会日报》则以副刊见称。在那时相当复杂的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发表了不少好的新诗、杂文和翻译小品。如杨植霖、武达平、章叶频、韩燕如、袁炜、袁烙、陈介平诸人均系当时发表作品之作者，甚至有区外作家如：王亚平等与章叶频等联系，在这两个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不少诗篇。

《何梅协定》后，华北五省国民党撤退，归绥设立日寇特务机关“羽山公馆”。国民党机关报改为《西北日报》，表面称民办报纸以应付日寇，实则仍系原班人马，只是换了个招牌而已。我多年来为《绥远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其后兼主《通俗日报》直至《社会日报》笔政。《绥远民国日报》改为《西北日报》，我仍蝉联下来，主编副刊。一九三六年冬，共产党人王毅然等通过我，占用《西北日报》副刊篇幅，办一名为《边防文萃》的刊

物。出版几期之后，有一期译登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斯诺关于《西行漫记》的片断，其中有毛主席有关抗日的谈话，译稿发表后，在绥远地方上并未发生风波，可是不久绥远国民党派赴南京工作的人员发现此文，便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告密，南京来电免除了我的职务。此事说明当时在国统区控制下，绥远还是以傅作义势力为主，不至象内地那样严密，所以能于极为复杂的处境中，透露出不少进步诗文以至能够冲破困难而发表了毛主席的论著。但这也并不是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放松了。相反这里的新闻检查也是很严的，不过副刊稿件一般不送审，容易漏网就是了。

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公告组”的专设新闻检查机构，由山西闻喜人陈明德任组长，每夜通讯社的新闻稿和发往外埠的新闻电均须送审。一九三五年前后，绥远地区的报纸在归绥有《绥远日报》、《绥远民国日报》、《绥远社会日报》、《绥闻晚报》，在包头有《包头日报》。除《绥远民国日报》、《绥远日报》外，其余均为小报。《朝报》是国民党右派以所谓私人名义办的，其实是国民党在绥远当权的蒋帮分子的舆论工具，比对正式的国民党机关报《绥远民国日报》控制的还要严，内容就更反动。这些人还办了一个刊物叫《醋潮》，酸溜溜的，还比不上早期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呢。本来绥远地区的早期文艺刊物为五四运动以后的《火坑》，进入三十年代，《火坑》停刊，在报纸上出了长期名为《塞风》的副刊。另外，苏谦益、杜如薪、刘洪河、马士瑛等出了《血腥》，霍世休、章叶频、郭根等出了较大型刊物《燕然》，但都没有维持多久，“七七”事变前夕均即停刊。

此一时期，通讯社林立，因为一、二人弄一架油印机，挂个牌子，便可沿门乞讨似地，向政府机关名为收一些稿费，实则是

敲一笔小小的竹杠，借以活动。有的也的确是可可怜怜，借以维生而已。这时通讯社有绥远通过社、绥远新闻社、塞北通讯社、绥蒙通讯社等等，最后在一九三六年底还来了个东北人赵尺子办了个边疆通讯社。这个人来历不明，骗诱来几个东北流亡青年同他在一起。抗战期间，这些青年人大都与之远离，有的牺牲，有的成为研究边事的学者。赵本人则逐渐暴露，是个地地道道的特务分子。

“公告组”每夜检查新闻稿，往往检扣，闹出纠纷。有一次傅对我谈一次话，有意发表。谈话稿送“公告组”后竟被检扣。次日我对傅述及，再次发稿，亦未说明原委，稿再次被扣。第三日我特意向傅说明再三被扣情形，傅大怒。当夜陈明德来电话问我：为何不事先见告？说傅主席要枪毙他哩，云云。这叫“作法自毙”。我也是有意和他们开个小玩笑。

一九三五年前后，傅部经过几次抗击日伪军的战斗。在一片不抵抗中，傅作义将军奋起抗日，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知名人士纷纷来绥远观光。傅增湘、胡适、任鸿隽、郑振铎、谢冰心、刘半农、顾颉刚、陈波儿、应云卫，吕骥、任白戈、叶浅予、刘良模，甚至江亢虎等也来了。

胡适作了一次公开讲演，其内容无非是全盘西化一套。大谈中国文化只有太监、缠足云云，总之一切丑恶不堪，就差说月亮是外国的圆了。这本来是一片胡言，我们办的通讯社把胡的讲演整理发表，不但稿子被扣，而且通讯社被罚停止发稿三天。这是傅本人的主张，也没什么深意，不过是给你一点脸色看而已。

《绥远日报》和《绥远民国日报》有时也发生一些纠纷。这是因为统治绥远的山西势力和绥远当地人之间，有时不免发生矛盾的反映。有一次《绥远日报》发表了一篇以《绥远人乃至土匪》为

题的社论，《绥远 民国日报》立即予以痛斥，连日攻击，甚至涉及《绥远日报》社长林超然本人，因为社论是林执笔的。闹了几天，已有煽动群众大打出手的形势。后来由建设厅长冯曦亲自出面调停了事。

当时绥远印刷条件很差，不能制版登照片，也没有印刷出版书籍的力量。傅在省政府出有不定期的公报一类刊物，内容不过是政令、会报等等，亦无人注意。总之，绥远当时在本地的宣传并不出色。而在对外的宣传上则甚突出。特别是从三十年代中期起，蒙旗自治问题，日军唆使德王、李守信、王英组织伪蒙汉奸军进犯问题，直至长城抗日战役、百灵庙、大庙之战，红格尔图、南壕堑之战，轰动国内外。傅作义将军抗日声誉日隆，平津沪汉各大报均以重要篇幅报道这一地区的抗日消息，绥远一时成了新闻中心。不少外埠大报如北京《世界日报》、津沪《大公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甚至四川的《新蜀报》都约我由绥每日直接拍发新闻电稿。有的报还先后派记者来绥采访，如：顾执中、陆贻等都来过。傅在对外宣传方面，颇为重视。这时以《大公报》为主，对傅作义将军的抗日宣传不遗余力。绥包沦陷后，傅部从太原退出，几乎崩溃，一时默然无闻。直至一九三八年初，汉口《大公报》从柳林发出《傅作义将军访问记》，傅又成了不断在报纸上出现的重要新闻人物。

日寇侵占绥包八年，傅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移防绥西陕坝，恢复绥远省政府，成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八年抗日期间，陕坝仅出有小报《奋斗日报》一种，纸张印刷均甚困难，报纸内容时好时坏，随编辑人员之易手为转移（实际是以当时政治气候为转移），有些爱好文艺的青年如肖离等人还出版过颇有特色的文艺刊物，但为时甚暂。



总的说来，《奋斗日报》在抗战后期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脱离‘奸党’启事”一类东西，经常在《奋斗日报》上出现，那时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没有这样公然干过呢。

抗日胜利后，回到归绥。经过沦陷，日寇时期的印刷设备，已颇为完善。“劫收”以后，《奋斗日报》以胜利者的身份，什么卷筒机、万能铸字机等等都到手了，在归绥恢复出版。其后在张家口也出版了《奋斗日报》。《奋斗日报》是傅作义将军所部的机关报，印刷质量好了，内容依然是不敢恭维。这时《绥远民国日报》也恢复出版了，还有贾汉卿办的小报《绥闻报晚》、《奋斗日报》记者刘映元还办了短时期的《绥蒙新闻》，也是小报。到了一九四九年“九·一九”起义时，这些报纸有的已寿终正寝，《奋斗日报》寿命最长，一九五〇年即作为军报随董其武将军移往河北军中。解放前崔载之在北平出版的《平明日报》，也是《奋斗日报》的化身。

所有以上这些报纸也很难评价，其实也不必作什么评价。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平起义以及其后所部董其武将军在绥远的起义，就是最好的评价了。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于呼和浩特）

## “五卅”时期绥远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马映光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举行了大罢工；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工厂的资本家向罢工工人开枪，当场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制造了上海屠杀事件。

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压制工人组织工会，开除工会的发起者，激起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五月二十八日，日本资本家封闭工厂，勒令工人出厂，日本军队开枪射击工人，制造了青岛屠杀事件。

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斗争。

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一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南京路举行了反帝国主义大示威。英国巡捕向徒手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十余人，被捕五十余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后，上海的工人、市民、学生继续展开反帝斗争，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纷纷打电报、写信慰问上海的死难和被捕群众的家属，并捐款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

六月初，绥远特别区首府归绥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掀起了爱国反帝运动的热潮，绥远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学生罢课，开展

宣传募捐活动，支援上海“五卅”惨案被害和受伤的工人和学生。在旧城舍力图召开大会，当时参加的学校有：绥远第一中学、绥远师范学校、绥远五族学院（后改为中山学院）、绥远农科职业学校、绥远工科职业学校、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等，共计学生一千多人。当学联会向同学们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后，群情激愤，齐声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收回租界！”“要求惩办屠杀工人和学生的凶手！”“为死难同胞伸冤报仇！”等口号。大会通过了慰问上海死难工人和学生的家属及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爱国反帝斗争的电文。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接着组织了好多宣传队，到街头讲演，向市民宣传“五卅”惨案的情况，鼓动市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工人和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同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激发了归绥市民的反帝爱国热情。为参加爱国反帝运动，全市学生罢课三天。每个宣传队都带着学联会统一印制的二联募捐收据，一边宣传，一边沿门挨户地向各商店募捐。各个商店，大都积极捐款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爱国反帝斗争。即使是一些小商店，至少捐献一元钱，大商店捐十元或二三十元，中等商店捐三五元，对居民一般不劝募，只向房东劝募，比较开通的房客激于爱国热情也有自动捐献的。

大南街路西有一家大饭馆叫“南古丰轩”，院落宽敞，西厅和南北两排房都有客座，二层楼和三层楼上有雅座，规模宏大。每天的营业额达二百多元。宣传队到该饭馆劝募时，掌柜的只拿出一元钱，宣传队的同学们再三耐心劝说，但吝啬的经理说什么也不再增加。同学们气极了，没有收他那一元钱。

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在一个星期日，“南古丰轩”早上一开门，各校的学生就拥了进去，把楼上楼下所有的客座都坐满了，掌柜还以为我们去吃早点，忙着提水沏茶，殷勤招待，问：“先

生们，要点啥吃？”每个桌上的“客人”都说：“不要茶，就要白开水喝，什么也不吃。”这么一来，堂倌们见事色不对，也不敢说什么，只忙着提水，给每个桌的“客人”往茶杯里倒水。每个桌上的同学们都坐着不动，有的聊天，有的看书看报，有的唱歌。

掌柜的惊慌失措，楼上楼下看了几遍，无可奈何地回到柜房里。真正来吃饭的客人，进来一看，只见楼上楼下坐满了学生，也就退走了。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来了一批吃过饭的同学换班，让头一批同学回去吃饭；吃晚饭时，又换了一次班。把“南古丰轩”的全体客座整整占了一天，一直坐到他们快关门的时候才退走。经理和财东都慌了，请商会派人向学联合会谈判，表示道歉，愿意多捐些款了事，希望学生们第二天千万别再去了。谈判结果：由商会调解，“南古丰轩”捐献了五十元。这件事轰动了全市商界，我们的募捐工作更顺利了，共募捐了一千多元，都给上海学生联合会汇去了。

绥远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学生的宣传活动，继续了一个多月。六月份，每天都有学生在街头宣传，有的宣传队还入户宣传。学联合会也经常开会（会址就在绥远第一中学），我们宣传股除了写标语，编印传单外，还张贴过宣传画，编印过不定期的油印小报。

当时冯玉祥是“西北边防督办”，他的“国民军”驻在察哈尔和绥远地区，绥远的都统是李鸣钟，教育厅厅长是沙明远。他们对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既不积极支持，也不横加干涉。听说沙明远当过北京民国大学的教授，民国大学的学生宣传队来归绥宣传，除了在街头演讲外，还在旧城大西街的同和戏院演过几次

宣传“五卅”事件的话剧。沙明远对民大的学生宣传队是积极支持的，他以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号召各学校学生去看话剧，听讲演，在演出前后他都向观众讲过话。绥远学联会对北京学生宣传队热烈欢迎，积极支援。他们在归绥演完剧，还到包头演了几次。

“五卅”事件的宣传活动进行得广泛深入，在归绥城里家喻户晓。六月下旬和七月初，又停了几天课，到市郊周围十几里的农村宣传。宣传活动一直继续到暑假，才告结束。外县的同学在假期回到县里，也各自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五卅”时期，绥远的学生爱国反帝运动，走在各界群众的前面，有力地激发了市民和近郊农民的爱国热情，对响应和支持上海工人和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 伪内蒙古自治军始末

## 正珠尔扎布

伪内蒙古自治军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向我东北发动侵略时，由关东军策划，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一带成立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对此就有所策划活动。伪内蒙古自治军成立后曾多次配合日寇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给东北和东部内蒙古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造成了祸国殃民的罪行。我现在以剧中主角之一的身份叙述往事，聊当自责；兼之，伪内蒙古自治军又为伪满兴安军的前身，其始末也许可供修史者的参考。至于错误和遗漏之处，希熟悉当时情况的读者加以指正。

一、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早在日本留学时即已同日本的极右团体（如黑龙会、大化会、爱之玉园社等）以及日本军政要人（如山本条太郎，畑俊六，松井石根、本文尔官、间院官等和参谋本部陆军省的少壮将校），都有密切的来往。

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相继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和炮兵科，回到旅大后，策划蒙古“独立”的秘密活动便开始了。多次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烟莫太郎中将（正珠尔扎布早在日本留学时即与其熟悉，烟莫当时是陆军省少将军务局长并与他的长子烟莫一是同期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和以后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

人接洽，要求日本帮助我们组织蒙古军队，实现所谓蒙古“独立”。烟莫等很赞扬我们的“雄图”，说：蒙古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是同种，是兄弟般的关系，应该携起手来。你们的父亲巴布扎布将军生前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致力于蒙古的独立事业，你们应当继承父志，好好努力吧。关东军部并设宴招待了我们。几次接洽，我们和关东军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些参谋如花谷等都成了密友。我们就这样在“九·一八”以前便打下了背叛祖国，成立“内蒙自治军”的基础。

二、在与日本关东军接洽的同时，我们还一面联络蒙古土匪天红（名金昌，苏鲁克旗人，有一百多名胡匪）。天红来大连住了些日子，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甘珠尔扎布还带着妻子（满清肃亲王第十四女、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汉名金璧辉）到了西科中旗（图什业图旗）王府，秘密训练王府的军队；一面联络蒙古各地要人，动员图什业图旗王爷业喜海顺参加蒙古“独立”运动（甘珠尔扎布与业喜海顺是亲戚，业喜海顺的妻子是肃亲王的妹妹），甘珠尔扎布由图什业图旗回来就正式与金璧辉离婚了。

正珠尔扎布由于幼小离开蒙古，不熟悉蒙古的情况，就利用日寇侵略我国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特务组织，郑家屯“满铁公所”来研究蒙古事情，同时联络拉拢内蒙古有势力的人物，如莫力庙活佛阿旺图巴丹，阿鲁科尔沁王坦丕賚，温都尔王阳仓扎布，爱根庙沙布冷喇嘛等。

三、一九三一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只有一个师团和铁道守备队，兵力缺少，很需要组织伪军、汉奸部队为之效劳。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部连夜由旅顺移驻奉天

(沈阳)“东洋拓殖会社”办公大楼。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赶快跑到奉天,住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开始了建立“内蒙古自治军”的公开活动。一面召集滕续文(哈丰阿)等蒙旗师范学生和其他青年研究;一面到关东军部面见本庄繁司令官、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参谋等要求枪炮子弹。板垣参谋问了我们的计划后,答应给我们步枪三千支(东北兵工厂制造的七九大盖)、子弹二十万发。

四、在万国旅社,甘珠尔扎布与滕续文、张洪俊、朝凤林、李友桐(阿思根)等三十多名蒙古青年开会,商定了“蒙古独立军”(后改为“内蒙古自治军”的组织。派人联络科左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克)、科左中旗协理韩色旺。他俩答应只要有武器就参加“蒙古独立军”。又派苏鲁克旗人宋高山联络盘据在通辽一带的胡匪天红、高山,也得到赞同。

“蒙古独立军”司令部的人员如下:

司令:甘珠尔扎布

参谋长:萨嘎拉扎布(郑凤翔),巴林右旗人,日本“满铁”育成学校毕业。

秘书长:滕续文(哈丰阿),科左中旗人,蒙旗师范学校学生。

副官长:朝凤翔,科左中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还设置宣传、军械等八大处,正珠尔扎布担任了最重要的后方联络,即与关东军联络的任务。关东军部还给我们司令部派来一名日本顾问,名叫和田劲,是退伍的中尉,是个在奉天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浪人。

当时我们的打算是:由科左后旗经科左中旗占领通辽县,再往北经高力板、科右中旗到兴安岭索腰勒吉山会合鄂道甫的部



队，以后再商议下一步的打算。

五、甘珠尔扎布从关东军要了武器，但在内蒙古地方没有他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在奉天集合来的三、四十名青年学生，因而无法领运武器。此时，包善一在该旗有二百左右的军队，韩色旺在旗下招募了土匪约二百人，天红、高山等部有土匪二百来人，还有一些甘珠尔扎布的远亲。

我们与关东军联络好以后，计划把武器由奉天经四平、郑家屯运到大蒿子包善一家，但这时蒙旗各地土匪横行，由火车运武器是件冒险的事情。不久关东军把三千支步枪和二十万发子弹运到了平齐线一棵树车站。这是离包善一家最近的一个小站，人烟稀少，卸武器比较方便。一天夜间，用包善一强征来的车马，由甘珠尔扎布亲自指挥包善一的军队和学生队，把武器全部安全地运到了大蒿子。在这里把枪和子弹分给了包善一、韩色旺、天红等部队（分配数忘记）。以后，和田顾问携若干箱手榴弹也来到了大蒿子。但是包善一在分得多数武器后坚决不动窝，借口这个那个，不积极活动。我们和他争论了一夜。这夜，和田顾问是在兜里揣着手榴弹与包善一争论的，准备万一包善一不答应就炸死他。最后包善一才勉强答应了。

六、包善一不肯痛痛快快地参加“蒙古独立军”的原因是：一怕日本军撤出东北；二怕中央来（据说中央已派来了高专员）；三怕丢了自己的庞大财产。因而犹豫不定，骑两头马看风头，对日本对中央两面讨好。为了使包善一安心，甘珠尔扎布想办法把包善一全家搬到大连安全的地方去居住。这样包善一才勉勉强强地开始行动。后来看到包善一的行动仍然消极，便又把总司令让他。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积极行动起来。韩色旺是包善一的亲戚，原来是个文人，是想跟着包善一找机会捞一把，根本没有搞什么

蒙古“独立”的思想。

改编后即称为“内蒙古自治军”，其组织如下。

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包善一

第二军司令：韩色旺

以上两军各有七、八个团，实际兵力有二千多人。

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甘珠尔扎布

一、二两军七、八个团的团长有高山、那钦双和尔、曹巴格都等，其他几个团长的姓名忘记了。

炮兵队长：白云航(哈斯巴图尔)，喀喇沁右旗人，俄国基辅军官学校毕业。

各军团都有蒙旗师范的学生，相当于指导员的地位。

“内蒙古自治军”号称一万，在科左后旗、科左中旗和通辽县一带活动。他们多数是临时招集的土匪流氓，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军风纪，因而那一带的老百姓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七、一九三一年十月中旬，第二军和第三军驻在郑通线大林站一带，准备攻击通辽县城。当时驻防通辽县城的是奉天骑兵第二旅，我们攻击以前，派了博彦满都带几名蒙旗学生潜入通辽县城与通辽县当局谈判，命其无条件开城，但没有成功。于是便决定攻城。这时博彦满都无法出城，便隐藏在一个早认识的女子家，以后逃了出来。进攻通辽的主力是第三军。甘珠尔扎布亲自率领高山的部队（这时还没有别的部队）和学生队，由西南闯进通辽县城；正珠尔扎布领着十几个人由西攻入通辽县城；田和顾问领着十几个日寇流氓，乘车头开进了通辽车站；包善一部队的铁管带等五、六十人插入通辽街中心，他们只顾抢东西和抢吃的，结果都被城里守军打死了。守备通辽的第三旅和民团开始反攻，我们互相联络不上，由晓拂打到正午，我们被迫退出县城，跑回

大林站。

在攻通辽县城的时候，包善一没有亲自参加，只派了铁管带等五、六十人入城。韩色旺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参加，正珠尔扎布路过小街集时看见韩正在那里吃烙饼抽大烟呢。

攻打通辽失败后，包善一、韩色旺二人一心想的只是扩充自己的势力，扩大地盘，发财致富，闭口不谈蒙古“独立”了。由于内部同床异梦，互相猜疑，终于使“内蒙自治军”走向瓦解。

八、攻打通辽失败后，和田顾问气忿地回奉天报告关东军，说：“内蒙自治军完蛋了。都是些土匪，非讨伐不可！”和田从此再也不当顾问了，后来他在沈阳组织了伪靖安军。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上奉天到关东军部见板垣参谋说明“内蒙自治军”的实际情况和包善一、韩色旺二人的消极态度，并要求关东军部再援助大炮和军队防寒被服，以便重振旗鼓。于是板垣又派另一名特务、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曾在外蒙大库伦搞过间谍活动）当“内蒙自治军”顾问。松井给我们带来大口径迫击炮二门和捷克制轻机关枪等武器。松井死后又陆续派来了退伍少佐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少佐等，当“内蒙自治军”顾问，最后又派了一名现役少佐本间诚，形成了一个顾问团。这样关东军就把“内蒙自治军”完全掌握在她的手里了。

九、“内蒙自治军”第一军驻在科左后旗，第二军驻在科左中旗，第三军驻在科左中旗舍伯吐一带。在这期间，日寇羽山支队攻占了通辽县城。当时莫力庙（通辽西六十里）活佛阿旺图巴丹也收集了一百多名喇嘛和当地人一起保护莫力庙。正珠尔扎布到莫力庙，游说他参加“蒙古自治军”。他表示赞成，但不想动窝，不肯丢掉莫力庙和自己庞大的财产。于是就把他尊为“救国

大师”，正珠尔扎布当他名义上的参谋长。后来驻开鲁县的东北军崔兴武旅李守信、胡宝山等进攻舍伯吐，夺去“内蒙自治军”的迫击炮进而攻击莫力庙，把该庙抢得一干二净，“救国大师”也就从此垮台，跑回通辽了。

十、甘珠尔扎布计划把三个军团结起来北上会合郭道甫，但是包、韩与甘珠尔扎布意见相左。这时松井顾问主张攻击开鲁县城，甘珠尔扎布不同意这个主张而按兵不动。松井负气单独领一些第一军的士兵向开鲁前进。在中途松井被民团打死。我又到关东军部向板垣报告情况。板垣一听大怒，说：“顾问都给打死了，你们还活着！”我把“蒙古自治军”内部矛盾和松井顾问不听意见，单独行动的情况说明，并表明我们蒙古“独立”的意见是坚定的，我们计划先北上到兴安岭，目前不能攻开鲁。板垣也没有说什么。

第二军里有一个青年团长名叫小喇嘛，为人蛮横，抢杀成性，二军司令韩色旺也无法控制他。经沙嘎拉扎布等与关东军特务服部茂树阴谋设计，欺骗说要引他见关东军司令官，把小喇嘛等四五人杀害了。

“内蒙自治军”的内部矛盾，在攻击通辽失败后更加严重和深化了。第三军纪律较好，天红、高山所部尚能听约束；第一、第二军纪律松弛，形同土匪，在科左中旗和后旗、通辽县一带，盘踞了四五个月，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莫大损失。“独立”活动，一事无成，仅给蒙汉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甘珠尔扎布兄弟俩无法收拾，便悄悄地离开了“内蒙自治军”。

十一、正在这个时候，博彦满都等同日寇特务菊竹稻穗（又名宝藏，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蒙古科毕业，当时是郑家屯“满铁”公所长）召开了蒙古王公会议，决定了东部蒙古参加伪满州国。

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州国成立，日寇把残余的“内蒙自治军”

改编为伪满州国“兴安军”，任命扎赉特王爷巴特玛拉布坦为少将司令官。

(一九六三年)

# 东蒙“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成立

## 与其活动

达瓦敖斯尔

在郭道甫的倡议下，一九二八年在沈阳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兹将其成立及一些活动情况，记述如下：

郭道甫(蒙名莫日色)于一九二八年夏在呼伦贝尔草原暴动闹独立，失败后，被张学良将军招抚，委任为东北长官公署的咨议。郭道甫认为蒙古民族的衰弱主要是由于文化落后所致。所以他来沈阳后倡议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以振兴文化教育，拯救民族的衰亡。

郭道甫提出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倡议，首先得到东蒙知名人士和蒙古学生的赞同，最后得到东北军政当局的同意。以小南关东蒙书局为联络地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在沈阳青年会馆召开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会议讨论通过会章，推选了会长、秘书长、秘书、董事等负责人。

与会代表共三十余人，计有郭道甫、克兴格（汉名克明远）、博彦满都（汉名包豹臣）、玛尼巴达喇（汉名玛鸣洲）、王心禹（辽宁省政府蒙汉文翻译）、曹剑潭等东蒙知名人士；还有图什业图王业喜海顺、克什克腾旗辅国公诺拉嘎尔扎布、苏鄂公旗辅国公寿明阿；还有包日新（蒙名孟和济亚，辽宁省立一中

学生)、富连科(蒙名达瓦敖斯尔)、包海明(蒙名仓都楞)、兰玉芳、白秀堂、包玉堂等五名辽宁省立三中学生;陈廷瑞(蒙名桑杰扎布,南满中学学生)、王桂馨(女,辽宁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等学生代表和东蒙书局印刷工人代表包崇新、包廉久等参加了会议。来宾有: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处长袁庆恩,副处长许××(蒙族),袁处长代表蒙旗处讲了话。

东蒙“蒙古文化促进会”会章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各盟旗举办文化教育事业,促进蒙古文化教育的发展,使蒙古民族尽快跻于文明民族的行列,大力协助东蒙书局发展业务,编辑出版蒙文书籍并负责向东蒙地区发行。

会上推选图什业图王业喜海顺为“蒙古文化促进会”会长;克旗辅国公诺拉嘎尔扎布和苏鄂公旗辅国公寿明阿为副会长;推选郭道甫为“蒙古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克兴格为秘书。还聘请东蒙一些王公和知名人士为“蒙古文化促进会”的董事

“蒙古文化促进会”办事机构设在东蒙书局,由秘书克兴格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被推选与聘请为会长、董事的王公曾捐助了一些经费,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也补助了一笔活动经费。

会后,东蒙书局扩充了业务范围,编译出版不少蒙文书籍,对促进东蒙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另外,“蒙古文化促进会”对一九二八年成立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当时,郭道甫曾以“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向东北当局提出成立蒙旗师范学校的建议,最后得到批准。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

## 蒙古旅京学生会和它的刊物《蒙古》

达瓦敖斯尔 那木海扎布

辛亥革命以后，内蒙古一部分青年受新思潮的影响，去沈阳、北京、南京等地求学，其中以去北京念书的较多，特别是一九二五年以后，去北京上大学的逐渐增多，如在北大、北师大等国立大学和辅仁、民国、中国、朝阳等私立大学读书的东西蒙蒙族大学生约有二十多人。另外，北京蒙藏学校有蒙族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其它在公私立中学就读的蒙族学生也有十几个人。当时在北京各大专中学念书的蒙族学生约有二百多人。

一九二六年，经旅京蒙族大学生的倡议，蒙藏学校蒙族同学的积极支持响应，成立了“蒙古旅京学生会”。这个学生会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北京蒙藏学校大礼堂召开会员大会成立的。当时出席大会的会员有一百八十多人。

在会员大会上，讨论通过了“蒙古旅京学生会”会章。会章的主要宗旨是：以敦睦乡谊，团结互助，切磋砥砺，发奋读书，为复兴蒙古民族而共同奋斗。

会员大会选出北师大的陈封（蒙名那木海扎布）、经天禄（字革陈）、北大的亢仁、任秉钧，民国大学的康济民，朝阳大学的关荫南和蒙藏学校的赵文儒（蒙名玛哈希瑞）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组成了蒙古旅京学生会的执行机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的任期三年，任期满后，在下届会员大会上改选。



会员大会上还决定：蒙古旅京学生会编印出版蒙汉文合编的不定期会刊——《蒙古》，责成执委会负责编辑出版。

会员大会闭幕后，执委会进行了分工，推选陈封、经天禄、康济民、赵文儒、任秉钧五人为会刊的征稿撰稿编辑，其它执委协助进行出刊的筹备工作。一方面分头走访驻京和过往的蒙古王公、蒙古知名人士，请求他们捐款资助会刊的资金；另一方面，全体执委带头写稿，并向会员征稿。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第一期会刊《蒙古》于一九二七年初出版了。它是由内蒙古知名人士汪印候经营的北平蒙文书局印刷出版的。每期印刷一千册，除了给捐款者赠送外，主要向内蒙各盟旗札萨克衙门、学校和一些知名人士以及一部分有阅读蒙文能力的农牧民赠阅。

会刊《蒙古》刊登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唤起漠南蒙族大众觉醒自强，努力摆脱贫困愚昧落后状况，振兴文化教育，力争早日跻身于强盛民族行列。刊物出版后，受到内蒙各地广大蒙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纷纷来信索阅，供不应求。第一届执委会任期内共出刊四期。

一九二九年七月蒙古旅平（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学生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改选了执委会成员，除第一届执委大部分连任外，新选了北大学生富连科（蒙名达瓦敖斯尔）、兰玉芳、朝阳大学学生马星南为执委。富连科被增补为会刊《蒙古》的编辑。

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共出版四期会刊，前后共出版发行八期。这个刊物当时对促进内蒙古广大蒙族群众的文化知识和进步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 伪满成立的喇嘛宗团是怎么回事

那木海扎布

一九三二年春，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日寇高唱什么“日满一心一德，建设王道乐土，共存共荣”，说什么“日本帝国是以万世一系皇道精神建国的”，其宗旨是八纮一宇。成立协和会，宣传什么“民族协和，共同繁荣”。为傀儡皇帝溥仪编造了几套所谓“训民诏书”，规定在各种集会上，先让一个戴白手套的人把诏书放在一个盘子里，并举在头上恭恭敬敬地送给主持会议的人，再把诏书诚惶诚恐地朗读一遍，以求万民老实实在地当帝国主义的奴才。后来把“友邦”又改为“亲邦”，把日本的祖宗——天照大神也请到伪满洲国修建的建国神社供奉起来。一方面用这套虚伪的把戏欺骗愚弄人民；另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三千万东北人民。其具体做法是：

一、粮谷出荷，献纳牛羊。每年硬性规定每个旗县的任务，结果是人民被压榨得一干二净，农牧民粮食不够吃，只好以橡子面、糠窝窝充饥。

二、实行布匹统制。老百姓缺衣少被，冬天在炕上弄些软草取暖，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全家伙穿一件衣裳，轮换着出去大小便。

三、抓工挖煤。工人忍受不了日本工头的虐待而逃跑。为控制工人逃跑，日寇向旗县要带家眷的劳工。这样，不但工人自己

去煤矿连家属都必须迁移到煤矿去住。

四、特务横行。到处布置密探，一不谨慎，就被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警察、宪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千千万万蒙汉人民冤死在他们手里。一九四三年白城子宪兵队在扎赉特旗逮捕了几十个人，绝大多数没有回来。在扎赉特旗的关门山，宪兵队逮捕了几十个人，没有活出一个，连老族长图们满都护的女婿也被关押，图们满都护东奔西跑都没有营救出来。伪满初年，奈曼族发生了八仙筒事件，杀了十几个日寇，可是事后蒙汉人民被日寇折磨死的却超过一、二百。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侵略战争到一九四〇年已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败局，决定把兴安四省合并，成立兴安总省，集中力量筹划建立根据地。日寇看到各旗群众对庙会很重视，对葛根活佛十分尊重，尤其是一九四二年看到阜新巴达玛旺楚克庙的葛根嘎拉藏号召喇嘛去阜新煤矿挖煤，得到各地喇嘛的响应，先后有一千多喇嘛参加劳动这一事实，敌人决定利用葛根活佛的威望，诱骗群众为侵略战争服务。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们选择比较有名望并且听话的葛根胡图克，如库伦旗的迈达尔葛根，扎鲁特旗的莫林葛根等到西科前旗的葛根庙，由兴安总省主管宗教的厅长莎嘎拉扎布主持成立了喇嘛宗团。那时我正在科右前旗当伪旗长。一天早晨参事官浅野良三很急迫地向我说：“今天在葛根庙成立喇嘛宗团大会，请旗长去参加。”葛根庙离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六十华里，当我赶到庙时，根葛大会已经散了。我向莎嘎拉扎布询问成立喇嘛宗团的意图，他说：“就是让宗团与各旗的葛根活佛取得联系，宣传日本方面的意图，让群众供献物资，支援战争”。

# 诺门汗事件回忆片断

正珠尔扎布

## 一、诺门汗一带地形情况

诺门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海拉尔南方稍偏西约一百八十公里处。该地地形复杂，大小沙丘很多，起伏不平；不象巴尔夏嘎尔大草原那样一望无际。此处人烟稀少、寂寞荒凉，在横贯草原的哈拉哈河（宽100米至150米，水深1.5米至2米）前方的赫尔斯台河一带就是诺门汗。除了河流以外很难找到水源。虽然有详细的军用地图，但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一九三九年，日苏间诺门汗战争就是在这一带发生的。

哈拉哈河左岸，苏、蒙军方面的地形是以哈穆尔达巴高地为中心。沿哈拉哈河左岸都是高地，从高地后面直到苏、蒙军根据地塔木斯克宝洛克，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大草原，对交通运输方面极有利。从地形上看，对日“满”军方面是不利的。

## 二、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诺门汗事件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发生在“满”蒙（蒙古人

民共和国)国境贝尔湖东方,巴尔夏嘎尔附近。由于国境线的不明确,再加双方马群因遇暴风雪迷失方向而越境,在双方国境监视队间发生了争执和冲突。其后于五月十一日在诺门汗附近又一次发生了冲突,事件逐步扩大,因此,称为诺门汗事件。诺门汗事件曾一时中断。兹分做第一次诺门汗事件(五月上旬至六月上旬)、第二次诺门汗事件(六月中旬至停战)来叙述。

### 三、诺门汗事件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情况

上述这种国境线上的小冲突不仅是在诺门汗一带,伪满成立后,在西北国境线上,以及贝尔湖、哈拉哈庙一带也曾发生过。据日“满”方面的统计,伪满洲国成立后类似事件曾发生过四百余次。

早在一九三四年日“满”方面即向苏、蒙方面提出召开“满”蒙国境划定会议的建议。数次交涉谈判的结果,双方同意在满洲里举行“满”蒙国境划定会议,这就是所谓“满洲里会议”。会议前后开了半年多,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未能达成协议。

日寇在伪满成立不久,就怀着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野心。它的王爷庙(乌兰浩特市)陆军特务机关(历任特务机关长为泉铁翁中佐、金川耕谿大佐等),阿巴嘎特务机关、海拉尔特务机关(历任特务机关长为寺田利光大佐、亲薄正锐中佐、天野中佐等),都派出特务间谍专门搜集苏、蒙方面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

诺门汗战争失败后,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谿大佐向关东军建议,在王爷庙建立了成吉思汗庙。利用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

汗的心理，拉拢和吸引伪满洲国的蒙古人。企图借此使蒙古民族对日本和伪满产生好的印象。他们号召蒙古民族以成吉思汗庙为中心，团结起来。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从思想、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阴谋。

诺门汗事件当时，尽管日本和英、美之间关系紧张起来，日本“南进”和“北进”方针尚未确定，但战略方面仍指向苏联。这个事实由诺门汗停战一年多以后，日本关东军所举行的秘密特别大演习“关特演”就能看出来。“关特演”是历时一个多月的运输百万大军的演习，是规模巨大的一次对苏作战演习。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关东军规定了“国境纷争处理要纲”。“要纲”明确规定：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区域，该区防卫司令官可以自主地认定国界，遇到这个国界被侵略的时候，不要错过机会予以回击。

这样片面的决定，必然会引起国境线上双方不断的摩擦，日军可借以搜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政、经情报。但是苏联方面每次都调来优势兵力给日“满”军以打击，使日寇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日寇为了扭转挨打的局面，不得不逐次调兵遣将，遂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诺门汗战争。

一九三六年发生的所谓“凌升通苏事件”，也是为掩盖日寇在国境上被打败的事实而制造出来的。

一九四三年，驻齐齐哈尔日本军司令官阿南大将和驻五叉沟师团长笠原中将在王爷庙会谈时，笠原曾说：“我们（指五叉沟、海拉尔伪满西北部方面）是助攻，负担不大；东部（指绥芬河、宁古塔一带伪满东北部）才是主攻方面。”这番话可以看出日寇的战略方针（谈话当时我也在座）。诺门汗战争的扩大，为日军始料所不及。

## 四、日本军情况

诺门汗冲突一天比一天扩大而紧张起来。日军动员了小松原第二十三师团、冈崎部队、山县部队、长野部队、古闲部队、片山部队及其他部队三万多人。但苏、蒙军方面增加了更优势的机械化大部队。日军因而又调来了大批军队。如：驻公主岭的安岗战车兵团、野口雄二郎的飞行联队、本国千叶县的鹰司炮兵旅团等和其它部队。

激烈战斗地区是：付伊高地、诺若高地、赫尔斯台河两岸。

战线日益延长，兵力不断增加，日本关东军增派了关东军参谋部卓四郎大佐和迁政信大尉担任现地作战指导参谋，采取了攻势。八月战火激烈化，双方投入了大量军队，成为一次现代化的战争。

## 五、伪满军情况

伪满军方面参加战争的有：伪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中将指挥的乌尔部队，军事顾问市村中佐、参谋长丹巴上校、作战参谋南博中校，配属兴安骑兵第一团（团长敖瑞平中校）、兴安骑兵第二团（团长何维成少校）、兴安骑兵第七团（团长郭文通中校）、兴安骑兵第八团（团长索特诺布上校）等部队，担任右翼作战。

临时编成的、由野村登龟江中将指挥的兴安师担任左翼。该师军事顾问为野田又男少佐，参谋长后薄外马上校，作战参谋曾根崎

清臣中校，情报参谋堀内章少校，专属副官中尾中尉，配属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高桥上校），兴安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团长田中上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团长金永福中校）、炮兵团（团长平川森中校）和迫击炮团（团长中野上校）等部队。

伪满军后方补给点是阿尔山。兴安骑兵第十团受阿尔山兵站监部指挥。乌尔部队和兴安师的士兵全部是以蒙古族人编成的。其他参战的部队还有：伪第三军管区石兰斌少将指挥的第三教导队、炮兵营（营长秦薄中校）和第三汽车队等，这些部队是以汉族人编成的。

诺门汗事件发生时，我在奉天（沈阳）伪陆军中央训练处专科学习。由于诺门汗战事扩大，专科学习中止。由兴安军管区派来的日本同学曾根崎中校和堀内少校分别被任命为新编兴安师作战参谋和情报参谋。蒙族同学哈斯巴特尔（白云航）中校、阿勇巴图少校、胡克巴特尔少校、正珠尔扎布上校和白俄同学郭索夫中校等被派往新编兴安师司令部实习战场参谋勤务。哈斯巴特尔中校被留在王爷庙，办理收容归还兵（逃兵）工作，其余四人到战场实习。我因病晚到半个月。我们四人的任务是实习性质，不负任何具体职责。

## 六、战斗片断

我于七月中旬到达左翼前线，不到两周，就随同兴安师撤退。因此，我所知道的战斗情况是很有限的。仅将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叙述如下：



## 1、士气不振

兴安师司令部设在日军左翼赫尔斯台河左岸三角山。在我到达以前，全线有过相当激烈的战斗。那时，骑兵第四团已溃不成军，各团士兵也三三、五五的脱离战场。有的奔降苏、蒙军，有的跑回家里，也有的拉出去为匪扰乱地方。某军官对我说：第四团准备加入战斗，突然遇到迅雷轰击，士兵认为不祥，意味着天诛，不能打仗，人心惶惑，不战自乱。这时郭索夫中校遇雷击，坠马折腿退到后方。在第一线的骑兵第五团的得勒格少校、王吉尔上尉投降苏、蒙军。石兰斌所部的一个营打死日系军官集体投降。

我去司令部途中，在后方补给所看见了高桥团长。他正喝着酒，对我说：“光杆团长了，蒙古军都跑光啦！”我没有详细打听，就上司令部去了。到司令部一看，没有什么战斗情况，唯有断断续续的炮轰声。第二天，我到第一线视察。秦团长等人叫苦连天地说：“每天都挨打，无法还手。”又说：“士兵毫无斗志，每天都有逃亡，无法收拾。得勒格、王吉尔的投降，对军心的影响很大。”

兴安师司令部，每天受苏、蒙军方面的定期炮击。敌人的炮火集中在早饭、午饭、晚饭的时候，每次就是数百发。后来我们抓住了这个规律。一到时间各自隐避起来，没遭到什么严重损失。我在堑壕里有时露出头看看。我们司令部设在一个小沙丘（三角山）的反斜面，对敌成为死角，炮弹很难击中。后来敌人打来了榴霰弹。这不象着地爆炸的炮弹，它在我们头顶上开花，霰弹如雨点般下来。我们的单人堑壕没有盖，很难躲避，威胁较大，精神甚为颓丧。

苏、蒙军还不断地用冷枪和长距离炮来轰击。我们山炮连也  
有时还击，但打不到敌人阵地，反而向敌人暴露了目标。因此，  
我们干脆不让山炮还击，把山炮连撤离司令部远处呆着，以免引  
起敌人轰击。

## 2、空战

有一次，在阵地上空，双方展开了飞机编队的空战。不断地  
响着象炒豆似的机关炮声，双方你追我赶地在空中乱成一团，分  
不出敌我。我们被战斗吸引着，地面部队的枪声也听不见了，好  
象双方都停止了射击，进行观察。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这样壮  
烈的空战，一时忘却了自己在战斗中。霎时间，一架飞机在空中  
爆炸，燃烧成了几块大碎片，好象是烧着了的纸片似地落下来。  
空中战斗结束了，看到一个降落伞降下来，有一架飞机绕着降落  
伞来回盘旋，看不出是敌机还是我机。我想大概是掩护这跳伞的  
战友吧。

不一会儿，这架飞机向西北日军后方阵地飞去，我才晓得这  
是日本飞机。

降落伞向我方阵地慢慢地落下来，不知落在什么地方。过了  
三十多分钟，我们前线部队把这个降落伞送到司令部，说：“没  
有人只是这伞落在我们的阵地。”看后认识是苏联的，因上面有  
苏联字。我们的判断是：这架围绕着降落伞盘旋的日机是恐怕降  
落伞落到敌人阵地，而用两翼切断了吊绳，把人给摔死了。

## 3、野田顾问负伤，我幸免于难

有一天午间，我在野田顾问的单人堑壕门口（他的壕不象我  
们的圆筒式壕），坐着闲唠。一看表快到十二点了，我说：“快来

了（指敌人的炮轰），回自己的窝吧”。站起来跑回自己的圆筒壕。刚刚蹲下，按时的炮弹洗礼开始了。我这壕比野田顾问的壕处在更大的死角位置，非常安全，不是由空中直射下来，越过山头的炮弹是打不着的。几百发炮弹响后，敌人炮击停止了。外边有人吵吵嚷嚷。我钻出来一看，许多人围着野田顾问包扎的包扎，抬担架的抬担架，野田顾问负伤了。原来，我刚走不久，一个炮弹正落在我曾经坐的那个地方，把野田顾问的右胳膊炸个粉碎。后来他对我说：“你真是幸运儿也。”

#### 4、日军观测气球被击毁

兴安师的右边是日军长野部队（联队）。在赫尔斯台河右岸，日军炮兵升起了一个炮兵观测气球，离我们司令部不远，看得很清楚。

某日晚饭前还不到薄暮的时候，我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抬头向上空看，没见什么，再往下一看，两架“阿布”（日语炸蝻）式飞机，高约百米，低空顺赫尔斯台河直奔气球飞来。我以为撞气球呢。可是它离气球一、二百米就折回去。它刚转头，气球就燃滚起来，连吊篮也掉下来了。这是敌机用烧夷弹射击，把气球毁掉。这“阿布”来得突然，日军束手无策。“阿布”扬长飞回，日军高射炮队来了个马后射击。日军高射炮弹，都爆炸在空中千米以上，由此可见，日军高射炮队的狼狈状态。

事后听说：气球吊篮里有三个观测员，一名腿折断，一名丧了命。日军计划把哈尔滨消防队的折叠式铁梯拿来观测，可以想见日军装备的落后情况。

#### 5、日机盲目轰炸，野村师长等人伤亡

一天午前，由西北方向飞来九架编队的轻轰炸机。飞得不高，我们一看就认出是日本飞机。我认为是要轰炸我们对面的敌军炮兵阵地的。不料，这群飞机向我们直冲下来。我们大喊“不好！”赶忙四散钻进单人壕里。中尾副官拿起日本国旗，拼命左右摇晃。说时迟，那时快，轰隆隆的几十枚炸弹落到我们的阵地，真是地动山摇，飞砂走石，人们满身都是沙土。在硝烟弥漫中，飞机过去了，我们走出来吵吵嚷嚷，埋怨日军盲目轰炸。我头一次参加实习就挨了“友”军的轰炸。

结果，伪师长野村脖子左边受了擦皮伤。阿勇巴图少校刚要猫腰钻壕，没来得及，后脊梁上也受伤。少年队士兵被炸死了二三名，数名负伤，军马死伤十余匹。野村师长和阿勇巴图少校，借口受伤脱离了战场。

## 6、伪兴安师撤退

受了这次轰炸，伪司令部混乱不堪。第一线各团残余士兵老是挨打，毫无斗志，三三五五，不断脱离战线，无法收拾。后来连顾问、司令官也没有了，更是无法坚守阵地。只好把这种情况报告日军。日军司令部答覆一两天内调派日本部队来接替阵地，要求我们坚持两天。由于军心慌乱，后薄参谋长等号召死守阵地，但又说：“我们一两天就交代阵地，无论任何人愿意撤退的可以撤退。”我心里想，只是一两天，何必先退。堀内也对我说：“你可不能退，司令部没有一个高级蒙系军官就更糟了。”我也认为：我要撤退，日本对我的信任就扫地而尽了，退不得，就决心留下来。

后来论功，最后坚持阵地的司令部人员都发给“武功章”。我也列上了名，得到了三等铁质“武功章”和奖金五十元。过了

两天，日军接防，兴安师交代完毕后，翌日全部撤离了战场，我也放下了心。这是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情况。

日军右翼乌尔部队斗志也不高。一次，乌尔金司令官和参谋长受敌人战车的攻击，乘汽车溜回海拉尔，以后又回战场，最后到停战时，与日军一同撤回海拉尔。据说：乌尔部队兴安骑兵第一团团长敖瑞平的先遣第三连的三分之一被歼灭，然而，敖团长亲自率领的部队毫无损失，因有从前线擅自退却的嫌疑，战后，被军法官审讯后转职。

### 7、蒙古叛徒宾巴大尉丧命

在战斗当中，日军利用曾由蒙古人民共和国逃亡在伪满的蒙古叛徒宾巴大尉，通过扩音机向苏、蒙军广播，企图扰乱对方军心。不料在播音中就被对方炮火轰毙。

宾巴大尉逃亡伪满后，日本关东军如获至宝，把他豢养了一个时期。

### 8、所谓“归还兵”

在参战时，伪满军有的投降苏、蒙军，有的逃回家乡，有的拉出为匪。伪满当局为了遮羞，不说逃兵，称为“归还兵”。日伪军警对这些“归还兵”大规模逮捕，交付军法会审判刑、屠杀。最惨的是：日本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耕箝中佐亲自带队到伪兴安西省查不干庙，屠杀了二十名“归还兵”。对“归还兵”的处理，的确成为伪满军政的一件大事。当时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 七、诺门汗战争结果

伪满兴安师撤退后，在巴尔夏嘎尔草原，日、苏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的飞机和战车构成了立体战。战场上出现了火焰喷射器。日军的战车兵团的战车型体小，性能不良，故障频繁，与苏军相形见绌而被歼灭。日军穷余之策，用火焰瓶，抱着炸药肉搏斗，伤亡甚重，日方准备从日本内地调旭川师团和札幌第七师团（新式装备师团）参加作战，还没来就停战了。

诺门汗战争的规模相当大，以巴尔夏嘎尔草原为中心，双方隔着哈拉哈河，打了几个月，最激烈的是八月。仅这一短期间的激战，据日方正式发表，伤亡一万八千余名。当然这是打过折扣的数字。

## 八、诺门汗停战

原来，日军方面没有预料到苏、蒙方面有这样强大的机械化战斗力。日本当时还在研究着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有人说：诺门汗事件是日本“南进”或“北进”的试探。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侵华日军陷入泥坑，拔不出腿来，所以日本不愿在诺门汗方面作大量的消耗，陷入大规模的战争。因而，日本求其盟国德国向苏联提出讲和。这时希特勒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量军队开进捷克和波兰。据说，德国在苏联国境已集结了百万大军，苏联在德国的威胁下，接受了对日讲和，九月十五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

诺门汗战争的失败，日本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责难军部。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廉介被免职。小松原师团长在巡视阵亡部下的坟墓后，自杀而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我在苏联伯力（哈巴洛夫斯克）时，在日本将官俘虏收容所里，听后宫谔大将说：“日本当时不愿在这方面（指诺门汗）作大规模战争。因为，日本在中国陷入了泥坑，拔不出腿来，顾不了两面作战。但是苏、蒙方面不放松，牵制了日本。”因此，可以说，诺门汗战争在中日战争中起了牵制日伪军事力量的积极作用。

停战以后，伪满军事部有关人员，在长春开会讨论诺门汗战争时，野村师长大骂伪满军是杂牌军，不能使用等等，而引起了一场争论。

后来伪满军事部编辑了《诺门汗战史》一书。

# 诺门汗战争的回忆

金永福

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占领我国东北建立了伪满州国以后，严密封锁苏蒙边界，并想进而入侵苏联。遂于一九三九年发动了诺门汗战争，结果遭到了严重挫败。

诺门汗位于喀尔喀河东北，有沙丘、松林和柳树，地势坎坷起伏，适于用兵作战。过诺门汗即属蒙古边境。诺门汗战争爆发前夕，双方边哨不断冲突，伪满国境部队郭文通带领的六团首先向对方进攻，日伪逐次增兵，以致形成了严重战局，日甚一日。很显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侵入，并非被动反击。

诺门汗事件发生后，由“北满各军区”抽调蒙汉兵力五千余人，新成立了精锐部队——“兴安师”，师长为日本人，叫野村，参谋长也是日本人，师下面设有六个团，我任其中的教导团上校团长。

兹将本人目见的真实情况，逐日所记，写在下面。但由于水平所限，难以系统全面地反映当时情况，遗漏、缺点和错误之处，希知者予以指正。

## 伪兴安军参加战斗的经过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我与儿女、妻子告别，远离家园。兴安军官学校骑兵教导团



整顿队伍，要在王爷庙（按：即乌兰浩特）站上火车，到站的时候，甘珠尔扎布少将和泉顾问（日本人）已在站内等候送行。我在站台，在少将、顾问面前向全团官兵发表了一则简短的讲话：“本教导团奉命开往边境作战，官兵一德一心，必以无限的忠诚为国献身，大败敌人，早日凯旋。”

于是乘有棚货车开赴阿尔山，当日下午九时抵达该地宿营。

### 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晨，我团全副武装骑着马耀武扬威地由阿尔山罕达街进发。去罕达街的不仅我们一个团，还有其它数团和日本军，团与团争先行军，日军为一坦克师。车马奔腾，坦克隆隆，即使并肩而行也难以听清身旁的话语。

几天来，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衣被淋湿，又睡在湿漉漉野地上，士兵实在受苦。我们正在前进，忽然高空敌机来袭，炸毁了辎重车辆，有些车陷在泥里出不来，路上困难重重。

### 六月二十七日

晚四时许，我团到达罕达街，该地一片松林，连绵约数十里，真是望不尽的树海。树下各种各色的野草鲜花，好象人工织成的锦绣地毯一样，既软又滑。高大的树干，伞状的枝叶可以为我们遮雨。我们到此大有身处神仙境界之感。树根附近，又有天然蜂窝。丘陵起伏，彼此不能相望。我同团副、副官、各连长等视察了各连露营状况，指示了注意事项。如：除去传令兵和勤务兵以外不准乱走，不许喧哗，休息时枪不离手，夜间不准点灯，时时作好战斗准备等等。当时我看到官兵们都忘了连日行军的困苦，高高兴兴地，有的拾柴点火，有的准备做饭，有的烤衣服，有

的擦枪磨刀。我们巡视一周，回到团部宿营地休息。翌晨醒来，只见云雾弥漫，炊烟四起，忘记了大敌当前，身在战场，悠悠自得。由于连日阴雨，气温降低，颇似深秋。

兴安师官兵开始潜逃。其因素：兴安师是由各方面抽调而临时编成的，官兵之间相互多不认识，互不托底，没有感情；其次，马为骑兵之活武器。未经训练的生马，如何能用于战场。兵于马之间也是不托底，无感情。再有，我们使用的枪械多为日军用过的、陈旧而不中用的东西，因此瞄不准，打不远。加之，苏蒙军的强大火力也在日益动摇着兵心。士兵们心灰意冷。同时，我军中的日本人多系步兵科退役军人出身，不善使用骑兵。在战斗中，不能充分发挥骑兵的特长与机动力，不使用预备队。战时把全部兵力一举投入第一线。官兵们提心吊胆，唯恐一旦失利，无处逃命。由此种种，加速了士兵潜逃的决心。

### 六月三十日

连绵数日的雨停了下来，露出了蓝天。这时，师部发出命令，为配合日军作战，全军将进攻霍勒斯泰河两岸的敌军阵地。进攻的目标是霍勒斯泰河北岸的三角高地。行军的顺序为：最前面是兴安军官学校骑兵教导团，兴安骑兵五团为左翼纵队，兴安骑兵十二团为右翼纵队，接着就是骑兵连、司令部、炮兵团、迫击炮团速射炮连、骑兵四团，依次前进。

在这行列的前方派出军官斥候（亦称侦察）一组，在它的东西方派出警戒兵各一排，按这顺序，在罕达街松林右侧全军集合。午夜出发了。出发前，本团团副日本人津田中校，集合各连，抽出二十多名积极分子，编成了视死如归的勇敢无畏的自愿决死队。他们各持爆破地雷，在阴沉沉的漆黑之夜，在团的队伍中跟

战友们一同行进，如发觉敌情，便当先跑出队伍拼命。

紧张地行军一夜，到了拂晓，出现在面前的是广阔的不毛之地。全军停下来歇息，我席地而坐，仰面看看太空，望望左右远处，老雕在空中飞翔，时上时下，好似见到了坐在地上的手拿武器的屠杀者而展翅飞离，咳！禽兽如此，何况人乎？这里，虽说是不毛之地，但也稀稀疏疏地有红花，放着绿叶，我身临其境，接触大自然之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时觉得心旷神怡。但又想起了这次战役，何日终了，生灵遭受如此涂炭，心灵深处，百感交加，不禁叹道：“人生究竟为了什么？”

### 七月一日——三日

今天全军来到汗山。汗山，又名达尔汗山。据传说，在宋代，成吉思汗曾在此打尖。这是否属实，不得而知。各团到山北，当即分散驻扎，派出人到山南挑水和饮马，不料突遭袭击，后在我方炮火掩护下，他们才得以完成任务回来。

翌晨，由师部集合参谋、团长、团副等，命令仍向三角高地前进，遇敌则打，边打边行。出发前又编制了左右翼纵队。左翼包括兴安骑兵十二团、四团，迫击炮团，右翼包括兴安骑兵五团、骑兵连，司令部、炮兵团、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这二翼的总指挥是十二团的田中上校。在左右翼前方有斥候兵各一排，左翼斥候兵由胡和巴特尔少校率领，右翼斥候兵由阿勇巴图中校率领。斥候排于上午五时出发，其它人马在一个钟头以后出发，师长走在最前面。

午间，天气骤然变化。北方天空浮起了乌云，刹那间遮盖苍穹，雷声隆隆下起了阵雨，霹雳一声巨响，劈死了一名少尉和二名士兵、二匹骏马。雨过天晴，我们继续前进于起伏不平的沙丘

草原中，那里丛生着柳树。此时，敌人的炮声越来越近。于是又编制了这样一个纵队，即：十二团领头接着就是四团、五团、师司令部、骑兵连、迫击炮团、炮兵团等。兴安教导团则做为预备兵团走在纵队的最后。在黑夜里，各团之间有联络兵联系；但我们的教导团在后面走来走去却见不到联络兵了。由于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停在一个地方等候天亮。这时下起了雨，拂晓下了浓雾。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清。少顷，旭日东升，浓雾已散，在西南方炮声震天响，我们知道走在前面的士兵和敌人已进入作战状态。

七月三日，胡和巴图尔少校和一日本军官来到我团驻扎地，传达了司令部的命令，着将我们的预备部队——教导团的一半人马调到纵队的前头，叫他们由马背上下来，乘卡车奔向前沿阵地。听到这个命令的第十二连连长（日本人）不高兴地问我：“为啥调向前沿阵地？”我答道：“不详细，只是遵命而已。”又说：“你要想弄清楚，就去问津田中校好了。”那连长还问我一句：“如果是团长用这批人马的话，该怎么用？”我郑重地说：“骑兵不该离开他们的马，骑兵离开了马就好象鱼儿离开了水。因此”我心里是不同意我们的半团人离马乘车而去。在起伏不平的阵地上没有马的士兵是打不好仗的。”这段话是由副官达斡尔人鄂庆顺翻译的。

我们的半团人已乘车上阵了，其余的人们骑着马在纵队的后面走。这一天，天气炎热，口渴舌干，说起话来都吐不出沫儿，加以强行赶路，汗流夹背，一个个疲惫得很。我们过了平原，快马加鞭，到了一个丘陵；丘陵之南被敌人控制。炮弹如雨似雹不断袭来。我团官兵（包括我在内）冒着弹雨，冲向敌阵。这时我团中尉多文秀负了伤，但他不听我的劝阻，坚决要求不下火线。

他说：“这些士兵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目睹他们，我怎能忍心离开火线呢！”我听完这话十分钦佩，不得不批准他的要求，但对其伤口仍放心不下。

多文秀是达斡尔族人，长得身高体壮，长瓜脸，眉秀目明，是个很俊的青年，是个好样的。

师司令部下达命令，叫我们教导团由师的后面迂回过去，向师部西南方的敌战略高地进行黎明攻击，以保卫师的所在地。当即对各连增发了机关枪和速射炮，我们接受了命令和武器，饿着肚子在漆黑的夜晚前进。

#### 七月四日

黎明时分，我军占领了这一战略高地。

这次进攻，我团排长王丹负伤，便把他送回后方医治。士兵中被打死二名，负伤数名。王丹是蒙族人，身体健壮，容貌端正，意志坚强，真诚和蔼，敬爱母亲，是一个好青年。

上午九时许，我团用二尊山炮由高地射向西南方的敌人，但炮弹半路自焚，射不到目标，可见是些破旧不堪的炮，把我们弄得哭笑不得，有的士兵骂道。“他妈的，要这干啥？丢了它吧！”津田命令把这二尊山炮藏在高地后面，以备从背后出现坦克时，在短射程内使用。因为它们射不到远处，可是还能射到近处。轰隆隆、轰隆隆响个不停，苏联的榴弹炮从远处排山倒海般射来了。山炮连长（日本人）的二个右手指被打断，十数匹马死掉，士兵们牵着马躲在战壕里，没吃没喝的。有的躺在战壕中沉睡，叫醒则起来就跑，如痴似狂；有的耳朵震聋了，还有的象傻子一般呆呆地坐在那里；军官也提心吊胆，狼狈不堪。

在这猛烈的炮火轰击下，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不知不觉地由

战壕探头露面，因此伤亡很多。

我为了保全性命，死死地躲在壕中一动不动，一切指挥全由津田中校来做。

根本原因，依我现在的认识来说，是由于侵略者不得人心。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诺门汗战役是非正义的。

### 七月五日

清晨，炮声不太响了，但是团里的士兵仍有潜逃的。苏蒙军的人数在增加，可能派来了援军。突然在空中出现了苏联的百余架战斗机，日本的飞机也来到了。它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苏机左退右攻，升降翻转，灵活已极，犹如海东青之搜捕地面上小动物，飏的一声疾降而来，机关枪在猛烈射击，燃烧弹在燃烧，真是打得落花流水。

过半小时，空战停了，苏机不知飞向何方。这次以空战为主，地面部队没有交战。

正午，天气酷热，我们在树荫下乘凉。此刻，又响起了炮声，但十数发以后却不响了。过了一会，敌人的步兵一个个排成纵队攻上前来，用机枪抵抗了几小时后撤退。晚间检查队伍，二连的庆巴图中尉和山炮连的喇嘛扎布中尉负伤，士兵伤亡甚多。庆巴图与喇嘛扎布中尉均回王爷庙治疗。

苏蒙军由飞机散发了蒙文传单，内容大意是：你们不要当日本法西斯的炮灰，蒙古人不能杀蒙古人，赶快杀掉日本军官，前来投降吧！保证送你们平安回乡，切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别上它的当，再别参加战斗了……。鬼子当然严禁官兵看这些传单，而我呢，是由一名士兵的手里看到的。夜间，运输队送来了半生不熟的糜着沙子的小米饭和高粱米饭。炊事员距我们十五、

六公里远，白天因敌人袭击，不能送饭来。由于敌人的封锁，从后方供应粮秣日有困难，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愈益变心，每夜三三五五地潜逃，有增无减。

### 七月六日

今天由师部来令，叫我们从高地撤出转移到东边，以援助四团作战，我们去到那里；战斗不到一小时，我团一连连长扎木彦扎布少校被机关枪击断三根肋条，心肺都露了出来。伤很严重，我耽心他要死。但经治疗，数月内便封口，能够上班了。该连一排排长诺尔布仁钦少尉也负重伤。医治无效，在当夜死去，使我悲痛不已。

于是我没让士兵给我挖“躲身坑”乃决心亲自上阵，杀敌复仇。可是津田中校不同意，他说：“您不能亲手放枪，而是要集中精力，进一步有效地指挥放枪的人，决不可跑上前去。”我一时的激愤消失了，遂找一个洼地挡身而坐。此时，机枪声哒哒不停，好象下雨地不断打来。

我方开始反击了。机关枪，掷弹筒……其声响彻原野、高地或丘阜，士兵们坚守阵地，一步未退但也寸步难进。多数士兵愤恨地一直打到傍晚，见此情况，我对津田中校说：看吧！士气又上来了，绝大多数士兵正在火头上。我带领一排冲入敌阵中部，别的连排仍由原地照旧猛射，以援助我们，你看怎样？他表示不赞同。我又提议：后退数公里占据有利地势，重整队伍再向前猛攻。这个，他还不赞许，便说：“司令部的一步不可后退的命令，焉能违背。”往下我不开口了，心想你要坚持下去，那么我也能熬过来，用兵，难道不考虑地利吗？这绝不等于退却。

须臾，津田中校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士兵的觉悟实在高，听说，他们受伤被俘的时候，割自己脖

子而死，这真不简单啊！不是一年半载的训练、教育所能办到的。”

正在这时，枪声愈密，战斗更加剧烈，由于新的任务，我们的谈话中断了。

### 七月七日

东方刚出现鱼肚白，部队全体士兵还在战壕里打盹，团指挥部忽然接到兴安师司令部的“关于教导团立即撤回五公里，占领战略高地牵制敌人，同时待机反击敌人，决勿后退”的紧急命令。

传达命令的情报参谋堀内章少校（日本人）惊慌失措的对我团团副津田中校（日本人）轻声耳语：“现在兴安师直辖的五团、四团，十二团、迫击炮团等部队，业已战败崩溃，不知下落。敌人把咱们已经三面铁桶般包围起来了。请您赶快撤离此地，否则有全团被歼灭的危险！目前师司令部已开始撤退。”虽然两人耳语声小难以听清，但我团副官（兼翻译）鄂庆顺中尉借请示重要军事情况为由，而接近他们，听到了这些全师要溃退的消息。鄂立即跑到我们的面前报告说：“兴安师所属各团战败崩溃，同时和师司令部已失去联系。目前除我团（教导团）外已没有作战能力的兵力了。请团长当机立断不可犹豫。”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措，真有一筹莫展之势。

经长久考虑和研究，决定按照师部的命令，作为我团行动指南。因撤退也是死路一条，倒不如顽强的战斗到底，于是不顾团副津田中校的态度如何，我亲自进行战斗布署。首先派遣一个机枪排埋伏在险要地点，掩护部队转移，另一方面派鄂庆顺中尉调回在右线和敌人作战的第二连。鄂联络后，归队途中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腿部负伤，几乎摔下马来，面色苍白，飞奔而至。视



此，我立即跳下马来，拿出事先预备好的药、布给他上药包扎。事后，我命令他到后方医疗养伤，伤愈不必再来。那时我的想法是：设法使士兵脱离战场，让他们重见天日，和双亲妻子团圆，避免无辜给日本人当炮灰。因此嘱咐他伤愈后不必再来。但鄂庆顺负伤回后方对我来说是有困难的，因那时我已四十五岁，难以学习日语，故叫鄂当翻译。他走了，无疑给我添了麻烦。

我团迅速进到战略高地，占领战事掩体坑，做好战斗准备。

津田中校选好作战阵地，把两门山炮、三台速射炮、四挺重机枪，都很周密的安排妥当。但山炮连连长（日本人），因战败负伤，回了后方。数日来，敌人攻势勇猛，战斗激烈，在日夜激战中，全团官兵皆奋勇作战死伤颇多。故山炮连连长之缺，由上士班长代任。领导全连作战（掌握用八只骆驼运的两门山炮）。

我团所占的阵地，地势险要，山谷崎岖，树木丛生，深沟高垒，便于隐蔽，即使有装备精良的坦克，也难以随意冲撞。况且有能埋伏五百人的险要地带。由于留守后围一排士兵在高桥（日本人）中尉率领下战斗失利，死伤颇众，几乎全排被歼，唯高桥排长逃脱其难。从此我团士兵情绪低落，开始溃散，逃散的士兵满山遍野。正在这时，突然从左侧出现了几群敌人的步兵，约七百多人。同时用远程射力的步枪和机关枪向我阵地猛攻，子弹如雨，从头上和耳边擦过。几处敌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同时从南面来了敌人的大队骑兵，约三百人向我团正面压来。激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在这紧要关头，两门速射炮又被打坏，不能射击，山炮弹尽。上士班长急得高声对我说：“团长！山炮弹尽！敌人若攻上来，怎么办？”当时我很怕此话被比较接近的敌人听去，故意高声回答说：“炮弹在我这里，快拿去射

击敌人。”这时战斗更加激烈，血肉横飞，驮山炮的四只骆驼被打伤，鸣叫如人，使人非常怜悯悲痛。牵管骆驼的士兵皆被炮弹炸死，骆驼狂奔乱跑，有的竟跑到敌人队伍里去了。战后把此地命为骆驼山。

忽又有敌三百多骑兵由正南方向冲到，来势非常猛烈。原十二团战败溃散后，中尉排长单福祥带着十挺机枪来到我团。单见情况不好，很快将机枪驮在马上，准备退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严令单福祥用机枪射击，当时单中尉不得不瞄准向猛攻我团的敌骑兵部队进行射击，迫使敌人滚下马来。这时双方的战斗仅距离有三、四百米之远。正在双方争夺战略阵地、弹如雨下的时机，津田中校对 我指手划脚的叫我迅速隐蔽到战壕内。但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五十多名士兵均不怕牺牲，勇敢和“敌人”战斗，当指挥的何忍离开阵地，贪生怕死的隐蔽起来呢？于是，我继续指挥战斗。敌人兵力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烟尘盖天，天地昏暗，实为可怕的一次战斗。这时津田和他的勤务兵来到我面前，哭泣着对我说：“团长！现在我们怎么办？”我非常生气，驳斥他俩说：“只要我在，战斗就能胜利，阵地就能守住，何惧之有？”说话间，忽然从左侧山岭中出现八辆战车，后有无数步兵排山倒海似的向我阵地急攻。当时我团兵力单薄，武器有限，看情况是难以抵御，我唯有动员全体官兵下决心死守阵地。我说：“战也是死，退也是死，就不如我们战斗到底。”于是全体官兵都郑重宣誓，要决一死战。这时，硝烟遮蔽天日，目不能视出几十米之外。炮声、枪声震得地动山摇。战车、装甲车横冲直撞，犹如疯狂的野兽，使人胆战心惊。我愤慨地命令战士说：“猛攻战车，打倒这几个野兽才能胜利。”士兵们飞快地拿起爆破药包，以惊人的速度和动作跑到战车前，

把炸药包塞到战车底下，在炸药包的爆炸声中，战车完蛋了，战车上的敌人也举手投降了。这样连炸敌人三辆战车。其余的战车不敢向前，纷纷溃退，逃之夭夭。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战车的攻击。这时虽说炮在吼，枪还在响。但敌人的进攻稍有松懈，趁这机会，我们到战斗工事里视察战斗情况和慰问受伤的官兵，死伤颇重。其中的伤员喇嘛松中尉难以行动。但我到其旁时，喇中尉坚持坐起来和我对话，当时我安慰他说：“你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回到后方安心养伤，治愈后也不要再来了。”但他仍然坚持要求继续上阵作战。

全团官兵畅谈战胜敌人的作战经过，此次战斗敌我兵力悬殊，敌众我寡，苏蒙的骑兵三百多名，战车八辆，步兵七百多名，其兵力较我教导团多十倍。因我团败散的占半数，侍候伤员和看管战马的士兵有五十名左右，作战人员仅有五十名而已，若看兵的多寡，就绝无战胜的可能，大有战败身亡的危险。甚至有全团被歼的危险。但我们全体英勇奋战的结果，以弱制强，以寡敌众，反败为胜，而且死亡率也很少，大振士气，增强了防守阵地的决心。

午后四时，机枪仍然连续响着，西北方忽然炮声隆隆，枪弹横飞，山谷中出现一队炮兵，我急忙用望远镜看，看出似乎是日本炮兵。原来是团副津田中校特遣其副官和日本炮兵部队取得联系，请来的救援。不久，即响起加浓炮轰击敌人隐蔽所的爆炸声，敌人的机枪也响了。到这时我才觉得心情舒畅一些。

晚六时许，尘土四起，似有大队人马在行动奔驰。看到这种情况，我估计是敌人调动兵力，或者撤退，趁此良机进行袭击，必获全胜。我没和战壕里隐蔽的津田中校商讨，便采取行动。因为在这次战斗中损失很多人马，心里激愤的很，我提枪上

马，动员士兵：“敢追袭敌人的，跟我来！”话音未毕，有十二个战士骑马跟踪而来。我十三骑正往敌人方向追击，恰逢我兴安师部派来的应援部队百余人迎面而来，先头领队的是我老战友鄂文良少校（鄂是勇敢机智的壮年军官）。见面后，我要求鄂文良和我一同追袭敌人，同立战功。当时他征得田中修一准许后，率所属三十名士兵接踵而至。我们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敌人的右面战略高地，战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击溃了敌人一部分，打死打伤的很多。我方只伤一兵。正在酣战之际，天色已黑，我团副官找到我建议说，现在天已昏黑，作战不易，而且孤军深入，于军不利，不如暂时撤退，视察战场士兵为好。于是我们开始清除战场，将伤员护送后方治疗，把死尸送回后方妥善安排。

午夜时，接到兴安师部的命令立即执行，调转到应援部队去。连续五昼夜的作战（因运粮部队被敌人机枪阻击，断绝交通，以至粮尽水竭），士兵饥渴困乏已极，多为睡倒摇而不醒，沉睡如醉的状态。

在整个诺门汗战役中，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忘我奋战的时候，过去曾有过日夜作战的时候，那大多是在深沟高垒，战壕里隐蔽着的。但日本人的精神是：宁可战死，不可撤退半步的诺言。我蒙兵也来尝退却过。

战后我团移至郑家屯。在这里由兴安师师部召开团长会议，着重总结诺门汗战役的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

追查战士溃逃的原因：1、在剧烈的战斗中连续几天吃不着饭，喝不着水。2、军马因平日训练不足，在战斗中乱蹦乱撞，很难控制。3、官兵互不认识，难以了解情况。4、将骑兵当步兵对敌作战，故而施展不开平日训练战

术的能动性。5、士兵的家多接近战区，到家后能够隐避遮瞒，故潜逃者多。

会议进行当中，一名少校副官把我领到礼堂。我进去后，见到一少将立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张纸，我因不知何故，只施军礼相见而已，我正在低头听命令时，少将老爷开口下令说：“金永福团长在诺门汗战役中，因为领导不好，军纪不强，使之战败，兵力溃散一半。从而给予扣月俸三分之一的处分。其个人作战勇敢，能杀退猛攻的敌人，守住阵地，有功可赏，故赏给三等武功章”（这次普通兵、班长、军官得到武功章的也很多）。

关于日军少将说“领导不好，军纪不强，使之战败，兵力溃散一半”之事，情况是这样：

那天晚间我团战斗胜利结束后，由于伤亡较重，奉命撤到补给所整顿队伍。行军中由高桥（日本人）中尉排长率一个排持轻机枪数挺为后卫。士兵们因恐蒙军骑兵追袭，硬不听排长约束。在散开之后，纷纷逃跑，只剩下高桥排长一人。一连七班长小喇嘛看到高桥排溃散，他就带领全班随之逃跑。小喇嘛班逃去后，其它各连士兵多人亦随之而散。一时满山遍野全是逃兵，约有二三百人之众。到达补给所后，检点人马，全团失去约半数兵力。次日施行论功行赏，并检查士兵潜逃及战斗中伤亡情况和原因。

小喇嘛沿途汇集各团逃兵。最后约聚有五百余众。他们狼狈逃窜，急急如丧家之犬，日夜兼程，逃向深山密林之中。因恐追兵跟踪，不敢通行大小道路，只向人迹不到之处钻进。数日后，由于缺乏粮食，不得已奔向白阿线之白狼车站。当地官民怕他们抢夺，故一面表示欢迎，一面通知王爷庙兴安军官学校。顾问泉铁翁大

佐接到此信，立即命令哈斯巴图中校携带大批慰劳品前往收降。哈中校行至归流河，与小喇嘛队伍相遇。以前师司令部曾经派出数批军队进行收容，但小喇嘛坚决不从。官布扎布上尉因为不善说辞，态度生硬，曾被叛兵刺杀。哈中校与小喇嘛等会见后，当即交出慰问物品，对他们说明利害关系，并保证生命安全，去留听便。並说此次奉命收降，决无恶意，指天誓日劝他们随之回去。奈小喇嘛誓死不从，他说：“我是有罪的人，回去决不能活。与其回去死，不如快活几天再说。谁愿意回去就回去，我是决不回去。”最后，约二百多人随哈中校回归王爷庙。到达后即行收容在教导团。对于潜逃情况一概不问。一切照常。久之亦均相安无事。哈中校这次拯救了二百多人的性命，同时也为地方造福不浅。

小喇嘛不肯受降之原因大致如下。在诺门汗事件发生之前，该中士因公赴东乌珠穆沁旗。该旗为小喇嘛之家乡，他利用人地两熟的条件，就由喇嘛庙等处买来大量牛羊皮张，带回王爷庙卖出，获利甚厚。事为当地警察宪兵所悉。因为皮毛为统制品，私人不得买卖，因该中士又系军人，故由伪宪兵逮捕，并没收其全部货物及钱财。在定案判罪之前，正值诺门汗战争爆发，我团归属兴安军官学校之编制，此次奉命转属于兴安师。奉命之后，立即整编。学校顾问泉大佐由宪兵团要出该中士，嘱其好好完成任务，立功赎罪，但是该中士系视财如命之徒，因为失去大批财物心中郁郁不快。经过这次打击，岂肯再替日寇卖命。他率众逃跑是心怀愤恨，不肯用命的表现。由于该中士带头，全团几乎溃散。小喇嘛在归流河与哈中校分别后，率领二百多人，沿途又收集了不少小股土匪，扩充了实力。随之自任为团长。把其余的人分别编成连排，任命了连、排、班长。以后因缺乏粮

食，以及分子复杂，而开始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各地居民苦于骚扰，纷纷控告。故当时出动了数团人马进行包围。该团既缺粮草，又少弹药，在重重围困之下，交枪投降。他们投降后，交给第九军管区军法会审处理。据说有十七名罪大恶极的处死刑，其他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或释放。

### 七月八日——十一日

八日，我们遵照师司令部命令，后退了五、六公里。退到补给所呆了两天。这时候师司令部给教导团补充了二百多名士兵。当即由其中选拔上等兵升为班长，班长升为排长。又补发了枪械，我团这时共有重机枪七挺，轻机枪十二挺，平射炮二尊，速射炮二尊，马枪每人一支。同时，将全团人员编为三个连。即一连、二连和机迫连。一连连长是达斡尔人，名字已记不清了；二连连长和机迫连长都是日本人。

七月十日下午一时，师司令部向前移驻七公里到达特默敖拉（汉语，骆驼山）。其它团驻扎在特默敖拉山左右。此时，全军只剩下四个团。驻山的东麓有十二团和教导团，驻该团西南方的是迫击炮团与五团。团与团相距五公里。

是日下午九时，师司令部召集各团团长开会。决定于明晨三点钟进攻西南三角架附近的敌人。到十一时，我才回团里，召集各连连长，传达师部命令。

午夜，整顿队伍出发。前进到离敌人较远的地方，我们无声无息地悄悄歇了一会，这时候，只听得从西面传来接连不断的枪炮声，忽而冬冬巨响，地动山摇，火光闪射，把西面漆黑的夜空照个通红。这是日军与蒙苏军正在激战中，于是我们开始向敌人还击，不久敌人即行退却。

天已大亮，我团更加猛追。但师司令部来令叫我们马上撤回一公里，我们遵命撤回。后在这里呆了一个月。

上午九时，我团副官矢畑受津田之命去司兵部联系，他回来后，向津田传达了司令部命令，叫我们即刻向东南进发。在进发途中遇十二团团田中上校和他的勤务兵二人正在那里歇息。津田中校便对我说：“团长，您在这儿和田中团长歇一会吧！”

我听从津田的话，带一名勤务兵留在田中团长这里。不过，心中很纳闷儿，觉得有些不对头，莫名其妙，不禁有所忖度：

“津田把我留在这里，是想独自带领全团士兵到阵前立功，还是看我上了年纪，真的叫歇歇乏，好恢复一下精神？”

在田中上校身旁，没呆到一刻钟，师长和顾问带几名兵士步行来了。当时师长非常气恼，语气非常严厉，看他指天划地，横目歪嘴的态度，的确是在斥责我。这时，没人当翻译。自己虽然觉察到身为团长，却离开全团士兵，留在后面，是不应该的。但也认为这不是我的本意，而要津田负责。因此，我焦急得很，满肚子的话，一时说不出来，遂端正态度，用达斡尔话庄重地向师长说：“津田把我留在这里的。”“是津田，不是我的本意……”我用日语只能说出“津田”这二个字的发音，左一个右一个的“津田”，接着就用达语嘟噜嘟噜地说个不停。师长看我的表情与动作，仿佛知道了是津田有责。我的嘟噜嘟噜声到底起了作用。

我带着勤务兵向津田赶来。走在地势稍高的地方，师长和顾问大概由于恐怕被敌人发现，而喊着告诉我们要由低洼处挡着身子走。我向师长挥手用达语说：“没有敌人，不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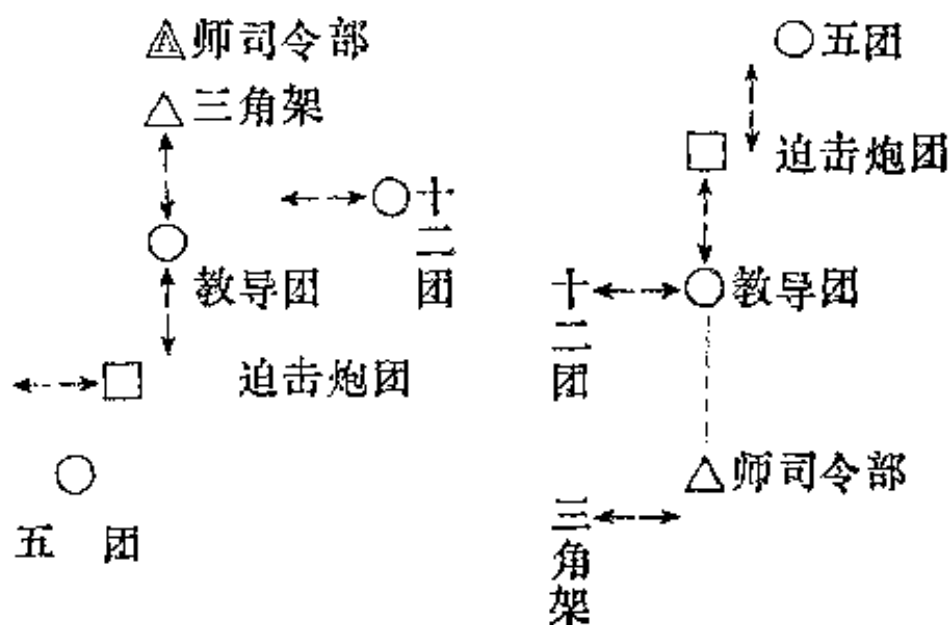
师长，顾问由挡身的低洼处看了一会便转身往回走了。

之后，我又想：“津田叫住歇息，其存心不良，他是叫上级看出我的不当，而对我怀疑和不信任。我考虑，师长和顾问之



来此，是矢畑告诉了津田，从而津田出了这么一个花招，用了阴谋诡计。我在七月七日之战，做出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舍身为团。但津田却如此，这合乎情理吗？我是一个鲁莽、寡言之人。当时虽然没说什么，可是总以为欺人者将自欺，违背良心事，迟早要被发觉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谁也埋没不了。由此看来，在小小的事情上，却很容易失掉人心呀！

这一天，没有遇见敌人，我们平安无事地抵达了三角架。师司令部紧挨三角架的北面驻扎；我教导团驻扎于三角架南的松林下，与师司令部南北相对，中间距离二公里；骑兵十二团驻扎在离三角架三公里远的东南方，迫击炮团和五团驻扎在三角架四公里远的西南方；各团相距二公里。兹图示如下：



• 由师司令部至教导团，再由教导团向东南、西南用实线（ $\longleftrightarrow$ ）表示者均为一公里半。

七月十三日——十五日

本日，师司令部下令：今后以防御为主，敌人来攻则反击，不来则不进攻。

从十三日到十五日由南面不断打来野炮和榴弹炮，极为猛烈，响声震耳欲聋，惊心动魄。因此，我们象老鼠钻洞，缩身屈足，战战兢兢蹲在战壕里，一动也不敢动；万一露头，敌火即中，如击鸡蛋，不漏一个。敌炮向我各团轮流射击，使得我们神经质地时刻耽心炮弹不知何时来临。这几日，我方伤亡颇重，潜逃者日益增多，无法制止。

炮声暂息，忽然上空敌机嗡嗡。抬头一望，并不见投弹，好似群蝶飞午，传单降雪般地飞下来，还没有来得及下禁令，很多士兵早已跑出战壕，争先恐后地抢捡这些传单。

在传单上印有我们五团德里格少校和副官王吉勤上尉的照片，以及他们所说的话。大意是：

“兴安师的蒙古军官和士兵朋友们，你们不要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不要为他们当炮灰！你们的妻子和儿女，每时每刻在盼望你们回去，你们要坚决地杀掉日本法西斯，到这边来，或者扔下武器回家，不要无意义的牺牲宝贵的生命……”

从此以后，蒙苏军的炮声逐渐稀疏起来，只是在早晚断断续续地响几声。

七月十六日

师司令部下令，命令我团坚守阵地，一面做好防御工事，一面准备战斗。在敌我炮火之下，每日都有死伤，故我团官兵时时准备躲避敌方炮弹光临。每天夜间都有三五成群的士兵潜逃。每当夜间，在我团阵地之西侧日军阵地方面，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光芒耀眼，想系苏蒙军集中火力于日军。

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中将和参谋阿思根少校，副官色启元上尉携带大批上等酒肉、卷烟等等慰问品前来慰劳，当时召集全体军官训话。其大意如下：大家都辛苦了，本职不辞千里而来，是为了看看你们，希望全体官兵同日军一德一心，勇敢战斗，完成大日本天皇陛下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深望你们忠诚于天皇陛下，保卫国土，彻底消灭敌人。我们蒙古人要保持成吉思汗后代的光荣传统，更望各将领把本职所说的话，转达于你们的士兵。同时正珠尔扎布上校亦回到前线。巴司令官于次日清晨乘装甲车离开前线返防。

自十六日至二十日没有地面战斗，只是遥望日、苏两军的空中战斗。

师司令部接受军管区的慰劳品后，又增漆了许多品种，如各种日本名酒，啤酒、罐头、牛肉等物分给部队。我团受领后，在津田中校等主持下分给日本人两份，蒙古人（只限军官）一份，士兵全无。因此蒙古军官们感到不满，而士兵们更为不满。当他们看到军官们大吃大喝，更为侧目，因而兵心涣散。蒙古军官们虽然得到日本人半数的赏赐，也觉不平。故同生死，共患难的心情也就化为乌有了。兵无斗志，士气不振，只能同苦不能同乐。故蒙古官兵对日本人感到怨恨。此为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七月二十日

迫击炮团残兵一个排，由中士代理排长某某率领兵士四十余人，炮四门，奉命编入我团。

### 七月二十一日

天气晴朗，日出后，在我军阵地西北方面日军阵地中，时有断断续续的炮声。约在八时许，看到日军阵地西北角升起炮兵观测气球一只。九时许，日军与苏蒙军展开激战。日军用榴弹炮与加

浓炮约四门向松布魯山苏蒙军猛攻。苏蒙军迫于十字炮火的威力，一时退向山后隐蔽。日军随即进行总攻击。当时苏军三架飞机起飞攻击日军气球，气球被击，起火坠地。同时日军已渡河，将要攻至松布魯山附近时，苏军的坦克步兵一齐出现，日军由于气球被击落，重炮不能发挥掩护作用，被迫退守原阵地。苏军亦不穷追。

### 七月二十五日

夜间，对方彻夜由四面八方发射信号弹，我方始终保持沉默。

### 七月二十六日

天气晴朗。正因连日无事，官兵们都很轻松。有的在帐篷里休息，有的登高远眺；忽然有人发现对面敌军满山遍野，向我团阵地展开攻势。当时看到对方士气旺盛，犹如生龙活虎一般，向前猛进。在距离我团阵地不远之处，改为各个跃进，向前猛扑。看出对方左右翼似有重机枪，而对方一枪不发，如入无人之地。他们是边搜索边前进。我团当即配置重火力，准备应战。当时命令迫击炮、平射炮、速射炮以及其它各连，以重机枪射击为号令。重机枪不开火，其它不准射击。不久，机关枪连长向津田中校报告，据说，敌军业已进入我方火网，距我阵地只有五百米左右。而津田中校坐在掩体里边，瞑目弄手，也不观察敌情。只说：“慢慢地”，别不多言。当时我也感到心急，少时，机关枪连长又报告说：“敌人远的距我阵地只有二百米左右，近一点的已距我百米左右。”这时津田中校果断地说：“射击开始！”因此我看出津田足够钢胆沉着，实在具有指挥官的风度。他是掌握了战术原则，等待敌人完全进入火网，一举歼灭。射击开始前，我虽明知其意，但也感到心慌意乱，一听枪声立即心平气和。我方轻重武器一齐射击。对方左左翼使用多数重机枪，掩护正面步兵向后撤退。当他们进入洼地之际，正好在我方迫击炮有效射程之内，给予他们很大的打击。对

方在不得前进之情况下，全面撤退至距我阵地七、八百米之处，我方停止射击。对方死伤约三十余人，我方伤亡十余名。为了不在敌人面前暴露目标，始终未出工事一步。

### 七月二十七日

夜间，原迫击炮团编入我团之士兵四十余名全部潜逃。

### 七月二十七日——三十日

敌炮除去每日向我团射击外，并向十二团进行袭击。在敌炮向我猛击之际，我的勤务兵手指负伤，我为之包扎伤口，命其速回后方就医。

### 七月三十一日

五团秦焕章团长率领残兵百余人退至我处。因秦有病，与我数语后，即赴师司令部请假。当日，司令部命令将五团残余士兵编入我团。

十二团除去潜逃剩余百数十人，在敌战车的威胁下，无力反击，随向师司令部方面撤退。在司令部东南方约一公里处占领阵地。

### 八月一日

苏蒙军占领了五团与十二团所有的阵地。以往苏蒙军完全利用夜间渡河，自本日始，白昼渡河，坦克声终日不断，震耳欲袭，大有进行全面总攻击之势。

### 八月二日

以往对方炮击，只有正面。而今由于苏蒙军占领了五团及十二团阵地，则三面炮火日以继夜地向我方射击，我方通讯联络兵所骑的马全部负伤。由于无法治疗，利用中午炮火中断之际，命令士兵挖好大坑，由兽医给所有的马注射剧药。伤马立时倒毙，当即掩埋。我等骑兵出身，视乘马如生命，目睹爱马惨毙，不觉

伤心落泪。在敌榴弹炮猛击之下，我辈实无藏身之处。由于炮火猛烈，战况不佳，所有各团补充我团之士兵每夜有潜逃，故我团兵力日益薄弱，最后只剩下我团原有残余士兵百十人。

### 八月三日

我团原系骑兵，而今因为无马可乘，全部变成步兵，失去本能。又无援军，深恐一旦遭受敌袭，只好坐以待毙。伤心惨目，苦不堪言。拍手顿足，无计可施。不觉仰天长叹：“我们为谁牺牲？”十时许，津田中校对我说：“团长，到司令部报告一下我团的情况吧。”当时我想，过去和司令部联络，除了副官就是津田亲自去。今天为什么叫我去？那我只好去一趟。我立即前去。当我到达司令部之际，看到后藤外马参谋长（因为顾问、师长均因伤转去后方治疗，后藤代理师长职务）以下全系日本人。蒙古军官一个人也没看见。我想大概都在工事里吧。但见日本人每人手握轻机一支、军刀手枪全付武装，大有待机杀敌之势。我看到后藤参谋长一头乱发，满面忧容，很觉奇怪。我对他敬礼侍立，他命我坐下谈话。由一个精通汉语的日本人作翻译。我说：“我团兵力单薄又无友军支援，司令部也没有兵马援助我团，我团目下士气非常不振，兵无斗志，每日都有潜逃的情况发生。士兵们已经表示不能坐以待毙，大有立即四散之势。请参谋长给我指示一个妥善的办法吧。”后藤说：“好，我明白啦。只要你们再坚持一天就行啦。”我问：“是今天白天还是今天黑夜？”后藤说：“黑夜，今天夜间有日本军来接防。”我问：“你们如果不来接访怎么办？”后藤说：“一定能来，你放心吧。”我说：“兵心实不能把握啦，如果今夜日军不来，我们只好到司令部这里来。”后藤说：“好，他们如果不来，天亮以后，你们全到这里来吧。”我又再三叮咛，才转回团部。回团后，立即召集全体官兵，详细转达了

司令部命令，但无论如何，士兵们不肯深信，还是一致主张立刻撤退。在我一再安慰之下，他们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日暮后把所有的重武器放在一起。每一门炮及每一支重机枪都派出可靠的士兵二人看守。为了防止潜逃，故将全团所有的士兵集结在团本部，以便监视。一旦敌军来袭，就可以一同退走。左等右等，不见日本军来接防，使人万分焦急。一直等到次日午前二时左右，始见日本军官一人率领士兵数名到来。我同津田中校及副官等立即陪同该官视察所有的阵地。详细地说明了阵地情况，并指示了重武器的位置。他每到一处重要阵地，就留下士兵一名接管重要武器。我们也随之收回看守阵地的士兵。约一小时许，我们全部交待清楚，立即整队向师司令部转移。

八月四日

黎明前，到达司令部所在地时，有人指名找我说：“金团长在吗？”我看去，原来是作战参谋曾根崎洁臣中校（他原系博克图兴安东警备军参谋长，与我共事多年）。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走，等一会同我一起坐汽车走。”我回头对津田团副说：“参谋长找我有事，你先带着部队走吧。”他当时率领残兵败将急向后方撤退。这时，我跟随曾根崎参谋来到帐篷里边。他立时取出酒肉说：“来，我们痛快地喝一杯吧！金团长，你的身体好吗？”我随即向他说：“参谋长健康吗？”回说很好。接着我们举杯痛饮。关于战斗情况和官兵问题一字不提。只是怀着不同的心情，默默地吃喝。当时我觉得脱离险境，甚为安适。不久又看到日本军载重汽车三十余辆满载士兵约一千二百人驰向我团旧阵地，于是，我觉安心。正在这时，躺在我身旁的正珠尔扎布上校轻轻地拉着我的上衣小声说：“天快亮了，苏联飞机快来了，和他们说快走吧。”我听到后，当时装作无事地连饮数杯，才对曾根崎

说：“天亮了，敌机快来了，我们快走吧。”曾根崎沉着地说：“不要紧，喝吧。”少顷，我们乘汽车退至距原师部位置约二十余公里的补给所所在地待命。

我到达补给所后，才听说：三日三时许，后藤参谋长召集全体蒙古军官士兵（除去我团）讲话说：“现在我军已丧失了战斗力，又没有友军援助，望你们放下武器，各自回家吧。我们日本人先不动。”蒙古人官兵听此话后，纷纷放下武器散去。我听到这一消息，回忆津田一定早知此事，故前日叫我去司令部。由此足证日本军是把蒙古人蒙在鼓里，好事归他们请功，坏事推在别人身上。他们想把兵心不稳，士卒不肯用命，以至战败的责任推到蒙古人身上。



## 色布精额匪帮侵入海拉尔始末

阿·恩克巴图

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以来，巴尔虎、额鲁特等蒙古人以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汉族等民族就劳动生息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为保卫国家的北部边疆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东清铁路的敷设，铁路职工、俄国侨民相继而来，此地便成了欧亚交通的要道。

海拉尔是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设在旧城。当时海拉尔分旧城和新城。旧城主要居住着达斡尔族人和汉族商民；新城属于东清铁路管辖区（亦称站界，俄语称巴尔恰），主要居住着铁路职工、俄侨以及少数欧美商人，设有俄国侨民事务局，管理侨民事宜。沙俄驻海领事馆和东清铁路俄国护路军也驻屯在这里。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春，呼伦贝尔草原上，突然乌云笼罩，发生了一次惨重的匪乱。

辛亥革命后，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宗社党”相勾结的巴布扎布匪帮，纠集四、五千人，扯起“勤王师扶国君”的破旗企图复辟，串扰内蒙各旗，后为张作霖、吴俊升军队所歼灭。巴布扎布本人被击毙，其残匪色布精额、本巴扎布等人纠合残匪千余

人在一九一六年退至索伦山、哈尔哈河、呼伦贝尔南部一带，妄图生息养兵卷土重来。他们派人来海拉尔，向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提出合作的意愿，但立即遭到了副都统胜福的拒绝。可是该匪帮仍赖在边境上不走。在此情况下，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不宜以武力解决，为了缓和局势，便派都统公署帮办凌升等人，携带数十辆牛车的粮食、防寒物资等，前往哈尔哈河进行“慰劳”，受到匪帮的款待。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但色布精额匪帮贼心未死，假借做买卖，经常出入海拉尔市，住在日本特务机关太阳堂、富山楼等处，与日本特务、浪人相勾结，探听我方内部的情况，并换取武器弹药。又和日本特务有密切关系的明保（黑龙江省西布特哈达斡尔人）相勾结，通过他拉笼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门官（相当于卫队长、佐领）那木吉勒（额鲁特人）。那木吉勒长于权谋，善于投机钻营，取得胜福的信任，都统公署的大小会议他都参加，内部情况无所不知。匪帮将他收买过去，窃探情报，作为内应。

## 二

色布精额匪伙，在哈尔哈河一带经过一冬的生息，恢复了元气，便开始进行入侵海拉尔的阴谋活动。先派明保去旅大、天津等地通款亡清肃亲王求援。

呼伦贝尔胜福等上层人物获悉色匪企图入侵海拉尔市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有的人认为匪军有日本人支持，又有现代化的武器，不能轻举妄动，宜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解决；有的如凌升、福尔格图等青年官员主张用武力对付匪军，以绝后患。于是便派凌升等人去找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蒂，但他以不干涉内政为由，迟迟不表态。胜福等无奈，只好加强

防禦力量，調兵遣將。在市内布置三百名兵力，派保安队营长荣安、根登布带领五百余名新兵驻屯在第一线新巴尔左旗南部罕达盖的地方。又派嫩林陪同那木吉勒和日本人甘风（不知真名实姓），前往哈尔哈河，探听色匪的意图。色匪继续进行欺骗，表示绝不忘恩负义，绝不袭击海拉尔，等夏暖后，便移驻他处。于是胜福等人，误以为真，便按兵不动。

经过一冬的养精蓄锐，色匪一到一九一七年阴历四月天暖之时，便将大批匪徒集结在却金查干诺尔一带，准备进攻海拉尔。他们先让那木吉勒率领匪帮的先头部队来到驻防罕达盖地方的荣安部队，欺骗荣安说，胜福副都统要和色布精额在海拉尔举行谈判，派我到哈尔哈河迎接他们来海，不许开火，这是副都统的命令。荣安误认为真，任其通过。其实此刻，大批的匪军已绕过罕达盖第一道防线，逼进南屯地带，直向海拉尔杀来。此时，胜福等人才看清了那木吉勒这个坏蛋，但时机已晚，难以防守，只好率领大小官员，放弃副都统公署，撤退到海拉尔铁路管辖区避难。在东头道街俄国人开设的“诺米尔”旅馆内暂设办公室。

与此同时，南屯、西屯所有的达斡尔族居民，也随之逃到海拉尔铁路管辖区以及铁路沿线各站避难。

### 三

色布精额匪军侵入海拉尔以后，首先占领呼伦贝尔都统公署，设总指挥部，废除副都统公署，另设所谓的“提督府”。为了笼络人心，挟持车和扎（新巴尔虎右旗人，当时为副都统）为提督，帮贡扎布为帮办，明保为顾问，巴达玛齐木格充任俄语翻译官，还有乌泰、义尔格勒太等人为提督府官员，那木吉勒为额鲁特旗总管。但车和扎借口有病，没有赴任视事，

匪军占领海拉尔旧城后，为追捕胜福、贵福、凌升、福尔格图等官员，经常窜入铁路管辖区（即巴尔恰）搜查俄人住宅。当俄国人拒绝开门时，便强行破门而入，翻箱倒柜，甚至打死了一名俄人妇女。有一次，为了追捕凌升、福尔格图二人，匪徒几人窜进开往哈尔滨的国际列车上，鸣枪威胁列车长要交出两人，引起了中东铁路当局和俄国驻海拉尔领事馆的不满，提出抗议，随即严禁匪军窜入铁路管辖区扰乱。

胜福等人为了生命安全和保存实力，便离开了海拉尔去齐齐哈尔，在海拉尔铁路管辖区及铁路沿线的所有达斡尔人约千余人也都随之逃往齐齐哈尔避难。这些难民到齐齐哈尔后，人地生疏，生活无着落，死亡很多，尤其是儿童死得更多，情景十分悲惨，真是家破人亡，只盼望早日返回故里。

匪帮侵占海拉尔后，得意忘形，花天酒地，每日出动大批匪徒以巡逻为名，到处抢掠，搜刮民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商店关门，路断人行。又派大批匪徒，到牧区各翼各旗，抢夺牧民牲畜，甚至抢劫喇嘛庙，最后将庙烧毁，激起广大僧侣的愤慨。匪徒们随意打人杀人，索伦左翼的卓德仁佐领、新巴尔虎左翼的副总管多布丹巴勒朱尔、陈巴尔虎旗的骁骑校朋车布等都无故被打死。呼伦贝尔驻外蒙代表成德从外蒙返回途中也为匪军擒作人质，经过赎取才幸免于死。在骇人听闻的事端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新巴尔虎两翼的牧民纷纷逃到外蒙境内避难，有的便加入外蒙的扎萨克旗；陈巴尔虎的牧民移至三河一带；莫和尔图一带的牧民移入扎敦河以北的山区里；伊敏、辉河的鄂温克、额鲁特牧民去乌奴耳一带避难。

外逃避难的胜福等人，一到齐齐哈尔，便与黑龙江省当局取得联系，组织以贵福、凌升、荣安、福尔格图、倭格吉布等为幕僚的指挥部，拟定了收复海拉尔的具体计划。又向黑龙江省督军请求出兵援助，但由于他们亦在发生内讧，自顾不暇，于是又派凌升前往北京向北洋政府求援，而北洋政府也无具体援助行动。只好派贵福、凌升、福尔格图等潜入海拉尔、满洲里和留在呼伦贝尔的车和扎等各翼官员取得联系，发出各翼官员同心协力，驱逐匪军，收复海拉尔的号召。各翼官员纷纷响应，首先是索伦右翼旗副总管鄂温克人吉勒格，带领堆西尼佐领以及达布、索米仓、额尔贺松、努恩格、罗占、贵青等十余名官民代表，骑着马绕过海拉尔一直奔到乌奴耳上火车到了齐齐哈尔，把胜福等人接入海拉尔。随之在满洲里召开了各翼官民代表会议，商定驱逐色布精额匪帮的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呼伦贝尔都统公署副都统车和扎、新巴尔虎右翼总管齐布森格、新巴尔虎左翼总管玛哈扎那、陈巴尔虎旗巴雅嘎、额鲁特旗总管贡扎布，还有贵福、凌升、福尔格图、荣安等，以及地方知名人士等数十人。会议决定各翼共抽调一千二百名民兵；军马、军粮、帐幕各翼自备，并指定进攻日期为阴历八月十五日午夜，进攻目标为海拉尔、南屯匪军的据点。各翼军队由车和扎、贵福统率。并指定各翼部队的负责人。进攻方法：从海拉尔内部主攻，外部夹攻。另外又派福尔格图和达嘎去哈尔滨、赤塔向俄国人求援，又派成德去外蒙求援。

进攻日期——阴历八月十五日到了，但因各翼军队没能按期集结，又推迟了一天，十六日凌晨，由贵福指挥的以达斡尔人（多数是从齐齐哈尔返回的达族青年）编成的民兵向海拉尔匪军的据点开始进攻，由鄂温克人编成的民兵进攻南屯匪军据点。

在海拉尔街里展开了巷战，呼方军队以东关神庙为基地向匪

军的“提督府”进攻，匪众顽强抵抗，垂死挣扎，战火逼进铁路管辖区。俄国铁路护路军为保卫铁路安全和保护俄侨的利益，配合呼方军队，用四门大炮，轰击匪军。呼方军队占领了匪军巢穴——“提督府”；新巴尔虎、陈巴尔虎旗军队也赶到海拉尔外围。呼方军队士气高涨，火力猛烈，匪军被打得焦头烂额，企图从海拉尔撤退至南屯一带纠集残兵。正在此时，鄂温克人的民兵也进攻南屯据点，匪徒无力抵抗，从南屯向哈尔哈河逃窜。匪徒逃窜时，将南屯、西屯的达斡尔人聚居的村庄，付之一炬，顿时火光冲天，全村变成了废墟。

色布精额匪帮从海拉尔、南屯向外蒙边界哈尔哈河逃跑，企图到外蒙境内亡命。但外蒙方面拒绝入境，派边防军将他们打出境外，匪军被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其残匪四散，往南逃走了。

## 五

匪乱平息后，恢复了副都统公署。对这次平乱中做出贡献的不论大小官兵都分别论功行赏。

平乱中牺牲的人员予以优抚。如成序，当时为副都统公署右厅厅长，为胜福的得力助手。当色匪的先头部队临近南屯时，他恰好从南屯的自宅去海拉尔上班，中途为匪生擒，色匪头目亲自出面，软硬兼施，企图诱降，但他意志坚决，当面骂他们是土匪，受尽酷刑，始终没有屈服，当匪徒逃走时，将他杀害了。战乱平息后，为他举行了公葬，将名牌列入祠堂。

福尔格图，当时是副都统公署帮办，在平乱中和凌升一样，是胜福的得力助手。在与匪军交锋时不顾匪徒的猛烈炮火，身先士卒，勇猛冲锋，不幸头部中弹，虽然急速送到哈尔滨医院抢救，但终无效而牺牲，年仅三十三岁。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公

葬，将其名牌祭在祀堂。北洋政府大总统规定其长子继承他的哈本（云骑尉）衔；其长子在学期间可享受官费待遇。对其老母、妻子和三个子女亦发给抚恤金以资慰问。

对其他在战斗中牺牲的还有朋车扎（扎藏）、卓德仁等人，其善后事宜，也都得到妥善处理

对于在此次匪乱中与匪帮勾结的分子，依其罪恶程度依法惩处。现将其中主要几个人的情况做一介绍：

明保，黑龙江西布特哈人，早在民国二年，因参加呼伦贝尔独立事件，事泄未成，潜逃至海拉尔，与日本浪人、特务相勾结，为日本人搜集情报，为色匪入侵海拉尔出谋划策。匪帮占领海拉尔后，充当匪“提督府”“顾问”，民愤极大。在匪帮占领海拉尔期间，他和古如二人带俄语翻译巴达玛齐木格去沙俄驻海拉尔领事馆，要求接管巴尔恰（即站界）的市政，要求中东铁路允许匪军人员自由旅行。沙俄领事馆，认为这种要求违背中东铁路合同，侵犯俄侨利益，将明保、古如二人扣留。战乱平息后俄国领事馆，将明保、古如二人引渡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都统公署根据其罪恶事实，报请黑龙江省当局，依法判处死刑，当即执行。

那木吉勒，原任呼伦贝尔都统公署门官兼额鲁特旗某佐领。早与日本特务相勾结，供给情报。民国六年色匪侵袭呼伦贝尔时与匪帮相勾结，里应外合，为匪帮占领海拉尔铺平道路。色匪占领海拉尔后，封为额鲁特旗“总管”，依仗匪帮，欺压牧民，民愤极大。战乱平息后，他畏罪与匪帮逃窜南下，据说逃至扎赉特旗后走投无路，“便自戕而死了。”

此外，对投靠匪军，进行阴谋活动的根登布、额尔登布等人，予以免职处分。

# 查干葛根活佛生平事迹简介

苏尼特左旗政协文史组

## 一、前言

查干葛根，乳名叫车顿道尔基帕拉玛，大号扎木彦力格希德扎木苏，简称扎木彦。一八八六年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现在的红格尔苏木巴音红格尔巴嘎的绍日布格冬营盘地。

父亲名根敦，母亲叫那玛巴拉，兄弟三人，长兄宗代，弟弟道布且，扎木彦是次子。姐姐叫达力苏荣。查干葛根生长在这个贫苦牧民家里，从小就是个聪慧、灵敏、有志气的孩子。

扎木彦是查干敖包庙的查干葛根五世。四世葛根金巴扎木苏于一八八七年被毒害死后，庙里喇嘛从各地寻找转世的活佛，登记所有的一岁婴儿并从中选拔。结果将扎木彦和牧主子弟达格旦扎木苏二人作为定选人。将名单拿到西藏拉萨孟和召，由高僧活佛裁定。四岁的扎木彦被裁定为葛根活佛。一八九一年扎木彦五岁时，被请到查干敖包庙，通过隆重的仪式，扎木彦登上葛根活佛宝座。

由于他的天赋聪明伶俐，十三岁就全部学完佛经、佛典。他的老师文珠该是一个精通佛学的沾希（藏语，意为经卷大师），曾叹息地说：我已没什么可教的了！扎木彦对书法、绘画、诗歌都很擅长。他写的很多诗歌都曾在查干敖包庙存藏。可惜在“文



革”中损失罄尽，片纸未留。

查干葛根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对手工工艺也有很深的研究，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对蒙医、藏医学以及雕塑、木工等样样都懂。

一九四七年查干葛根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委员。一九五〇年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向毛主席献了哈达、银碗和马奶酒。一九五三年参加全国佛教协会代表大会，当选全国佛教协会主席。一九五四年前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锡盟政协主席等，一九五七年当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主席。

## 二、云游各地学经修道

查干葛根从幼年跟沽希喇嘛文珠该、高僧格日更喇嘛、嘎拉曾东日布、医学高僧却扎木苏等五位高僧学习藏经、医道、易卜、经济学、蒙汉文等。从十四岁至二十四岁在外蒙库伦当僧徒受戒，得赐葛斯贵称号。曾到克鲁伦河岸的僻静处精修了一百〇八昼夜的佛道，回到内蒙后又到恩格尔河庙再修佛道一百〇八天。此后又几次去拉布楞、塔尔寺、拉萨孟和召学习佛教。最末一次领了很多高僧、僧徒乘骆驼并驮着辘重去塔尔寺受戒。

## 三、查干敖包庙的全盛时期和查干葛根的宗教活动

查干敖包庙位于苏尼特左旗锡林查干敖包西南方，是全国著名的喇嘛庙之一，称恩格尔满都拉之所在。一七一四年为游方喇嘛劳布僧敖日布始建，至今已有二百七十年历史。清朝康熙皇帝赐名“福佑寺”并挂了匾。当地牧民多称恩格尔庙、查干敖包庙，也叫恩格尔明干等等。

查干敖包庙在查干葛根当活佛时进入全盛时期。前后建成十座大佛殿，四座学部，十四个诵经庙，十三个庙仓，有一千名喇嘛（沙必纳尔），有两千名牧民属户。在庙附近八十公里之内的牧户全属查干敖包庙，有上万头（只）大小牲畜。

查干葛根从一九〇一年扩建了医学学部，一九一二年修建了拉哈日巴学部，一九三〇年建筑西拉布荣为迎接班禅活佛的宫殿。

一九〇〇年查干葛根活佛到外蒙拜会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活佛。达赖等赐予“罕布”称号。他又周游各地，拜访当地宗教上层，由众多的高僧活佛赐予他十多种称号。

一九三二年十月班禅活佛前来查干敖包讲经布施，从四面八方来听经、叩拜的善男信女和僧徒有三千多人，真是盛况空前。查干葛根代表庙宇赠送班禅额尔德尼活佛一万银圆的巨款。当时苏右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本旗王爷额仁钦也前来拜会施舍。

曾经到查干敖包庙讲经、布施的还有从拉萨、拉布楞、塔尔寺前来的永吉格、陶旺、胡曼等活佛。

查干葛根曾周游内蒙各盟旗诵经布施。由于他的影响，锡盟十个旗和林西、林东、克什克腾、翁牛特、敖汉、察哈尔各旗、阿拉善、乌盟、伊盟、青海、西藏及外蒙的道如那高毕盟的墨尔根王旗、达力岗嘎旗和苏和巴特尔等盟旗的喇嘛来查干敖包庙充当僧侣、学经修佛，以及从各地来的游方喇嘛、善男信女、布施者络绎不绝。

一九一四年查干葛根去塔尔寺朝拜，一九二四年陪同陶旺胡图格图去蒙古、朝鲜讲经布施历时二年。一九二五年又陪同班禅活佛周游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城市进行宗教活动，

会晤各地宗教上层。一九三二年去日本、朝鲜参观。一九四九年去印度、尼泊尔等地进行宗教活动。

#### 四、热爱祖国、支援革命

一九四七年查干葛根曾支援我军十一师大量物资，其中军马二百匹。在匪首根敦皮勒和布利亚特匪首仁钦扰乱地方，占据旗南部大部地区，封锁革命地区的物资供应，在我军处于极度困难情况下，查干葛根从蒙古运来两汽车棉布，拿出庙仓驼绒毛代替棉花，集中远近的裁缝赶制棉军衣二百套和棉鞋若干双送到前线，解决了我军防寒问题。一九四九年查干葛根派达喜其林给查格宝格达军（十一师）送去一百二十付马鞍和四十驮驮粮食。

查干葛根为保护革命者和爱国志士，对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四〇年以雨漏为首的日特机关进驻查干敖包庙，杀害了好多爱国志士。尤其以蒙特嫌疑为借口编造罪名，杀害了很多百姓。查干葛根伪装和敌人协作，实际上秘密进行保护革命者和爱国志士的活动。当时日特强行组织喇嘛僧徒站岗放哨进行巡逻。一天夜里雨漏突然叫来查干葛根斥责说：“你们站岗的喇嘛每夜都在睡觉，要赶紧想办法。”葛根对答说：“今后我叫每个下夜喇嘛手里拿铜铃彻夜摇动，这样他们就不会睡觉了。”日特立即表示赞许。实际上铃声却成了革命人民联络消息的工具和信号。

内蒙革命老前辈——吉雅泰、奎璧等往来蒙古及苏联时，多以查干敖包为联络站，并得到很多方便。一九四八年我军由前线退下一百多伤员和军属妇孺住到查干敖包以西查干库伦，消息被敌人知道，普勒吉格桑杰匪首率布利亚特土匪十多人前去抢劫。在路上遇见查干葛根。葛根对敌人提出抗议，严正地对敌人说：“钟乃有什么大权拿我查干敖包庙作杀人屠场？”进行阻

止，并立即派萨木登乘两匹好马飞报查干敖包的我军指导员高兴嘎，吩咐萨木登将难民用四五十辆牛车沿着边防线路安然转移到东乌旗喇嘛库伦。为此，自治区首长王再天同志特给查干葛根来信表示感谢。

### 五、关心人民疾苦，为发展工商文教卫生事业作出贡献

一九三二年查干葛根出游日本，归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召集附近牧民和僧众来听自己的演说。他阐述了日本工商业的发达情况，认为其原因是重视文化教育。他说，我们只学藏经不行，必须学好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会后分发给每人一本书和一支铅笔以资学习。后又挑选六十名年轻喇嘛和牧民学习蒙文及日语，组织七、八十名喇嘛扫盲学习蒙文。现在苏左旗相当一部分老干部都是那时学的蒙文。

为发展工商业，他派出达来、根敦到温都尔庙学习毛纺织工艺，织毛衣毛裤、麻袋、围巾、手套等等。此外，举办金银铁木铜以及壁画、泥塑、雕刻、色漆、熟皮、擀毡子、烧砖瓦白灰、制地毯、裁缝等手工业，收获很大。在商业贸易方面，除组织旅蒙商、行商进行集市贸易外，还发展座商——如“那孙商店”、“达贵商店”，“白音仓商店”等，使查干敖包庙，成为商品交易中心。

查干葛根为解除人民病痛，对医药事业也很重视。过去查干敖包以及苏左旗几乎没有医药。一九一二年查干葛根向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要求高医，库伦医学部的名医云熟扎木苏前来组织医学部。一九四三年在满都拉图庙成立医校，派敖力布、关其格、嘎拉僧等三位医生担任教师，召募达喜拉布旦、扎木苏、陶格木德、贡嘎、巴拉敦扎木苏等二十名青年喇嘛为学生，用蒙语讲授

四门基础医学。同年在胡署庙成立医疗室，由那木达拉负责，有巴达拉胡、桑杰、车敖丹巴等医师。一九四七年在查干敖包庙，成立医药点，巴达拉胡任主医，有大夫十人，同时设医药研究室，由那扎木苏、布敦敖力布等专门研究基础医学，并用蒙语翻译。周围八十公里之内的牧民群众都前来就医用药。

满都拉图医校的学生是由全旗境内各庙召募来的。学员结业后经考核合格者发给结业证，学生回去后就着手成立医疗室开诊。这一切都说明查干葛根在普及医药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解放战争年代，查干葛根和满都拉图庙韩卜喇嘛(庙主僧)贡松扎木苏商议，鉴于我军前线非常需要医药，二人将珍贵药物全部无代价地献给我军十一师使用。

查干葛根于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拿出五百到一千头母羊，作为常年牲畜，分发给遭受灾难的穷困牧民每户十至二十隻羊，规定不准杀吃，不准卖掉，只许老死。仔畜与畜产品则归牧户所有，做为生活补助救贫济苦。

查干葛根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捐献大量物资购买飞机大炮，并责成每一庙仓杀一头犏牛，计十三头，把肉晒成肉干，捣成肉粉，装进洁净的白布袋内，寄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以鼓舞士气。

查干葛根在国家财政困难时期，拿出十万元巨款购买公债，支援国家建设。还积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开展的打狼运动。佛教戒律严禁杀生。但查干葛根不顾陈规陋习，他说：“狼是牲畜的大敌，牲畜是人民的财富，僧众为保护人民财富，应当同普通人一样消灭恶狼。”他动员全部僧徒，组织十八个打猎组，并从庙仓供给帐房辘重和骑乘，每次打猎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杀死好多凶狼，保护了牧业生产。

查干葛根很重视生产劳动，他常常告诫僧众：“一个人不能只吃不做每天都要参加劳动才行。”他去畜群点的牧民家，也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牧民放牧一天归家时，葛根已把茶饭准备好。活佛下厨房，使牧民深受感动。

查干葛根深知高原地区缺水的困难，因此动员僧众在各地打井三十多眼，并从深山采石砌井，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

在解放战争年代，查干葛根为了保卫人民政权，动员六十名青年喇嘛报名参军，并挑选十多名优秀青年喇嘛保送到干部学校学习。

一九五五年，查干葛根得知本旗初建小学校因经费不足而中辍，立即出售大量牲畜，捐赠万元巨款充作建校经费。

## 六、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查干葛根积极参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商讨，大力宣传党的宗教自由政策，为祖国统一大业他主动会见达赖、班禅二人。

一九五五年旧历正月初二查干受中央委托去塔尔寺、拉布楞、羔楞三寺庙朝拜，查干葛根乘小车去塔尔寺等三庙，会见了陶旺、宝热等活佛，历时一周多。归途中到西宁，会见了西宁党政首长，并互赠礼品。他并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四人的照片寄给陶旺葛根活佛。

查干葛根居住的东拉布楞，已有二百六十八年的悠久历史，经多次扩建和维修，已成为六十二间西藏式的三层楼殿，其中供佛堂和葛根宫，建筑美观大方，富丽堂皇，红砖紫瓦，雕梁画柱，镀金墙壁，粉饰得金碧辉煌。

在葛根宫中陈列着参加国庆观礼的请柬、礼品、观礼证章以及同毛主席合影的巨幅照片。还有同各地高僧、活佛的来往书信

及照片。另外摆设着稀有的古董、珍贵器皿、古玩字画等，在大紫檀木桌上正中供放着清朝皇帝赐予的钢印、班禅赏赐的赤红顶戴、达赖活佛赏给的红纓，还有各种红纓冠和金银器皿，珍珠玛瑙，珊瑚宝器等，真是琳琅满目。

一九五七年查干葛根活佛病逝于查干敖包庙以东五十里之遥的其日克图，终年七十一岁。遗体盛殓之后运到查干敖包庙火化，葬于庙后并建塔纪念，可惜在文革中被毁。

查干葛根逝世后，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佛教协会都派代表前来致哀。内蒙古自治区、锡盟公署、苏尼特左旗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

## 清末民初五当召扎萨克大喇嘛

### 雅仁匹勒

巴靖远

雅仁匹勒是民国年间（民国元年至二十年间）五当召历任经堂和分仓要职的总管大喇嘛；是土默特旗第一任蒙族总管、绥西镇守使、绥远代理都统满泰（字子舒）的二叔父；也是把“包头”译释为“鹿城”，或“有鹿的地方”最早的命名者（见孙效如的《鹿野纪闻》笔记）。

雅仁匹勒系土默特特别旗右翼大甲鄂尔圪逊村的蒙民。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逝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终年七十四岁。他的原姓是土默特部族的兰姓。他父亲有三个儿子。他与长兄是孪生弟兄，他为次子。他的大哥是满泰的父亲，名叫阿尔沙。他的乳名叫阿玛格，“雅仁匹勒”是他出家后的僧名（以下简称雅喇嘛）。他的三弟名叫阿木古楞。他幼年时，家境贫寒，生活十分艰苦，从小因受艰苦生活环境的磨炼，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和勤劳的习惯。从十一、二岁起参与泥工劳动，至十四、五岁时，他学会了一手很好的盘炕修灶技术。村里人家凡有炉灶不吸、炕洞不通的，经他一整修，就灶吸炕通，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灶王医生”。



他的三弟阿木古楞，在鄂尔圪逊村开了一个车马店。当时，陆路运输，车马是比较好的交通工具。在村落的要道站口，开一个车马店，生意是比较兴隆的。因此，除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外，还可供养他的侄子满泰入塾求学。满泰以后又得到雅喇嘛的资助到外地深造，从而使他功成名就，青云直上，充任了高官要职，成为土默川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②。

雅喇嘛十几岁时，为了减轻弟兄们的生活负担，立志出家，托人向附近的沙尔沁召（又名广化寺）请准，到广化寺当了小喇嘛。入寺后，被一位经学深厚的老喇嘛收为弟子。从此他改名为“雅仁匹勒”了。他勤劳好学，颇得师傅和众喇嘛的欢喜。他对人处事都很随和，特别对他的师傅殷勤奉侍，关护备至，因而他的师傅很想把他教育成材，培植成召上（沙尔沁召）的执事接班人，对他认真传授。学习数年，师傅又把他送到五当召深造。

在五当召，他又拜新师，加入了“却伊拉学塾”③，一心一意地从第一学级开始学起，钻研喇嘛教的教义哲理。他除了集中精力认真地学习外，还利用闲暇时间，向召上有技术的喇嘛，学会了纺毛线、捻线陀、缝衣、钉鞋等工活。为了添补自己的生活费用，还向西藏喇嘛学会了编织“鸡冠帽”（喇嘛宗教仪式诵经大会上所戴的礼帽，俗称“鸡冠帽”）的手艺。这种“鸡冠帽”，价格昂贵，几块银元才能买一顶。聪明的雅喇嘛，编织的“鸡冠帽”，颜色鲜艳，质量好，价格也较便宜。因而他编织的帽子供不应求，外地喇嘛也来购买，他除了维持本身的生活外，还把结余的钱财，供给他的侄子满泰继续深造，成全了他的功名事业。

清朝末年，他的侄子满泰因同情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参加了同盟会，随同土旗的革命分子云亨、经权、安祥等人

在绥远土默特地区进行秘密活动。后被清廷发觉，下令绥远将军捉拿他们。满泰先在他三叔的车马店隐蔽活动，后又潜逃到五当召，在他二叔雅喇嘛家混充外地喇嘛避居。风声传到绥远官厅，又有来召追查的信息，雅喇嘛为防患起见，将其侄送至西公旗（即乌拉特前旗），充当当地私塾书馆的汉文教师。在西公旗住了一个时期，又由雅喇嘛从五当召开了一张赴藏朝佛的证件，到青藏地区避居了一年多时间。民国初年，满泰加入了蒙古护路保商团的军队，由低级军官逐步升任为团附，团长、旅长以至镇守使，最后当了绥远的代理都统等要职。这时，雅喇嘛也在五当召学经期满，获得“拉布占巴”④最高学位，荣任该召大喇嘛职务，担任五当召的执事。他自当了喇嘛，因对喇嘛教有深诚的信仰，特别是对五当召的热爱，真是“爱庙如家”。据说在他任五当召的尼尔巴（召上管事务的喇嘛）时期，正值清廷大量放垦绥远的土地。当时章嘉活佛为从中受贿谋利，专断地把五当召的膳召地，报给垦务局开垦。此事激起众喇嘛的反感，雅喇嘛更为愤慨。他自告奋勇出面向章嘉活佛说明利害关系，请收回报垦的成命，并极力阻止官厅对膳召地的开垦，最后得到胜利，保护了五当召的庙产。

在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北洋政府时代，绥远垦务总办元恺，在开垦五当召附近的膳召地时，又受到雅喇嘛各种方式的抗争。冯世珩在《垦务见闻》一文中就曾说：“在开垦五当沟膳召地时，垦局派人与五当召主管事务掌印的杨大喇嘛（即雅喇嘛）联系，所费周折颇多。杨大喇嘛人极狡猾，垦局人员屡次交涉，不得要领，杨避不多谈，不讲汉语，总是以‘米独贵’（即汉语不知道）回答，多方支吾，使委员毫无办法。后经元恺总办派周晋熙持督办公文前往交涉，与召中各主要人及杨大喇嘛等多方折

冲，才促成报垦。”（见《包头史料荟要》第二辑 九十五页）

民国建立后，因军阀混战各据一方，土匪蜂起，地方不靖，民不聊生。雅喇嘛为了保护召庙及全召喇嘛生命财产的安全，便向召上“索干代”组织（即召上集体组织的管事委员会）提出建立武装队伍的方案。经同意并报请绥远都统批准后，即由雅喇嘛着手筹办，组成了五当召的保安队，购置大小枪二十多支，队员二十余人，分驻召庙的重要场所，担负治安工作。自民国以来，绥远虽经多次政局变动和土匪横行，但召上的财产及喇嘛的安全，从未受到损害。

在一九二三、二四年间（民国十二、三年），乌盟茂明安旗王爷，曾带印外出，离开了王府，途中遇到土匪劫击，将财物和旗印一并抢走。损失点财物，王爷不在乎，惟满清朝廷颁发的札萨克大印，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所以急得王爷团团转，想不出寻找旗印的办法。后经他的仕官们建议：“为了向土匪收回旗印，必须找有声望、有关系的人，从中周旋，才能奏效。”大家一致认为五当召的大喇嘛雅仁匹勒，是一位很有声望的人物，如能请他出面活动，定有希望。于是王爷备了信札礼物。派他的协理到五当召会见雅喇嘛，洽商向土匪赎回旗印的问题，并应允事成之后，对五当召和他本人予以重酬。雅喇嘛听了他们的叙述和请求，就亲自到包头会见了他的侄子“绥西镇守使”满泰，商议索印的办法。经满泰出谋，让他回召后，先派熟习当地情况的人，查明土匪的下落，再带上他的信件去说合，如果对方仍不依允，就说这是满司令的意思，如若违抗绝无好处，土匪果然接受了雅喇嘛的劝说，把茂明安旗王爷的大印原物交回。王爷见到他的大印失而复得，感激万分，当面应允给召上和他本人敬献许多头牲畜牛羊，以表心意。但雅喇嘛

没有接受牲畜牛羊，他说：“五当召附近的荒地属茂明安旗管辖。如果一定要酬谢，就请将这些荒地拨给一些，开垦种田以解决喇嘛的食粮问题。”王爷接受了他的意见，便把旗下西南壕约数十顷的一大片土地，拨给五当召。这部分土地由五当召自行出租收粮直至解放。

五当召喇嘛生活上所需的米、面、炒米等成品食粮，大部分由包头德厚义粮店供应。民国十几年来雅喇嘛担任五当召的大德木其（总管事务的喇嘛）时，他看到每年付给德厚义的粮食货款为数很大，便建议在召内设立碾磨坊，加工米面粮食，从而节约了大量的加工费。

五当召自建起碾磨坊，食粮不再靠德厚义供应了，但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糖、布、烟、茶、调料等，还得由它供应。雅喇嘛升任为五当召的札萨克大喇嘛（亦称“赤屋喇嘛”）后，索性把德厚义总店的供应，完全委托广觉寺的驻包办事处负责代办。

雅喇嘛除了维护召庙的利益外，对五当召的绿化，也做出了贡献。如现在召庙大殿前场地上的一片大树林，就是雅喇嘛执事时期，号召众喇嘛种植起来的一片风景林，至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雅喇嘛和群众的关系密切，他待人和蔼、热诚、周到，对病弱和生活比较困难的喇嘛，总是热情关照，设法给予帮助。

他在五当召培养出不少知名的喇嘛，如根片尔、禄布生开尊（原土旗总管荣祥的三兄）和现在的罗布森大喇嘛等，都是他的佛门弟子。

另外，他对沙尔沁（广化寺）召，也有不少贡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在他的主持下，曾把广化寺的旧“佛爷府”（即该召活佛的旧住宅）拆掉，另在大庙东侧，建筑了一所崭新

的砖瓦四合小院，有出厦正厅，东西配房，仪门过道，设备齐全，彩画一新，并从金盆喇嘛庙购置了一套风磨铜的黄金色法轮、羚羊和圆塔的庙顶装饰设备，安置在大庙三层楼顶上，在新“佛爷府”屋顶，安设了两座金色铜塔。次年又举办了庙内三丈六尺高的释迦牟尼佛的开光盛典，演了三天会戏，吸引了附近城乡数千百姓前来瞻仰参拜，一时盛况空前。

雅喇嘛自任五当召的大喇嘛后，还兼沙尔沁召（广化寺）的大喇嘛。他对广化寺，一直很关心。在整理东园村膳召地的过程中，利用沙坡荒地，开辟了一块果树园地，栽培了果苗树木。在果园内另建了一所召庙的收租火房院（当地人称作“召柜”），雇用蒙民乡亲和失业的闲散农民，充当“召柜”的管理人和田园的操作人。雅喇嘛晚年每次回前山看望沙尔沁召，总要在东园“召柜”居住一些时候。

雅喇嘛晚年时期，还将铁匠沟的山中泉水，开渠疏通，引水出沟，浇灌果园田地。几年工夫，他栽培的果树茁壮成长，成了一片绿树成林的优美风景区了。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绥、包地区遭到特大的旱灾，田园荒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百姓只求能糊口充饥，维持生命。可是连“吃饭没工钱”的工作，也很难找到。雅喇嘛目睹人民群众的悲苦状况，大发慈悲，把家乡的饥民，特别是本旗的孤苦蒙民，都安置到他的“召柜”大火房，让他们做些轻微劳动，大锅吃饭，渡过了荒年。有的让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到后山在五当召的膳召地住下，发给口粮以渡荒年。据说这部分被救济的难民，有的在“召柜”长期待下去，成了“召柜”的经管人和务园艺林的工人了。迁到后山的农民，也都在那里安家落户，以后都成了当地殷实的农牧户了。雅喇嘛办的这些功德事，至今人们谈叙起来，还是感

激备至，赞不绝口。

这篇资料是根据我早年对雅喇嘛的所见所闻，以及近来访问他的亲属和僧徒所得材料，汇集整理出来的。因本人水平有限，遗漏或未涉及的问题，一定还很多，尚希知情者给予补充指正。这里谨向热心提供史料的五当召几位老喇嘛——塔怀嘉木素、嘉木雅、和萨计等致以谢意。

---

注：

①全召的总管大喇嘛，亦称“赤屋喇嘛”其地位仅次于活佛。

②土旗的满泰在辛亥革命时，即参加了同盟会。先任绥远保商团副官，后任土默特旗“老一团”团副、团长、旅长及“绥西镇守使”等职。晚年代理过绥远都统，并任乌、伊两盟十三旗蒙边司令和土默特特别旗总管等职。

③五当召宗教学习，是所组成的喇嘛教哲学学院的学塾之一，是最初一级的学塾，学期为九年毕业，再升中级、高级的学塾，全部学完须二十一年。

④即五当召钻研经典哲学，分初、中、高三级学制。当学习的喇嘛学完三年学塾，成绩优良合格者，才可获得最高学位——“拉布占巴”。

## 章嘉活佛与山西的关系

张子和提供资料 辛补堂整理

五台山镇海寺是章嘉活佛常川驻锡圣地。寺内的普乐院，是蒙旗宣化使行署所在地，为章嘉大师的办公处，外院有办公室、秘书处及警卫、电台服务等处。

章嘉是内蒙古宗教领袖，中国四大活佛之一，宗喀巴的传承人，全称是：“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是封号，章嘉是名，呼图克图是蒙古活佛之意。十九世章嘉活佛，出生于青海塔尔寺。

章嘉和山西的关系很密切，尤其对山西的经济收益有很大影响。因为除章嘉本身的薪俸十二万元外，蒙旗宣化使公署及行署的经费年收入四十余万元，另外布施的收入也很可观。这些钱财，大部消费在五台山。

章嘉是宗教领袖人物之一，在中国元、明、清诸朝的宗教史上是很有地位和威望的。正如清世祖所说：“我能团结宗教领袖，胜于秦室筑长城万里”，充分说明宗教领袖的影响。

民国初年，由于十九世章嘉活佛的劝导影响，内蒙古各盟盟长、王公及贵族、喇嘛、庶民决心内附，抵制了哲布尊丹巴搞“蒙古独立”的分裂活动，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族的团结。为此，中国政府特准在全国各大城市，如南京、北京、太原、张家口等地设立章嘉活佛办事处。在太原的办事处，处长是张平衡他广泛宣

传宗教教义，团结蒙汉人民友好往来。

章嘉在五台山虽系客卿，但曾为山西人民做过一些有益之事。如经章嘉参与处理的一件宗教界历史遗留问题就有很大影响。远在一六六一年间清朝顺治皇帝朝圣五台山时，曾以身许佛，愿入空门。其子康熙继位，为父尽孝，勒令菩萨顶大喇嘛替天行道，广做善事，加封为“扎萨克大喇嘛”，并赐予“尚方宝剑”，谕旨：（一）凡系不法庶民，有违反教规者，可先斩后奏；（二）菩萨顶祭事所需费用，可随需要征收。从此，五台山菩萨顶大喇嘛的权限就登峰造极了，给邻近各县人民造成很大的苦难。尤其是五台、繁峙、代县人民沉重的负担更是苦不堪言。这一规定一直沿袭了好多年，从未改变。

民国六年，五台、繁峙、代县三县人民，对大喇嘛的任意作为，忍无可忍，认为民国已经成立六年，皇帝早被推翻，还沿着旧制供应，太无道理。三县人民遂各派代表向山西都督阎锡山请愿，要求停止菩萨顶向三县人民征敛实物的负担。五台山代表是王进贤，字益三，系前清进士，曾任山西省议会议员；繁峙县代表是陈钰，系清朝宣化府知府，曾任山西省民政厅长；代县代表忘其姓氏。阎锡山对此亦表示十分同情，但因菩萨顶大喇嘛系宗教上层人士，乃请章嘉活佛从中斡旋，各方代表在五台山镇海寺举行会议磋商。虽仍有争议，但终以国体改革，封建法令业已失效为词，取得谅解，停止对菩萨顶的供应。从此，阎锡山对章嘉非常崇敬，三县人民对章嘉亦怀感激之情。每逢章嘉莅晋，阎锡山必亲自接见，以贵宾礼相待，设宴招待，安排专人迎送，并通令沿途各县给予各种便利。

“九·一八”事变后，东蒙各盟旗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内蒙古的苏尼特右旗扎萨克王爷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看到当时东蒙的情况,认为日本的“满蒙政策”要掌握全蒙,既得东蒙,必然要侵占西蒙,乘机大搞所谓“高度自治”运动,极力煽动各蒙旗分头派遣代表到北平面见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要求发给枪械武器捍卫内蒙。又由蒙旗三位王爷及蒙古旅平同乡会等名义致电蒋介石,吹捧德王是“素孚众望,洽顺舆情,是内蒙古有实力的人物”,要求由德王出任“蒙旗宣抚使”,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引起蒋介石对德王的注意。蒋介石接电后,即派其亲信桂永清,专程到内蒙古访问,其后国民党行政院也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字芷青、五台人)驰赴内蒙视察,一时间北国风云异常紧张。

不久行政院特派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准在北平设立蒙旗宣化使公署,并选择适当地址设立行署,隶属行政院,并由立法院通过该公署组织条例及办事细则等。此时,北平二十八处官庙黄教喇嘛,因应领口粮拖欠十二年之久未发,僧侣冻饿待毙,章嘉关心宗教,为僧侣请命,由秘书长张平衡劳苦奔走,向各方面大力呼吁,终于允准月发口粮款三千元,改变了僧侣们嗷嗷待哺的悲惨状况,使北平官庙喇嘛得庆甦生。

蒙旗宣化使署甫立,即调太原办事处处长张平衡为该公署秘书长,主持政务,积极筹备赴蒙宣化事宜,赶制各项宣传用品。

一九三四年三月间,章嘉率领随员一行七十余人,由北平启程,并先由蒙籍处长李寿山,总务处长官子万为宣传队,先行赴察哈尔。章嘉大师出发前,受到北平各界及宗教团体的热烈欢送。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欢送大会,会后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设宴饯行。

章嘉大师到达包头后,由阿王迎请至杭锦旗,下榻在阿王府。阿王召集伊盟各旗农牧民及喇嘛僧侣举行欢迎大会。听章嘉

大师讲经布道。其后章嘉又经土默特旗转赴锡盟。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沿途僧侣络绎不绝，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各蒙旗王公、喇嘛、各族民众反对日寇侵略，抵制德王的投日分裂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 绥远的烟土行

吴应禄口述 贾汉卿整理

旧社会绥远人民是在政治黑暗、土匪骚扰、嫖赌无忌、烟土充斥的环境中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绥远地区所谓“二土”的危害相当严重。土匪成群结队四乡骚扰，烟贩土客充斥市场。七七事变以前，鸦片成了控制市场的主要物资。绥远全省年产烟土大约四百八十余万两，消耗金钱约为一千四百四十余万元，男女烟民竟达七十万左右，占全省人口的五分之二，因此各地的烟土行业非常兴盛。

民国初年我曾在归化城莽麦皮巷开设了福义泉膏子铺，后又扩展为烟土行。现将当年绥远烟土行贩卖鸦片，毒害人民的情况，叙述如下：

据传说，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在清道光中叶，就已转运到绥远来。当时一般人称为“洋烟”，市面上叫做“广土”，每两约值白银三两。及至鸦片战争爆发，因来源不畅，每两价格竟飞涨至六两左右。除了贪官污吏与富商大贾吸食外，其他工农群众，因价格昂贵，尚不敢尝试问津。

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归化城一带，开始种植鸦片，人民群众吸食者逐渐增多，因此广土价格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治末年，因烟毒蔓延，遍及城乡，有一些烟民，为了牟取厚利，将所熬烟膏，挑成棍儿烟、片儿烟、圪瘩烟等形状，并和以面筋膏子掺假，外裹苇叶，零星出售，这可以说是大烟馆发展的前身。

光绪年间，大烟馆已遍设在各市镇街头。烟馆门首挑着圆形篱笆幌子，上写“清水净烟”字样，准备几套简陋烟枪，供应烟客使用。每天在万家灯火的时候，挂出了红纸灯笼，招待一些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的癮君子吸用过癮。而一般富庶之家，仍多吸用广土，并以允明氏烟斗、太谷烟灯以及玉枪、竹枪为烟具；开灯以后，使女差役，有的捧茶，有的掌杆，显示出烟民贫富悬殊的不同情况。

西玉成是当年归化城最大的一家大烟馆，由大同府韩家开设，烟馆分东西两柜，西柜较早，开张於西河沿；东柜较晚，设立於圪膊湾。因为它就近有土龙背、西河湾与二发店，所以营业特别发达。光绪末年，韩家已发财致富，操纵了大烟市场。除将西玉成大烟馆扩展为烟土店外，并以韩立厚的名义，在归化城又先后开设了西成店与双盛西货庄，增盛昌皮庄，在包头开设了义隆昌粮店，在萨拉齐开设了德和玉钱庄，以后又在河子上开设了公玉成缸房、糖房。那个时候，韩家所经营的西成店，一般人都叫做甬子店。凡是贩运羊肝、羊下水以及大烟土的各地商客，多前往投宿，曾名噪一时。故将原来的甬子店巷，改名为西成店巷。

当年归化城一带，赌场林立，娼妓充斥。在烟民激增的情况下，年产鸦片已不敷消耗。每当货源紧张，供不应求的时候，有许多唯利是图的奸商和癮君子，竟以面筋、羊角、牛角、羊蹄、猪皮熬做膏子、掺和在洋烟里，在大烟馆零星出售，后因相沿成风，荞麦皮巷就出现了不少的膏子铺。民国初年，福义泉亦行开张。宣统年间，每两烟土的价格，约为城钱三百。如以一八钱和二二钱折合，价值铜钱十四文至六十六文，圪瘩烟一小块卖铜钱五文。每届夏令，有许多烟民，前往各乡收割奶浆。他们为了个人利益，竟以各种手段，将顶花奶子，偷偷地倒在腰间所系的猪尿泡内，并将矾水吹入烟

桶，使其发酵，欺骗烟主；同时又以咬碎的麻花、麻叶搅和在奶浆里，与肩挑小贩，交换菸茶干货；有许多烟农，亦将苦菜膏子、面筋膏子与烟土掺和。凡是在一百两烟土里掺和十两膏子的，叫做一九货底；掺二十两膏子的叫二八货底；掺三十两膏子的叫三七货底；烟土价格最高时，竟达对成和倒四六货底。可见以往的烟土交易，尔虞我诈的情况多么严重。

辛亥革命以后，归绥一带的烟土行仍很发达。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西玉成在宁武巷增盛昌皮庄所存的烟土，曾被地方民团串通江洋匪盗，抢劫了二千余两。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绥远的烟土价格，因厉行禁烟，出现了直线上升的行情。五十两白银，仅可买到新疆的倒四六底货六两；其他一般的三七底货，每两也可卖到现洋十二元至十六元。烟土价格虽然飞涨，但是烟民因烟瘾难过，都要想尽办法购买。原有的大烟馆和膏子铺，因政令所迫，有的移往农村，有的转入地下，借机居奇，推广了膏子的销路。同年夏，当禁烟明令公布后，唯一的土店西玉成，被官方将查获的烟土五千余两，扫数没收并遭到法办。经过这一波折，韩家的七大字号，就逐渐的倒闭了。

绥远在实行禁烟时候，新疆、甘肃与宁夏等地，仍然是土店林立，大肆播种鸦片，无人阻拦。每年收割的鸦片，由各地驼户与皮毛商，夹带在绒毛和干果里，秘密运来，委托较大的毛店如集生祥、谦和昌等，代为销售，获取厚利。有一些不怕死的掇客，自备武器，骑着骡马，携带烟土，轻装出动，白天入山，深夜疾行，间道东来，潜抵包头、归绥出卖。有些烟贩土客还与土匪勾结以便护送。

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左右，烟土的黑市交易，更为猖獗。如小北街范某，曾由绒毛店里买到几簍杏干，内藏不少大烟，

新城的叫卖商贩小蛤蟆，也在干鲜货里得到很多的大烟，他们暴发横财，广置田产，当时一般人称范某为范杏干。

甘肃、宁夏是有名的产烟区。伊川、兰州的烟土，多为奶浆货，甘州即为干痲货。一般土店，都以字号名义，制成票版，包装加封，作为标记，其中以“大境门”、“火车头”等为上品。当西路烟土集中在包头以后，归绥的土客，也曾前往贩运。脚户们往往将烟土隐藏在车衬里，托交苟家滩德亨店代为分销，每年所取的佣金，竟在万元左右。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禁政弛废。绥远当局，即以寓禁於征的名义，首先在南茶坊设立了稽核所，进行稽征。凡是西来的骆驼，一律检查，每两烟土上税二角，各县设有分卡，给检查人员造成了贪污受贿的机会。这样鸦片成了违禁公罚的产品了。

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烟税的课征，改由清源局办理。同年冬，宁夏金积堡的山西漪氏帮商号自立正、自立成等，曾在发菜与枸杞箱里夹带烟土，来绥销售，所有的枸杞，多为宁安堡出产，内分供果、盖王、顶王、改盖王、枣王、魁元等数种。发菜一斤，值银四两。枸杞每升值银九两，土客为得到检查人员的关照，即以发菜、枸杞与烟土，分别馈送，不惜小费，这也是当年西路土客贩运烟土的一种手段。

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归绥福义泉膏子铺，首先扩展为烟土店。以后又有天生泉、复和泉等开张，上市的大烟馆有三十余户，都是一本万利，财连银汉。

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以后，归绥的土店，多由人力组设。因为它是一种危害人民不正当的营业，所以被拒绝参加商会。当时天津、奉天的土客，往往依靠军阀，投宿于中西旅馆，进行交易，仍然由稽征机关，课收税金。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

二五年)左右,禁烟善后局奉令成立,曾以检验贴花为征税手续。凡是不登记的私货,一经查获,概予没收,并按数量多寡,酌课罚金处分。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塞外鸦片获得丰收,大量东运,分销津沪;而甘肃、宁夏的烟土,则不断的整箱运来,在市场上与当地土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那时归绥一带的烟土价格,每两现洋七元,最后因货源充斥,竟下降为一元五、六角。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绥远的烟土行,更见发达。当时归绥的土店,有茂盛隆、和盛祥、兴泰厚、源记、福义泉、晋华玉等十余户,仍以打佃为业。稽征机关,改组为禁烟稽查处,由康庚任总办。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阎锡山曾在归绥开设过垦业商行,由李秉懿任经理,陈伦五为副理,专做鸦片生意,并与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步芳等勾结往来,以晋造枪炮,换取烟土。当时察素齐、毕克齐、萨拉齐一带的奶浆货,每两价格为一元七、八角,托克托县的干痲货,每两一元二、三角。不久,由垦业商行投资,开办了晋益祥,聘请杜永昌任经理,翟耀庭为副理,郭经轩为营业主任,凡绥南各县的鸦片,多由该号收购。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又由营记、亨记合资开设了业记公司,也是以贩运烟土为业,曾由郝荣甫任经理,赵子静为副理。这都是阎家的鸦片企业,操纵了绥远的烟土市场。那时候,绥远禁烟稽查处,阎锡山已委派李居义为总办,张钦、李惠卿等为会办。凡是西来烟土,必须在黑沙兔、百灵庙分卡先行登记,然后再由保商因解送到归绥,经过贴花完税手续,才能向各家土店分配。如继续东运,仍由稽查处负责护送。后因特税问题,绥远省府曾与蒙政会发生纠纷,虽一再磋商,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同年夏,德中和土店经理贺秉温竞选为归绥商会会长,这是烟土行的极盛时期。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禁烟稽查处改名为禁烟

督察处，由靳祥垣任总办。据统计，自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夏季，运往山西的鸦片，为五百七十余万两，全部作为“戒烟药饼”的原料。

七七事变以后，绥东各地与归绥、包头被日寇侵占，绥远省会改为厚和市，由烟土巨商贺秉温任伪市长。开业的土店有德中和、世义诚、天和永、和盛祥、公和祥、晋华玉、宝盛祥等。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上市的土店，增加为五十八家。鸦片零卖业，除个人倒贩者无法统计外，正式开张的大烟馆有二十三家。

归绥的烟土行，在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已组成土业公会，由贺秉温任理事长。沦陷以后，即改名为阿片公会，设在小南街，公推茂盛牲尤高山为伪会长。同时伪蒙疆政府，将原有的禁烟督察处，改组为清查權运署，由王春任署长，日寇池田喜一任副署长，各县设有清查分署，办理勒索烟农的事务。各伪县公署，曾颁发文告，诱导乡民广种鸦片，染有嗜好的男女烟民，更加蔓延四乡，曾达一百余万。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〇年），黑河圈地二十四家清丁的后裔刘富元等，因绥交烟税，遭到伪政府清查權运署的强征，以至破产。后因物资统制，勒令各地的土店合营，当时伪厚和市参加土业组合的字号，计有七十一家，从业人员竟达一千四百余人。

伪土业总组合设在张家口，由贺秉温任理事长，张立中、王子玉为副理事长，孙玉阶为常务理事，总监理为曲华亭、詹东升，首席顾问为北岛常次郎。伪厚和市土业组合设在兴隆巷，由韩幼林任经理，刘维城为副理，日寇栗山正介、泽惠美夫任顾问，并在包头、萨拉齐设办事处。所有的烟土，大部分运往天津与



上海。每年夏季在鸦片成熟的时候，各地的土业组合，即下乡收购，划区强征，收购人员就串通伪乡长、伪助理员以及一些地痞流氓，以大秤收，小秤交与掺假等手段，克扣烟农，贪污中饱，如不向其贿赂，就以鉴别质量为名，百般刁难，鱼肉农民。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挺进绥远地区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丰镇、凉城、武川、固阳、萨县、归绥地区抗日地方武装，不断摧毁日伪经济侵略机构。在托、和、清地区砸烂烟土组合，将伪土业组合的收购主任郝其昌与忠义乡伪助理员张文利枪决于三两镇，人心大快。绥东地区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八路军的为民除害的政策，人民群众深受感动。抗战胜利前夕，料面盛行，烟土价格也为之飞涨，当时曾有一些要钱不顾命的人，竟将烟土装于避孕套内插入肛门或阴户之中，秘密带往天津、北京，方法奇特，一般人称之为“肛门队”、“水门队”。伪厚和市与包头市以及萨拉齐、托克托县等处，曾有不少的毒品贩，就地取材，制成烟坯，秘密东运，获取厚利。

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也曾厉行禁政，铲除烟苗，但游击杂牌部队与靠近敌区的党政工作人员勾结，竟将大量的鸦片携带到后套，每两售价法币百元。以后烟价上升，每两高达三百余元。在禁令公布，肃清烟、赌、赃的时候，绥西一带，曾有不少著名烟贩夥同当权者，仍然出进敌区，并以党政机关的名义，任意走私，而一般穷打急闹、代人跑腿的洋烟鬼，一经查获，即行枪决。这样的禁政禁令，怎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国民党统治区的甘肃、宁夏与青海的烟土，仍由一般土客与军政大员的亲信，不断东运到包头。沿途由伪西北通商督办公署和伪绥西联军以武装护送，狼狈为奸。在日寇毒化政策的危

害下，绥远竟成为乌烟瘴气的鸦片世界。

绥远的烟土行，在鸦片公卖时期，也曾分为祁太帮、京帮与归化帮，以后又出现了包头帮、萨县帮和托县帮。著名的土客如丁映斗、杨茂林、阎记宏、李厚斋、李子明等，操纵了烟土行的营业。

抗战胜利以后，所有的烟土店和大烟馆，虽然纷纷歇业关闭，但仍有不少的毒品贩，依靠当权者的庇护，继续做危害人民的勾当。绥远各县，涌现出一批发国难财起家的新权贵，其中有一部分做过游击专员和游击县长。他们抗战不足，扰民有余，利用职权搜刮了不少烟土，抛售之后，就在绥包、平津广置房产，开设商行。有一些地方团队的头子，为了升官发财，以大量的烟土馈送上级，同流合污，危害人民。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一些偏远地区，曾播种鸦片，亢宜斋、马寿山、疤丑毛等，兴风作浪。他们串通军警，将所做的坯子，运往各地继续毒害人民。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绥远地区的烟毒才彻底肃清。

包头为绥西重镇。清代时期，已有不少的大烟馆和膏子铺。辛亥革命以后，因厉行禁政，西来的烟土，除由广恒西、双发公、义同厚、大恒永、广丰厚等各大毛店代销外，一般西客，即多在梁家营子祁小子骆驼店和薛家营子薛怀忠、薛应忠所开设的驼场寄放。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姚以介曾奉都统命，前往搜查。薛应忠就将四十八家土客的大烟板子，隐瞒一半，攫为己有。以后被人发觉，由货主控诉，薛应忠受到了法律制裁，死在监狱。

鸦片公卖时期，开业的土店，计有三义栈、同兴昌等十余家，大烟馆以白拴柱所经营的西盛堂，铜匠四子所开设的义顺烟

馆最为发达。沦陷以后，大烟馆激增至百十余户，烟土店三十二家，后日伪勒令合营，即由周起臣、李文玉等任组合长。在那个时候，伪西北边防自治军于子和部、伪绥西联军王英部、伪皇协安民救国军党静生部以及伪东亚同盟军白凤翔部，都是以播种鸦片，贩运毒品为专业，烟土上市量激增，就给包头的烟土行，造成了发财的大好机会。及至抗战胜利，土店结束，以往的毒品贩，得到新权贵们的支持，仍然继续活动。包头饭店和大陆饭店，就是料面胚子的集散地。解放后，人民政权，既以有效办法，彻底根除烟毒外，所有的毒品贩也受到严厉的制裁。

萨拉齐县的烟土贩子，当年也称为一大帮，在鸦片公卖时期，吕文、李二子、南海家、耳计子、张在子等，都是以贩卖大烟起家，成为巨富。沦陷以后，水涧沟门一带，已成为交易市场，每年所收割的鸦片，多由崔、郭两家所操纵。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土业组合前往收购，竟被张万瑞部以武力摧毁，一般的经济汉奸，受到了严重打击。抗战胜利后，原有的烟土贩子，由于土豪劣绅的支援，仍然若明若暗地活动，谋取暴利，料面充斥，胚子遍地，继续危害人民。

托克托县的烟土行，在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以后，就更见发达。当时世义诚因桑梓关系，每年奶浆上市，就派人前往，尽量收购。其它如兴隆永、祁泽第、蒲义、康子明、李佳芝等，都是著名土店、土客，价格升降，多受他们操纵。

丰镇县地近大同，在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以前，因山西省厉行禁政，晋北一带的大烟贩子，不断前来与卢润宽等进行秘密交易。那时候，卢润宽为著名土客，曾自备武器，经常到达甘肃、宁夏，以贩卖大烟为专业。及至鸦片公卖，农民大肆播种，烟土产量激增，上市的烟馆，约计二十余家。张子固曾任稽

查处长，专办烟税征收。沦陷时期，樊仲山任组合长，烟土贩子都借机发财，取得暴利。

**附记：**

这一篇取材零散，绶远其它地区烟土行的情况，因不了解，悉未介绍。因我年岁已老，不无遗漏，尤其是对於时间的记载，更难求得准确，一并说明，请予指正。

(一九六五年)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作者 =

页数 = 2 1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